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史?

刘忠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如同远足的旅行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一样,文学史写作也当如此。文学创作在不断变化中,文学史文本也在随之变化。面对不断前行的文学史“重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新民主主义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太过政治化,“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又过于审美化……绝对主义固然不好,相对主义也需要深入考量。我们不需要单一的、他者化的文学史,也不需要封闭的、过度阐释的文学史,需要的则是多元、动态、不断反思的文学史。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史;重写;多元;反思;动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01-06

中国文学史写作起步于20世纪初叶,算是地道的舶来品<sup>①</sup>;但是“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因为有历史上的文学批评作基础,起步虽晚,却也渡河有舟,治学有术”<sup>[1]</sup>,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从晚清至今,文学史文本在不断产生,从官方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从自发到自觉,文学史写作始终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我们需要文学史,因为它记录过往,关涉现在,向未来开放。如同远足的旅行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一样,文学史写作亦当如此。

## 一、变动不居的文学史写作

文学创作在不断变化中,文学史文本也在随之变化。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张钟等人的《当代文学概观》、郭志刚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张炯等人的《新中国文学史》,再到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吴秀明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

主潮》、欧阳友权等人的《网络文学发展史》,文学史写作明显提速。面对不断前行的“重写文学史”,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满意过,“新民主主义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太过政治化,“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又过于审美化,现代文学“历史化”时间太长,批评空间有限;当代文学时间又太短,缺乏历史沉淀……写出一部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文学史文本,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饶有兴味的是,对于不确定或不可能完成的事物,人类始终充满好奇心。在一个阐释学极为发达的时代,不管有没有一个原初意义上的文学史,学者们对文学史的“今天化”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文学史文本仅仅是一种话语形态,只和“今天”“此刻”发生关系,“没有什么外在于今天的文学史。文学史在今天涌现,它压缩在今天的空间中”<sup>[2]</sup>。“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国防文学”“工农兵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文学”“审美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都能够在多姿多彩的文学史版图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正如《中庸》中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重写文学史思潮与新时期上海批评家群体”(11BZW101)

**作者简介:**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各有千秋的文学史文本和研究论文一再昭示我们:解构是容易的,建构是艰难的;共识是短暂的,分歧是永远的。“写作——反思——重写”是文学史文本的存在常态,任何全盘否定或肯定的做法都是偏颇的、不切实际的。正如福柯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脉络去检视哪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哪些事件帮助我们认知到所谓的‘自我主体’,就是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说什么”<sup>[3]</sup>,如此,重写文学史才会抵达它的目标。对于既有文学史文本,每一次重写都是一次选择、一次对“元历史”的反思。重写并非只是一个口号,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范式的更新。从革命到启蒙,从阶级性到人性,从功利到审美,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人们的文学史观在变化,文学史写作的知识范式也在新旧更迭。文学史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和魔力,不断产生新的文学史文本,在更高层面形成开放的、动态的文学史写作机制。

何为文学史,并没有一个恒久不变的定义。以“审美—纯文学”标准来评估与社会变革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固然有它的偏颇,但回归“革命—阶级论”主导下的“他者化”文学史写作范式又是不折不扣的倒退。在一个以外部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中,“审美—纯文学”捍卫了文学史的本体存在,“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局部心态史”<sup>[4]</sup>,其自身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旦“审美—纯文学”标准固步自封,上升为唯一的标准,它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毕竟文学史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会在文学史中获得表现,任何抽象的、单一的、绝对化的文学史叙述都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

## 二、不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

在回答“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史”之前,先盘点一下“不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史”<sup>②</sup>。

首先,我们不需要单一的、他者化的文学史。曾几何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被视为文学史写作的不二定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帝反封建、工农兵形象、“两结合”原则、典型人物等词汇成为文学史文本的关键词,被人们反复进行价值附加和意义言说。文学史的思想性、教育性、党派性极度放大,压抑、挤占了本就稀薄的审美性、启蒙性、多样性,造成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史写作体制的僵化。王瑶的《中国

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未能幸免。钱理群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史叙述即是一连串的典型现象、历史细节的连缀,但又不是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新的叙述,赋予旧材料以活力,并在材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这就构成了对历史的复述(与再述),既不是‘六经注我’,也不是‘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sup>[5]</sup>一方面我们认同历史的本真存在,另一方面又无法复原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作家作品历史化,迎合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理念,来构建一个历史的过去,将文学史文本实用化,甚至是工具化。

其次,我们同样不需要封闭的、“纯审美”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解构了此前的“他者化”文学史,迎来了文学史写作的个性化、本体化时代。在“纯审美”标准下,我们看到了文学史上另一群人的风采,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张爱玲、苏青、钱钟书、穆旦、金庸等人“大红大紫”,赞誉有加;而“左翼”作家郭沫若、茅盾、田汉、周扬、丁玲、何其芳等人则遭到人们的冷遇,“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标签很容易贴到他们身上,“前期审美”“后期政治”的评价方式也会接踵而至,完成了对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批判与否定。审美和人性的发现,“解放”了文学史家的生命体验、感知,让人们有可能洞悉到文学史本身的幽暗与复杂,实现从“写什么”到“怎样写”的平移,弥补文学史写作“内部研究”之不足。但在具体实践中,用来解构“政治话语”的“审美主义”很容易被抽象化,任意割裂、曲解作家作品思想的前后联系和有机整体,造成新的二元对立。审美主义在揭示新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方面,是积极的、有效的,但它远不足以涵盖新文学的种种可能性,审美原则自身的封闭性与书写对象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悖论。赵园曾指出:“‘重写’仍流于经验性的否定而终无真正坚实的建设,再度发现否定者仍在被其‘否定’的那个视野中。”<sup>[6]</sup>

最后,我们亦不需要过度阐释、越写越长的文学史。如果说重写文学史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界存在“神话”鲁迅、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人的倾向,文学史排位座次分明,左翼作家地位高于自由主义作家的话;重写文学史之后的情形正好颠倒了过来,自由主义作家大受欢迎,胡适热、周作人热、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穆旦热……持续不断,高烧不止;而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何其芳、赵树理、柳青等人则遭遇冷落,质疑、批判之声此起

彼伏。反映到文学史文本中,就是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穆旦、冯至等人所占篇幅大大增加,风格平和冲淡的闲适小品文,表现人性美、人情爱的小说,专注人生中沉稳、灰暗一面的海派作品,成为重写文学史写作的重点对象,甚至辩诬汉奸身份、洗白反共言论也以“同情的理解”之名进入文学史文本。

近年来,过度阐释开始从所谓一流作家、经典作家向二流、三流、不知名作家蔓延,“才子作家”“报人作家”“才女作家”“潜伏作家”等称号很轻易地就戴在了方玮德、邵洵美、胡兰成、史量才、吕碧城、石评梅、陆小曼、梅娘、安娥、潘柳黛、关露等人头上,成为一些文学史文本的“新宠”,他们笔下的报章杂感、通俗小说、言情散文也一变而为人性写作的高标和审美主义的典范。

与自由主义作家“扩容”“升级”相对应,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也在一些“新左派”人士笔下获得充分挖掘,草明、白朗、林蓝、曾克、王林、方纪等人的创作被冠以延安作家群、东北作家群、保定作家群之名,获得深入阐发,进入到文学史“大作家”序列。随着文学史研究“去蔽”和“平移”的加快,人们对“复古派”“学衡派”“甲寅派”“战国策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认识也有新的变化,如有学者认为,“王平陵、黄震遐和陈途在既有文学史中都是‘反动’作家,但细读作品,人们仍能感到他们强烈的爱国家、爱人民的衷心热肠;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值得重新研讨”<sup>[7]</sup>。

姑且不论有没有一个认定一流作家、二流作家、三流作家、进步作家、反动作家、大作家、小作家的绝对或相对标准,单对这些作家生活遭际、情爱历程的事无巨细的描述与诠释,就让中国新文学史越写越长,不堪重负;与伟大作家、经典作家为伍变得越来越容易,文学史评价标准、知识体系严重失度。为了争取话语权力,每一个研究者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遴选、甄别作家作品;为了让文学史文本有特色、有发现,不惜借用地域色彩、民间书写、潜在文本、女性意识等术语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过度阐释,籍此增进、垫高文本的学术性和影响力。这种放任主体性、个性的做法,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泥潭,模糊、扭曲文学史本来的面目。文学史家在结构文学史文本的时候,主观性虽然无法避免,但这“绝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sup>[8]</sup>。

### 三、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史

在回答了“不需要什么”之后,“需要什么”的问题也就相对清楚了。文学史是纷繁复杂的,文学史

文本理当是多元的、动态的、不断反思的。

我们需要多元的文学史文本。事实上,古今中外,不管你承认与否,社会气象、文艺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兴趣爱好、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乃至史料的多少、史实发现的时间早晚等因素,虽然与已经“过去”的文学史无关,但它们却影响着文学史文本的叙述视角和方法,“不在场”的因素左右着“在场”的书写者。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编纂史来看,我们曾拥有过进化论、阶级论、启蒙论、审美论、现代性、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史观的文学史文本,它们在丰富文学史评价标准、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贡献。如进化论文学史记录了中国新文学产生之初渴望快速“成长”的一段难忘历程;阶级论文学史揭示了新文学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紧密关系;启蒙论文学史把新文学视为国人的一段思想启蒙史、人性解放史;而审美论文学史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美”因素的累积效应,凸显文学史“内在规律”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文学史则追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向而学”的维度,试图开掘出中国式的现代性认知;新历史主义文本走得更远,它认为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史是已然“发生的事情”,类似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我们描述出来的文学史是一种“文本的历史”,“历史并不能自动存在,自动呈现,它的存在,必须赋予形式,必须引入意义”<sup>[9]</sup>。

也就是说,文学史文本总是后设叙事,是一种话语建构行为,当我们以某种意义来阐释文学史的时候,那些被认定为没有意义的部分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形成“断裂”和“空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文学史写作都如同瞎子摸象,触及的只是书写对象之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这就要求文学史写作应在多元文学史观指导下,采取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审美的、传播的等多个角度进行,在相互争鸣与互补中演绎文学史的鲜活与繁复。

多元之外,我们还需要动态的文学史文本。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一直存在两种偏颇的认知:要么“今不如昔”,昨是而今非;要么“昔不如今”,今是而昨非。无法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不同时期文学史文本的利弊优长,老是纠结于古今中外的尖锐对立。“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论调透露的是“当代文学成就不如现代文学”的认识;“重写文学史”秉持的则是“今是而昨非”的思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一部原生的、静态的、唯一的文学史文本。我们既没有必要以“前史”来否

定“后史”，也没有必要用“后史”来颠覆“前史”，两者之间当是系谱学意义上互文比照、良性互动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取代颠覆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范畴，“重写文学史”仅在纠偏匡正、丰富多元的意义上有它不可或缺的价值，期望重写出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文本是不现实亦不可能的。没有周作人、朱自清、王瑶、刘绶松、张毕来、唐弢等一代文学史家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就没有后来的严家炎、黄修己、朱寨、张炯、董健、钱理群、陈平原、洪子诚、孟繁华、陈晓明、程光炜、陈思和、王晓明、吴秀明、王庆生、张志忠、丁帆、朱栋霖等人的锦上添花，更没有当下文学史文本的互动共生、多元并存。

当然，为了提升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让文学史文本更趋近文学史本真，找寻其中隐潜的奥义，我们还需要不断反思文学史文本。黑格尔说，反思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是人类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不管是既有文学史文本，还是重写文学史文本，它们都是摹本、派生物，是对某一特定文学史文本的修正或挑战。从绝对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今人的话语形塑，是不同形态文学史观的体现。“反思”是文学史的必修课。王瑶曾说：“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学科，也是一门历史学科，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sup>[10]</sup>

换言之，文学史文本既是“文学”史，又是文学“史”。从话语阐述的角度看，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研究方法、接受心理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文学史内部结构的调整，引发对既有文学史文本的反思和改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文学史并不是过去历史材料的简单累积，而是文学史家立足当下，在一定文学史观念驱动下，与既有文学史史料和文学史文本的多重对话，内含了文学史观念、评价标准、研究方法的“新变”和“突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再到启蒙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重写文学史”，对文学史的反思一直就没有停歇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反思又一次让我们看到，文学史“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审美”与“政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能够互补并存的，如同歌德在《浮士德》里所说的那样，“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sup>[11]</sup>。

#### 四、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厘清了“不需要”与“需要”之后，解决写作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变得尤为重要。“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sup>[12]</sup>，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本身就预示着解决问题。在中国新文学史写作过程中，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亟待处理：

##### （一）少数民族文学入史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文学史文本仅限于汉族文学史，很少提及少数民族文学，不仅遮蔽文学史的多民族、多语种存在，而且容易滋生话语霸权，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形塑。霍布斯鲍姆说：“民族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发掘、认识自我与民族大我正确关系的过程，认同的基础是某种‘本质性’的存在，或者说认同的过程是一种本质性的建构过程。用什么方式来建构认同？当然是历史学。只有通过历史学，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当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被解释为有着久远历史和神圣的、不可质询的起源的共同体时，民族国家历史所构成的幻想的情节才能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正是通过这种驯化和熏陶，民族国家神话被内化为民族国家成员的心理、心性、情感的结构。”<sup>[13]</sup>文学史文本为民族国家认同提供了适宜载体与中介，期待文学史家以一种开阔的胸襟和视野，描绘出汉族、藏族、回族、苗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文学图景，呈现文学史的多民族、多语种特点，在民族认同、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培养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 （二）港澳台文学占比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港澳台三地的文学与祖国大陆的文学很长一段时期处于分离状态。新时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跳出大陆与港澳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的限制，增加了港澳台文学的比重，从中华民族遭遇西方现代性入侵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它们的异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如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大中国”视野阐述大陆文学和台港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认为“继承、更新和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出路所在，也成为中华文化涅槃新生的根本出路所在”<sup>[14]</sup>。此后，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给予港澳台文学较多的篇幅和较高的评价。不过，总体来看，在港澳台文学“入史”问题上，多数文学史文本尚停留在地域空间的拓展与整合层面，未能深入到两岸三地文学的各自肌理，对其产生的社会制

度、产生机制缺乏进一步考量。

### (三) 旧体诗词是否入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肇始于语言革命,“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文学之“现代”的一个重要内涵。但现代文学产生之后,文言文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传承,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旧体诗词。近年,围绕现代旧体诗词是否应该写入现代文学史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意见不一。“主张入史者”认为,旧体诗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sup>[15]</sup>。“反对入史者”认为,旧体诗词不具备“现代性”,现代文学之“现代”不仅表现在思想主题、精神走向上,还包括语言、体式等方面<sup>[16]</sup>。20世纪中国文学要不要涵盖所有的文学样式,旧体诗词、文言小说、散文能否入史,姑且不论,它们的存在却是文学史的“既往事实”,对文学史家也是一个参考变量。

### (四) 如何打破男性话语霸权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自产生以来,一直是男权话语的阵地,尽管女性主义文学史写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出现了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王春荣的《新女性文学论纲》、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英、乔以钢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徐坤的《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学导引》、陈惠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等专著,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写作方面突破并不大,男权中心依然存在。文学史文本大多以男性作家作品为主,女作家中仅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杨沫、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残雪、池莉、方方等人,女性的性别意识、生命体验远没有得到体现,男权话语的自审意识严重不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史写作还处在确立女性与男性同为文学史上主体的起始阶段。女性文学史在“浮出地表”之后,如何演绎自己的存在、规避女性视角的逼仄,尚需要文学史家做出艰苦的努力。

### (五) 网络文学入史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有了长足发展,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读者人数都在激增,写作体式

和手法更是五花八门,对纸媒文学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丰富和补充。有的已经从网上走到网下,在报刊、出版、影视等领域取得不俗成绩。从纸质到网络,从精英到大众,写作空间在转变,阅读人群在分化,网络文学阅读甚至成为青年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着涉及创作、改编、演艺等领域的庞大产业链条。面对这样一个潜能无限的庞然大物,我们的文学史家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类型化、群体化、分层相对清晰的易变世界,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眼光理解网络文学并援引入史,实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 (六) 写法多样性问题

大多数文学史文本依循的是“教科书模式”,写法单一,缺少变化。多声部、多元化不仅应当体现在文学史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中,还应贯穿在文学史文本的写作活动中。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采取思潮总论、文体分类、作家作品赏析相结合的通史写法,偏重条目化的定性分析,以嘉惠后学、传承文脉的高蹈视角,呈现文学史之“是”,回避其“不是”,用明确的结论取代适度的含混、抽象的理念取代多变的现实,教条化、雷同化严重,一再错过文学史应有的生机与生气。文学史写作有多种体例和方式,通史、断代史、编年史、文体史、性别史、口述史、纪传体、评论体、史话体、目录体……不一而足。文学史写作理当兼容并蓄,放弃居高临下的视角,平等对话,让文本向着读者、向着未来敞开。

杰姆逊曾说:“阐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发生在荷马的战场上,那里无数阐释选择或公开或隐蔽地相互冲突。”<sup>[17]</sup>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年代,文学史叙述将会在不时的质疑声中一路前行,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化解所遇难题,也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文本包罗万象、完美无瑕。可以借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来形容文学史写作,“像一切历史一样,文学史也是‘流’,所谓‘流’意味着它既像流水一样是流动的、潮起潮落的,又像时间一样是绵延的、缜密细腻的”<sup>[18]</sup>。文学史写作只有现在时,没有完成时。“一部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艺术发展史,而且也是包含着各种精神、意识的发展史”<sup>[19]</sup>。文学史的时空视野是广阔的,文学史家走入文学史的路径亦是多向的,我们理当在文学史的文本世界里看到社会的繁复、生命的色调、美的生长、爱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史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美学史、精神史、心灵史、人性演变史、读者接受史等等的综合体。

## 注释:

- ①早在1880年,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撰写、出版《中国文学简史纲要》,为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本。
- ②为了更好地表现文学史写作的整体性和延续性,文章采用“中国新文学史”一说,而不是依据社会性质和时间节点划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说法。

## 参考文献:

- [1]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
- [2]吴亮.对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的怀疑[J].上海文论,1989(6).
- [3]罗岗.记忆的声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41.
- [4]王岳川.中国镜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66.
- [5]钱理群.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J].文艺理论研究,1998(5).
- [6]赵园.也说“重写”[J].上海文论,1989(6).
- [7]李钧.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61.
- [8]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

- [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19.
- [10]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C]//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6.
- [11]歌德.浮士德·献词[M].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
- [12]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1988:48.
- [13]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121.
- [14]田中阳,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6.
- [15]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5(6).
- [16]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J].文学评论,2007(5).
- [17]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
- [18]张光芒.“流动的”文学史与范式价值:读《中国新时期小说大潮》[J].天津社会科学,2002(6).
- [19]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5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What Kind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istory Do We Need?

LIU 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s a traveler needs to remind himself of “why to start”, the literature history should be constantly revised. Literature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text of literature history has not stopped the changing. Facing the “rewriting” i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people seem to be never satisfied.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new democratic discourse” is politicized, and “enlightening discourse” is shown as beautification…… Although absolutism is not good, relativism also needs in - depth consideration. We don't need a single or otherness literary history, nor a closed and over explained literary history. What we need is a pluralistic, developing and reflecting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Chinese new literature history; rewriting; diversification; reflection; development

#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张 静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872)

**摘要:**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倾向重申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性,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存在共通之处,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打破80年代以来审美自律的“内部研究”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启发。然而,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批判力度被弱化以及疏离中国现实等问题。本文对文化研究这一批评模式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及其理论模式进行梳理,分析其对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和启发。

**关键词:**文化研究;马克思文论视野;批判功能;个案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07-08

从西方传入的文化研究理论<sup>①</sup>与马克思宏观政治学批判有着本质上的共通性,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以其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点,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介入、批判现实的话语理论工具,藉以分析21世纪经济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开拓新的批评空间、满足文艺理论发展的内在需求。

中国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却呈现出了批评力度弱化及疏离中国现实等问题。文化研究强烈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在不断减弱,没有对权力、资本、体制、现代性等社会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而是专注于具体个案研究,热衷于追随消费主义的足迹,对分析日常琐碎现象乐此不疲。文化研究的批评模式渐趋为一种社会学民俗学的眼光。

对于文艺理论批评者来说,这种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思维是否相去甚远?或者说从一开始国内文化研究者的定位是否就没有像英美学者那样从对社会的批判性角度去考虑,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自娱自乐?同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如何保持文化研究敏锐的宏观视野和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锋芒?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重点阐释21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文化研究在我国的理论吸收和具体实践,并对其批判功能进行理论反思,以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研究未来的走向。

## 一、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文化研究还基本处于简单译介和初步应用阶段,研究者主要热衷的是译介和引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精英式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热潮空前高涨的社会背景下,有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开始了反思和质疑,主要质疑它与中国本土理论语境和文化的契合度上,反思是否存在生硬套用西方理论的现象,并积极寻找消费大众的正面价值和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sup>②</sup>

部分文化研究学者开始转型,对大众文化产生认同,出现了大量肯定相关的著作、文章、辑刊和网络

收稿日期:2017-12-15

作者简介:张静(1976—),女,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文艺美学。

站,在部分高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和机构,各类相关研讨会也随之召开。

大陆文化研究的两份代表性刊物《文化研究》<sup>③</sup>和《热风学术》的出版,由李陀主编的《视界》学术辑刊,文化研究网站“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网站“当代文化研究”等,都为文化研究理论与本土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sup>[1]</sup>

2000年前后,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以及各大学术出版机构纷纷推出传播学译丛。<sup>④</sup>各种直接介绍文化研究的“导论”与“读本”也大量被译介,这些译介工作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和新维度。

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随之在学界轰轰烈烈地展开<sup>[2]32</sup>。

首先是学者们就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的复杂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于2000年第6期发表一组关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的笔谈,几位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围绕西方文化理论如何与中国本土现实语境有机融合进行反思。金元浦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指出中国大众文化是一场解构神圣的世俗化运动,是市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陶东风的思考主要聚焦在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问题,即反省西方批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陈晓明就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他明确指出,“文化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新的意识形态产生的超级机器”,需要中国的文化研究者面对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问题。周宪比较辩证地分析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异同,重点指出了这两种研究范式潜在的问题。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则对大众传媒表示了充足的信心,他相信媒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为消费社会中饱尝“失语”焦虑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切入社会实践领域的契机。<sup>⑤</sup>

其次,一些学者从跨文化和全球化的理论视角来分析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是王宁。<sup>[3]</sup>王宁的见解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这就导致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被消解。王宁主张将“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因素和有意义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这样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也可以为未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课

题或理论思考的视角。”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补的一种选择。<sup>[4]</sup>

另外,跨学科特点是文化研究的一大显著特征,学者罗钢和孟登迎对此有着比较精辟的分析,他们阐释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在两个方面与传统学术有着差异:第一,文化研究将个人经验变成了研究材料。第二,文化研究对文化体制尤其是学科体制进行批判,反学科实践本身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sup>[5]</sup>

以上可以看出,世纪之交,随着伯明翰学派、费瑟斯通等英美当代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范式进入中国,并挑战原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模式在国内的单一统治地位,中国的文化研究者进行了新一轮的反思和实践。

## 二、文学与文化的争论

在新世纪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引发学界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争论,包括学科边界、研究对象、文化研究在理论界的合法性,还包括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等问题。其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成为当时学术界参与人数最多、论证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报刊均开辟专栏发表系列文章讨论这个话题,共有200多篇论文参与探讨。

2002年第一期《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首次在大陆的学术语境中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含义以及文艺学如何应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正式出台的重要标志,是《文艺争鸣》在2003年发表的一组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笔谈,集中推出了王德胜、陶东风、金元浦等7位学者的文章。这组具有冲击力的笔谈,引发了中国美学界和文艺学界关于该话题争论的导火索。正如该专题的“编者小识”所言,新世纪需要一种广泛的文化研究去应和文艺生活化的转型现实,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文化的转向。<sup>[6]</sup>

在2003年的笔谈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讨论会,随后《艺术研究》2004年第一期继续发表了一组“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笔谈,逐渐扩大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



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召开了“文艺学的边界”学术会议,集中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和文艺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同年6月,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召开“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sup>[7]</sup>

纵观这场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审美泛化即“新的美学原则”问题所引发的论争。学者们很多是从批判的角度加以阐述。黄应全认为,要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中国当代美学中的“美学泛化”区别开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意味着原先非审美的生活领域向审美领域(艺术领域)的入侵,相反倒是审美领域向生活领域的扩张。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虽然确实意味着美学泛化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当代美学中存在的那种美学泛化是值得肯定的。<sup>[8]</sup> 鲁枢元随后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倡者们混淆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口号,“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目的,是希望确立这种技术化美学理论的绝对话语权。<sup>[9]</sup> 毛崇杰从知识论和价值论上说明,“日常生活审美化”只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建构”姿态的颠覆谋略,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其主要哲学基础为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sup>[10]</sup> 赵勇同样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批驳陶东风将中国的文化研究带入了一种误区:“日常生活审美化”工作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缺少其价值判断,因而会使中国的文化研究出现批判精神的下滑、问题意识的缺席、价值立场的暧昧等问题。<sup>[11]</sup>

“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造就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驳与反对,但也有诸多学者认为,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是美学的大势所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确带来了美学的变革。比如王德胜提出可以从“感性学”本来的出发点去理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及问题。<sup>[12]</sup> 高建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其实早已有之,这是个被主流美学所压制但却一直存在着的传统,回到杜威那里,可以更明确地看到这种回到生活的美学主流趋势。<sup>[13]</sup> 周宪通过较多的例证说明,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这一特定语境的产物。<sup>[14]</sup>

二是由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学科边界问题

的论争,主要是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与整个文化研究思潮合流,深化了人们对文艺学学科的认识。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扩容一般持肯定态度。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是陶东风和金元浦。

陶东风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sup>[15]</sup> 同时,陶东风又明确指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建构的产物。中国文艺学必须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方法。<sup>[16]</sup>

金元浦的观点与陶东风基本一致,指出作为转型期的当代文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文学的体裁和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也一直处在变动中。<sup>[17]</sup> 金元浦《在历史的思索中前行》(《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和《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两篇长文,对其观点做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重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其他学者,如阎景娟<sup>[18]</sup>、陈晓明<sup>[19]</sup>等也都阐述了文学跨界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研究要进行文化转向。

另一方面,钱中文、童庆炳、朱立元等学者则展开对文学研究扩界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虽然并不否认文学研究边界的移动性,但他们对文学理论的“扩容说”却提出强烈的质疑。童庆炳坚持认为,把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文艺学研究,实质是鼓吹文学终结论,他认为具有独特审美场域的文学是任何艺术也无法取代的,文学不会终结。<sup>[20]</sup> 朱立元等学者随之呼应,认为当今出现的新文学现象虽然在量上扩展了文学版图,但并没有导致文学边界和范围的消失,文学的边界依然清晰,文学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没有消失,当代文艺学要坚守文学艺术的自律立场,以文学学为中心而不是无限扩容。<sup>[21]</sup>

总而言之,21世纪初,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吹响了文化研究的号角,冲击了原有的美学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学者引起的震动都是

空前的,并且至今仍然持续引发着相关思考。

### 三、文化研究的范式

在21世纪初“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诸多争论的热潮之后,文化研究者们也渐渐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实践指归,笔者根据文化研究代表性学者的不同研究思路,大致将其分为现代派范式、新左派范式和民族志(个案研究)范式。

#### (一)现代派范式

现代派是相对于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立场而言的,其理论出发点是对大众消费文化的研究,是在新世纪初对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中,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视角。这种理论范式更多的是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世俗化转型角度,去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sup>[2]42</sup>现代派范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陶东风、金元浦、陆扬等,必须指出的是,现代派理论范式的学者也是有个人差异的,理论兴趣由最初的趋同转而走向分野。

陶东风是在文化研究战线反思最多、思想游走差异比较大的一位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陶东风第一篇关于大众文化的专题论文《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其中还明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他就开始从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热衷逐步转向社会理论,认为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是中国新世纪现代化转型的必然伴生物,在现代社会具有消解一元文化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由此,陶东风阐发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比如《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2002年引发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讨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以及提出解神圣话题的《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等等。

在陶东风推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十年后,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又率先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当时是对传统精英主义美学的强有力冲击,导致了文艺学和文化领域研究范式的调整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象完全的价值认同。陶东风明显表现出文化批评中的政治批判意向,他认为,十年来中国消费文化的畸形繁

荣,已经掩盖了公共政治领域的萎靡,现在急需建构一种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政治批判话语去抗衡这种消费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向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学习,把文化价值上的批判精神和学科上的平民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sup>[22]</sup>可以说,陶东风对大众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理论范式始终保持着融合中国现实语境的期望,希冀在不同的时代有新的思考和突破。

金元浦是现代派里面面对大众文化最为积极的拥护者,自始至终基本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消极面。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过文章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来对大众文化进行道德与审美批判,到21世纪后基本都是强调当代大众文化的合法性。他认为,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大众文化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sup>[23]</sup>由此,金元浦提出了文化进入市场、进入产业,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构想。从21世纪初,金元浦即投入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潮中,发表了100多篇有关文化创意产业(约2002—2003年)、人文奥运(2004—2013年)、互联网和创客空间(2014—2016年)等文章,同时积极投身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成为北京人文奥运研究基地的领军人物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有力推动者。

应该说,金元浦的文章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众文化、特别是视觉文化、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拓展公共空间方面的民主化潜力,也关注弱势群体利用这种空间的可能性。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個研究视角。不过,金元浦对于大众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关切偏于理想化,很少关注大众文化背后的政治维度和批判意义,这与文化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批判工具来说还是有距离的。与金元浦的研究范式比较趋同的还有金民卿的《大众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祖朝志的《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批判》等文章,都倾向于把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市民社会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形态理想化,未能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分析它的存在形态和历史意义。

陆扬作为学院派的代表,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比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2000年出版的《大众文化与传媒》,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启蒙性读物,一定程度上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个反批判,包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都提供了更为新近的反思视野。2005年陆扬、王毅合著《文化研究导论》,迄今一版

再版,是介绍文化研究理论资源比较全面的书籍,现在也作为文化研究的教材,影响深远。同时,陆扬也开设了文化研究相关课程,撰写了大量西方文化研究的文章,为中国文化研究者接触西方最新理论资源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 (二)新“左”派批判范式

新“左”派的文化批判范式是注重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意识形态阶级分析,认为现在的大众文化只是中产阶级的、特权阶级的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能代表底层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利益立场。新“左”派批判范式的代表人物有:旷新年、戴锦华、孟登迎等。

新“左”派批判范式最早的一次集体出场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读书》杂志上(1997年第2期)。该期刊出的系列专题文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新“左”派文化理论的核心——大众文化的“大众”不是以前贫穷的大众,而是中产阶级的“小众”,而真正的大众文化应该能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旷新年在《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中明确指出,随着大众文化概念的出现,“大众”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扭转和变化,“大众”这一历史主语已经转变成了为白领大众。旷新年的另一篇代表性文章《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天涯》2003年第1期)中,更由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走向对整个文化研究的冷嘲热讽,批判文化研究没有政治目标,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和文化斗争。

新“左”派批判范式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戴锦华。戴锦华在1999年出版的《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中,反复申明一个重要观点:中国的大众文化是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正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的隐形书写。<sup>[24]</sup>在她主编的另一本书《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在的文化精英是被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中产阶级文化英雄,一个更为巨大、无声求助的社会群体却隐入不可见之中,远未被关注。<sup>[25]</sup>在戴锦华的代表性论文《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天涯》1999年第2期)中,戴锦华从“广场”这个词的含义变化切入当今商业与政治的合谋,标明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来临。她认为,大众文化与消极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是同谋关系,为新富阶层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新“左”派批判范式还有一位学者是孟登迎,他

的观点是,要走出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困境,不能只讨论个案研究与理论研究孰轻孰重的问题,也不能只从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寻求突破,更要深入探讨文化研究者自身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研究者只有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关注弱势阶层文化权力,自觉担负起“批判性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才能让文化研究学术与政治生活保持相互促进、相互对话的生动关系,才能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sup>[26]</sup>

纵观新“左”派的研究范式,虽然比较敏锐地抓住了大众文化的最新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把大众文化进行了简单的化约,似乎所有大众文化均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没有看到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其次,把消极自由主义、大众消费文化、主流文化简单等同;最后,新“左”派在对待中国消费文化的问题上过于悲观。

## (三)民族志研究范式

从上可以看到,无论是9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方式,还是新世纪现代派或新“左”派研究范式,无论其对大众文化是肯定还是批判,这些范式都有着明确而强烈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这些文章相对而言是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证,与现实生活相隔较远,未免流于空泛。而田野调查或者民族志研究,恰巧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民族志或者个案研究范式的使用者很多,并且成为近几年应用最广的文化研究范式。陶东风、金元浦、周宪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辑刊,比较集中地刊登过学者的个案研究,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

针对后殖民理论和身份是学者分析比较多的议题。正如陈晓明所说过的:“后殖民理论由于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它的锐气和后劲,因而它所表征的政治性问题就更加引人注目。”<sup>[27]</sup>在《文化研究》第4辑中,张颐武就集合文化身份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分析张艺谋电影的内涵,用比较细致的描述,将中国的文化现象与世界秩序联系起来。<sup>[28][31]</sup>同期刊登的张锦的《无声的河——中外聋人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意味》,从中外聋人电影的角度去关注当代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意在揭示电影意义的生产,揭示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分配。<sup>[29][43]</sup>

《文化研究》第8辑专门设了一个专题“中国当代文化专案研究”,其中祁林的《被消费的“怀旧”:历史符号的再生产》,以上海“新天地”为个案,通过历时性的上海锦溪文化脉络解析和共时性的全球化

进程与国际大都市的关系梳理,揭示了“新天地”作为上海的一个历史符号所具有的复杂意义。同期张羽的《公域与私域间的博客文化》关注博客文化,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博客文化在混淆公域与私域界限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公共性,并没有实现公共领域理性交往的原则,反倒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sup>[30]</sup>

有关个案研究的书籍也相继出版,比如邵燕君的《“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赵静蓉《抵达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现象》等等。透过这些表意实践的专案研究,我们也可以瞥见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性走向和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民族志、个案研究大众文化,有助于避免研究范式的简单化和空洞化,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看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也是研究大众文化需要提倡的思路。但是我们在强调经验和个案研究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抛弃立场和价值判断,不带任何价值立场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在具体、深入研究对象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自己的批判价值立场。

#### 四、文化研究向何处去:问题和展望

2010年以后,人们的娱乐热情高涨、公民意识淡化、政治热情消退的社会文化思潮空前突出,文化研究的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研究的关注点究竟是整体理论还是个案分析,文化研究路在何方?成为又一个令人思辨的议题。

盛宁的文章《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是重视个案分析的典型。盛宁认为,我们这十几年的文化研究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的问题当成了理论问题,而个案分析做得远远不够,应认清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把对文化研究的伪理论兴趣转向对于现实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sup>[31]</sup>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给予本土化反思,比如朱国华的文章《阿多诺德大众文化观与中国语境》、赵凯的《大众文化的定位与批评尺度——兼与陶东风商榷》以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他们都就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代表着近年来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集中反思。<sup>[32]</sup>

尽管盛宁的重个案研究思路受到了一批研究者的支持,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王伟就不满盛宁

对我国文化研究轻实践的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无的放矢的批评,是将理论与实践机械地一刀两断,文化研究理论的分析对象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世界,其理想目标是力图帮助人们理解、洞察世界调配意义的奥妙。<sup>[33]</sup>

王伟对盛宁的质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是无力的,因为实际上,2010年以来,文化研究正沿着盛宁所提倡的重视实践和个案越行越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新近出版的有关文化研究的书籍中,占据第一位的是有关文化产业的内容,有讨论文化产业如何走出国门,有讨论企业文化(诸如家乐福、沃尔玛)的案例研究,等等。依次排列下来,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物保护的也占据不少数量。同时,有关地缘文化、民俗文化、区域空间研究的热度不减,比如有关各城市竞争力的报告、历史文化名镇的分析、藏族唐卡、侗族等少数民族风俗研究等经久不衰。另外,媒介网络文化、消费文化也占据了很大比例,“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遍地开花。而涉及文化研究理论的书籍已经少之又少,最多也就是类似于张西平的《20世纪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这种带有综述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那么,我们要问,对于文艺理论批评者来说,结合现代社会语境如何保持文化研究敏锐的宏观视野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锋芒,中国文化研究未来的走向如何?是否继续对这样一种分析日常琐碎现象乐此不疲?很明显,目前我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存在着批判力不足、定位不明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文化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日趋局限,批判力度弱化,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对文化研究理论定位的问题。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所言:文化研究迷恋于文化建构的解析,但不应因此夸大文化的作用而遗忘其政治行动;文化研究侧重于解释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文化研究目前分析的对象过于具体和琐碎,过于大众通俗化,那么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什么,需要聚焦考察的部位在哪里?要执着于什么样的主题?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现实?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次,以反学科、反体制、反规范著称的文化研究正日益学科化、体制化、规范化,引发对文化研究边界和学术建制的争议。反对者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必然导致文化研究的式微、边缘化,甚至踏上穷途末路。“这种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自有道理,但确是违背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的。而学科制度化后,它无疑也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征用的学术资源,

从而陷入与文艺学学科相似的困境之中。”<sup>[34]</sup>但也有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持肯定态度,徐德林表示,文化研究是有别于文学研究的一门跨学科的学科。一些学者反对文化研究及其学科化,是因为他们知识储备不足,在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与文学没有关系的知识体系中都经验欠缺,无法打破学科壁垒,因而也无能力承担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工作。另外,有些学者反对文化研究学科化,也有可能是担心文化研究学科会动摇原本文学批评的根基。按照徐德林的观点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效利用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合法性,积极有效地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设。<sup>[35]</sup>

最后,当前的文化研究应大力关注中国当代宏观性的社会、政治问题。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如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身份认同、性别、民族主义等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同样重要的问题,有些则并不构成核心问题。<sup>[36]41</sup>中国的文化研究如果要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做出贡献,就需要针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的状况,可提出中国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关注当代文体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比如转型社会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这几种文化形态的分离与关联等。文化研究在中国就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之,中国文化研究应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念,以中国当下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将文化研究本土化。可以说,中国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 注释:

- ①本文所提的西方文化研究除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外,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 ②从广义上讲,中国的文化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于21世纪初达到高潮,其最核心的对象是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参见陶东风、和磊、贺玉高:《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约1990—2010)》,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③从2000年至今,《文化研究》已经出版了25辑,专题内容涵盖相当广泛,包括视觉文化专题、纪念布尔迪厄专题,身体文化政治专题,大众传播与公共性专题,文化研究的谱系专题,亚文化研究专题,粉丝文化专题,空间研究专题,

文化记忆专题等,都集中推出中外前沿学者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研究最新成果。

- ④其中周宪和许钧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本西方传播学、大众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中译本。
- ⑤这组笔谈文章的具体内容参见金元浦、陶东风、陈晓明、周宪、尹鸿:《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6)。

#### 参考文献:

- [1] 颜桂堤. 文化研究、中国经验与介入[J]. 东南学术, 2016(1).
- [2] 陶东风, 和磊, 贺玉高.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约1990—2010)[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3] 王宁. “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 1996(5); 面对全球化: 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J]. 文学前沿, 2000(1); 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经典的重构[J]. 外国文学, 2007(6).
- [4] 王宁.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J]. 文学评论, 2000(3).
- [5] 罗钢, 孟登迎. 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J]. 文艺研究, 2002(4).
- [6] “生活”概念、生活转型、日常生活的文艺学: 编者小识[J]. 文艺争鸣, 2003(6).
- [7] 金元浦, 等. 继承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的影响[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5.
- [8] 黄应全.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J]. 文艺争鸣, 2003(6).
- [9] 鲁枢元. 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J]. 文艺争鸣, 2004(3).
- [10] 毛崇杰. 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也评“新的美学原则”[J]. 文学评论, 2005(5).
- [11] 赵勇. 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怎样做“文化研究”? ——与陶东风教授商榷[J]. 河北学刊, 2004(5).
- [12] 王德胜. 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 答鲁枢元教授[J]. 文艺争鸣, 2004(5).
- [13] 高建平. 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J]. 北京大学学报, 2007(4).
- [14] 周宪.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 [15] 陶东风.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J]. 文艺研究, 2004(1).
- [16] 陶东风. 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 文学评论, 2004(6).
- [17] 金元浦. 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J]. 河北学刊, 2004(4).
- [18] 阎景娟. 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J]. 文艺争鸣, 2003(6).

- [19] 陈晓明. 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 [C]//问题(第一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20] 童庆炳.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J]. 人文杂志,2004(5).
- [21] 朱立元,张诚. 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J]. 学术月刊,2005(2).
- [22] 陶东风. 文化批评向何处去? [C]//“文学理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暨中外文化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三届研讨会”论文集,2011.
- [23] 金元浦. 重新审视大众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00(6).
- [24] 戴锦华.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25] 戴锦华. 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26] 孟登迎. 文化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6).
- [27] 陈晓明. 文化研究与政治合法性陷阱[J]. 中国社会科学,2000(6).
- [28] 张颐武. 《英雄》:新世纪的隐喻[C]//文化研究(第4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29] 张锦. 无声的河:中外聋人题材电影中的文化意味[C]//文化研究(第4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30] 陶东风,周宪. 文化研究(第8辑)[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1] 盛宁. 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J]. 文艺研究,2011(7).
- [32] 蒋述卓,曹桦. 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J]. 外国文学研究,2015(2).
- [33] 王伟. 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J]. 学术界,2011(10).
- [34] 赵勇. 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 [35] 徐德林. 文化研究学科化即末途之旅? [J]. 中国图书评论,2015(3).
- [36] 刘康. 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理论创新[C]//文化研究(第8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Chinese “Cultur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ZHANG Jing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a critical theory and method, cultural study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scholars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1990s. The criticism methods of cultural study, which have commonalities with Marxist literature, tend to reiterate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y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ies to break the “internal research” mode of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of weakening the critical function and alienating China’s reality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work, we will sort out the process of “theory travel” and its theoretical model of cultural criticism in China and analyze its challenges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Key words:** cultural study; Marx’s literary view; critical function; case study

# 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乡村权力的异化

姬亚楠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郑州 450002)

**摘要:**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权力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都市社会的亚文化不断侵袭着乡土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权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对权力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金钱与权力的深度融合导致权力更替异常艰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放弃乡村道德底线,使得“笑贫不笑娼”的价值理念在乡村横行,践踏了乡土社会的纯洁,更有甚者不顾廉耻大发“村难财”。另一方面,随着乡村自治制度的不断深入,村长的权力被强化,成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村民对特权的崇敬和畏惧导致人性发生畸形变化;基层组织任意曲解上级组织的监督制度,对上级组织表现出病态的附和与献媚。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发现并捕捉到当下乡土社会权力的变化,揭露出乡村权力的阴暗面,发掘出被体制化了的人性弱点。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乡村权力;钱权结合;乡村自治;权力异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15-05

“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sup>[1]123</sup>人类对权力的欲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权力欲充斥于人的生活,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的行动。人们对权力的敬畏与仰视,源于权力本身所具备的优势,反过来,权力与利益的深度结合又刺激着权力欲的滋长,“乡土存在者一方面参与到这种权力的渗透中,追逐权力,另一方面又在权力之下不断失去自己存在的空间而无处可逃。”<sup>[2]128</sup>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们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困境,特别是权力机制带给乡村新的异化,这种异化使得乡村权力日渐成为扎根于乡土社会的毒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作家们不断拓宽创作视野,发掘乡村权力的黑幕,揭露乡村权力对人的戕害。

## 一、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权力异化

新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现代都市社会展现出的魅力冲击着传统乡土社会,都市亚文化不断摧残着乡土社会的脉脉温情。拜金主义、消费主

义逐渐向乡土社会渗透,并悄然吞噬着乡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滋生了权力欲。“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者利益可以不必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sup>[3]58</sup>换句话说,经济利益激化了更加激烈的权力争夺。

### (一)病态化的村长竞选

权力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村长竞选遂成为人们争夺权力及利益的主要手段。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将笔触深入到村长竞选的内幕,揭露权力争夺的真相,暴露竞选过程中人性的扭曲,如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尚志的《海选村长》、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曹征路的《豆选事件》、刘庆邦的《黄泥地》等。作家们细致地刻画了权力争夺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一场场的明争暗斗中,乡土社会“不再是安宁、自足的世界,权力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他者’,其进入消解了人们之间原有的温情,并导

收稿日期:2017-12-15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生态视角下河南省乡土社会价值重建问题研究”(162400410086)

作者简介:姬亚楠(1987—),女,河南焦作人,文学硕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致对它的赤裸裸争夺,民风淳朴的乡民们沦为权力的奴隶”<sup>[4]250</sup>。竞选者机关算尽,用尽手段拉票,上演了一场场乡村闹剧。

在《凉哇哇的雪》中,小说家葛水平再现了李宝库与黄国富竞选小河西村长的全过程。李氏作为村中大姓,李宝库自然拥有极高的人气;而黄国富作为小河西村首富,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了争夺民心,取得村长竞选的成功,李、黄两人走访送礼、请客吃饭,上演着一出出花样百出、斗智斗法的竞选大戏。“把外出的小河西村民叫回来的人是他们俩,买锅做饭的人也是他们俩……同时在城里请了厨师。这时候不仅仅是解决吃饭问题,是比高低上下,比厨艺,往脸上贴金的时候。两个师傅一来就从小河西村的政治气候中比上了。”<sup>[5]63-64</sup>李、黄两人请来城里最好的厨师,把外出打工的村民叫回来,小河西村民都放下手头的农活前来观战。竞选村长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两名厨师在“将军”的指挥下大显身手,表面上看是热闹非凡的厨艺比拼,实际上是李、黄两人借厨艺比拼来展现各自的实力,增加各自竞选的砝码。李、黄二人看重的是村长权力所能带来的真真切切的实惠,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拉选票,满足个人私欲的拉票行为消解了村长竞选的民主性。

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作家李洱再现了官庄村长竞选前后的人情世态。孔繁花作为现任村长,为了获得连任,与丈夫四处请客拉票,使出浑身解数,上演亲民表演。孔繁花洋洋自得,自认为稳操胜券,但就算机关算尽,仍然暗箭难防,新任村长的大印却落入自称“丫鬟”的孟小红囊中。作品的结尾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在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虚情假意。

阎连科的《耙耧山脉》描写村民为争夺返销粮账本和大队公章而展开激烈争斗,揭示了在经济利益面前人性的丑恶和扭曲。

在刘庆邦的《黄泥地》中,乡村权力的争夺不再是竞选者激情四射地讲演,而是体现集体意志的“民主”争斗。房户营村的房光民接替父亲房守本成为新一届村支书,激起了村民对于村支书选举的愤怒,“难道支书有种,有根,支书的种播在房守本家的大床上了,支书的根扎在房守本家的老坟地了!难道村里别的人都是缩头鳖,肉头户,就不能接过支书干一干!”<sup>[6]12</sup>于是,村民房守现开始拉拢房守彬、房守云、房守成、高子明等人,针对选举的非民主性,通过县高中教师房国春逐级上访,最终将房光民拉下台,房守现的儿子房光金当上村支书。

这一系列看似民主的争斗,最终却成为满足房守现一己私欲的权力斗争,房国春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大牺牲者。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为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无正义性,更甚者,权力争斗成为笼罩在乡村上空的毒气,荼毒着村民,摧残着乡村的政治生态。

## (二)钱权结合下的权力更替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表现权力更替时,与以往的作品描写乡村权力有着巨大的差异,即金钱对权力更迭的决定性影响越来越大。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集体式地将目光投向钱权结合这一话题,权力拥有者和金钱拥有者成为利益共同体,权力拥有者争权是为了谋取利益,而金钱拥有者只有利用权力拥有者手中的权力才能攫取更大利益。因此,权力更替不仅是基层组织的政治行为,更是经济行为,乡村权力是既得利益双方誓死捍卫的阵地。无论是哪一方,一旦失去阵地,利益必将受损,必须再次费尽心机夺取权力,来保障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因此,既得利益者对乡村权力拥有者的维护与支持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如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先后讲述了楚暖暖两次对抗乡村权力拥有者的“战役”,结局却截然相反。第一次楚暖暖联合全村力量,成功地将村长詹石磴拉下马,推举丈夫旷开田当上了村长。而第二次的抗争却历经坎坷、困难重重,旷开田在以薛传薪为代表的财团的支持下,在楚王庄兴建娱乐休闲度假村——赏心苑,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旷开田抛弃道德底线,大肆敛财,允许赏心苑经营色情服务,弄得楚王庄乌烟瘴气,村民怨声载道。楚暖暖再三劝阻无果,便联合群众进行第二次对抗行动,但这次“起义”阻力极大。为了一己私利,旷开田利用手中的权力,不顾夫妻情分,给楚暖暖制造一系列麻烦,反抗行动以失败告终。表面上看,作家只是讲述了两次截然不同的竞选结果,实际上,却深刻地揭示出钱权勾结所形成的巨大的网状式的力量,其覆盖面之广已不是群众集体力量所能抗衡。

再比如刘庆邦的《黄泥地》,作品以村民们对新任村支书人选的不满拉开序幕,房守本将村支书的职务以看似正当的手段传给了儿子房光民,其中的好处不言自明“吃当支书这碗饭有没有好处,房守本心里最清楚,要是没有好处,他不会把饭碗传给儿子”<sup>[6]13</sup>。权力背后的经济利益所有人都看得到,这也就激起了房守现对村支书职务的“覬覦”,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将房光民拉下村支书的位置,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可以想见。



### (三)为攫取暴利干涉乡村建设

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已为人所共识,在经济利益面前,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为了攫取暴利,人们不惜利用权力摧毁乡村道德,干扰乡村建设。如在阎连科的《丁庄梦》中,作家讲述了丁庄村的大血头丁辉为了一己私利,用不卫生的采血设备,怂恿村民卖血,导致全村人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他不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利用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出卖自己的良心,向病入膏肓的村民高价出售寿材,大发“村难财”。作品毫无避讳地揭露了丁辉通过权力关系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掌握并支配着乡土社会中村民最看重的生死归属问题。

在刘庆邦的《黄泥地》中,房守本对乡党委书记杨才俊的批评、指责不屑一顾:“别说两条,一百条都不怕。他说几条,咱有几条等着他。第一,土该挖只管让人家挖,人家都交过钱了,总不能再把钱退给人家吧。你们不知道,杨庄寨的砖窑就是杨才俊的堂弟办的。如果没有杨才俊在背后撑腰,谁敢在咱们这块一马平川的土地上办砖窑!”<sup>[6]148</sup>房守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贩卖国家土地,大肆开砖窑,其根本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即是权力拥有者,这种金钱与权力间的深度融合,不仅使村民投告无门,更摧毁了乡土社会的原貌,阻碍了乡土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乡村权力在人们贪婪欲望的作用下走向畸形。竞选者为了权力背后的经济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明争暗斗,使得竞选充斥着强烈的功利色彩,村民们像看西洋景一样观赏着一幕幕权力争夺闹剧。在嬉笑怒骂、浑浑噩噩中,村民行使了投票权,丧失了选举的民主权力,沦为权力拥有者的奴隶。作家们毫无保留地揭示出钱权勾结下乡村权力的腐败,暴露出乡村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黑暗交易,讽刺了乡村权力不再是维护人们权益的工具,反而成为压制民间力量、攫取民间利益的手段,同时权力在金钱的保驾护航下,变得坚不可摧。掌权者利用乡村权力干扰乡村建设、摧毁乡村道德。乡村领导层为了追求名誉政绩、物质利益,不顾舆论压力,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甚至打破道德底线,引导妇女从事不正当职业发家致富,在摧残妇女肉体的同时,严重践踏了乡土社会纯洁的精神内核。

### 二、官僚体制作用下的权力异化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对乡镇事务国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不直接管理具体乡村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公民特别是农民参政议政意识的自觉,也是农民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逐步走向成熟走向自信的表现,可农民固有的狭隘,旧有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的参政意识染上了浓厚的悲剧意味。”<sup>[7]</sup>村民自治制度旨在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力提供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但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村长的权力,导致村长的权力被放大。乡土社会原有的安宁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不复存在,人性的丑陋与自私暴露无遗。一方面,乡村自治制度强化了村长的权力,村长成为乡村特权阶层的代名词,无形中滋生了村民对乡村特权阶层的崇敬和畏惧,导致人性发生畸变;另一方面,为加强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上级走访制度势在必行,然而,这种走访监督制度被下级领导曲解,表现出病态的附和与献媚。新世纪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嗅觉、独特的视角揭露乡村权力的畸变,暴露乡村权力的阴暗面,发掘被体制化了的人性弱点。

#### (一)乡村自治体系强化村长权力

乡村自治原本是国家赋予村民民主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旨在强化乡村事务村民的自主解决权。但实际上,乡村自治并没有给村民更多的自行解决乡村事务的权力与自由,反而强化了村长的权力,使村长成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掌握着乡土社会的“生杀大权”,改变着乡土社会的原貌。一方面,村民对乡村权力的崇敬和畏惧使之逐渐丧失善恶美丑、是非曲直的价值评判标准,一味向乡村权力妥协、屈服,更有甚者放弃了除生存权以外的其他人身权力,如自由权、哺育权、生育权、人格应当受到尊重的权力等。

乡土社会的种种变化,投射在作家的笔下,“以关注现实为基础,扎实进行艺术创新是中原作家的一个优秀传统”<sup>[8]</sup>。阎连科践行这一创作传统,将现实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展现了乡土社会一幕幕的生存悲剧。在他的《天宫图》中,路六命的妻子被村长玷污,身为丈夫,不仅没有勃然大怒,替妻子讨回公道,反而亲自烧水将妻子洗干净等待村长的“临幸”。在阎连科笔下,村长手中的特权将路六命的所有尊严践踏得粉碎。在季栋梁的小说《冰容》中,赤裸裸地讲述了一位农村母亲春芳,因担心不去给村长的孩子喂奶而得罪村长,不得不含泪抛下自己正在哺乳期的孩子,去给村长的儿子喂奶的心酸故事。

此外,王跃文的《放下武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毕飞宇的《玉米》、刘庆邦的《黄泥地》等作品,都刻画了自大妄为的村长形象,揭示了村长滥用职权践踏女性尊严。这在《湖光山色》<sup>[9]</sup>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村长詹石蹬利用职权,肆意欺辱村中妇女,

旷开田出事后,楚暖暖求詹石蹬帮忙,身为村长,詹石蹬想到的却是霸占楚暖暖。楚暖暖不从,愤然离去,詹石蹬反而将事情越闹越大,楚暖暖为保旷开田,只好忍气吞声地屈服。

身为村长,不仅不替村民排忧解难,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乘人之危玩弄暖暖,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然而,詹石蹬的可恶之处更在于,明明是他恶意施暴强迫暖暖,却偏让暖暖甘愿受辱、自轻自贱,这种身体、心理的双重羞辱使得女性的屈辱感倍增。

另一方面,村长作为乡土社会的特权阶层,村民对特权的向往导致其乐于、勇于向乡村领导层攀亲。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当村长刘大头的老婆将自己的妹妹黑牡丹介绍给鞠广大时,鞠广大最先看到的不是黑牡丹这个人,而是黑牡丹与村长的关系,如果他能娶到这个女人,那么他跟刘大头的关系便与村中其他人不一样,摆在他面前的自然是大好前景。作家细腻地刻画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对于鞠广大而言,这门亲事的对象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身份,以及这门亲事所带来的现实利益。

刘庆邦的《眼光》,讲述了长林的姑姑以市俗的眼光替侄子挑选结婚对象的过程,长林在村里姑娘的眼光中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结婚对象,长相出众倒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家庭条件优越,他叔叔是公社的干部,姑父是村大队的支部书记,“顶着天,立着地,照样很了不起。谁家的闺女若是和长林对上象,就等于和大队的支部书记连上了亲戚,各方面就会受到照顾”<sup>[10]81</sup>。同样,姑姑在为长林挑选结婚对象时眼光也很高,村中只有几个姑娘入得了她的眼。刘庆邦通过描写家庭力量雄厚的男子长林在村中挑选对象的故事,揭示出村民对权力的依附和追捧心理。事实上,正是人们对权力的过分抬高、过分看重、过分崇敬,才导致了村长权力的不断膨胀,而膨胀后的村长权力加重了村民的畏惧,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村民不自觉地成为奴役、驱使的对象。

## (二) 上级监督制度被曲解

乡村自治制度决定了乡级以上政府对基层组织的监督和控制,以便于上级政府通过沟通、交流加深对乡土社会的熟悉和了解,发现基层组织工作中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纠正错误,弥补缺陷与不足。然而,这种督察制度被基层组织肆意放大,基层组织过分解读上级政府的建议、决策,一味地迎合、奉承,甚至曲解上级意图,实际上给村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在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中,刘副专员来到村中,出于好意送给贫困户德山老汉一对外国良种羊,但乡长、村长却曲解了刘副专员的意图,将羊的饲养问题包给了德山老汉。德山老汉接到“命令”,无所适从,为了照顾好这对外国良种羊,将自己御寒的棉衣给羊穿上,将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炒面喂羊,附近没有新鲜的草,德山老汉便用马驮着羊到遥远的地方吃草。更不幸的是,孙女为了给这对外国良种羊割草而溺水身亡。原本出于好意的慰问却因村干部错意领会、讨好巴结而变得荒唐,甚至酿成悲剧。同样,在向本贵的《农民刘兰香之死》中,作家以沉重的笔调讲述了一桩人间惨剧。邹大树被毒蛇咬伤,为了治病已花光所有积蓄,正在邹大树夫妇一筹莫展之时,却接到给上级领导提供招待的任务。由于家境贫困而无力承担招待任务的邹大树夫妇怠慢了上级领导,妻子刘兰香因无法承受邻居们的过分指责,最终上吊自杀,留给生者无限的痛苦。村长职务在村民眼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村长具有支配他们行为的权力。作家将身体受操纵、精神受钳制的生存景象投以人文观照,揭露乡村自治制度的阴暗面,及其对人性的制约和胁迫。

乡村自治制度的出发点是给予村民更多的自主决策权,然而,从实际来看却在无形中强化了村长的权力,特别是重大事件的决策权,村民在此过程中成为乡土社会的弱者,成为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对象,丧失了民主权力。上级政府的监督制度是对乡村自治制度的补充,是从制度层面对基层决策正确与否、决策落实与否的监管与督促。由于基层组织对上级监督制度的敬畏,导致上级政府的审查角色被放大,基层组织过分曲解上级政府的意图,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 三、结语

乡村权力书写是乡土小说的一个永恒话题,更是民族文化的缩影,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当代乡土小说家立足民族文化记忆,以全新的视角,一方面表现出清醒的反思意识,再现乡村权力在经济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的现实,揭露乡村权力对底层民众的戕害;另一方面通过披露乡村权力的阴暗面,以期完成对乡村权力文化的重构。

新世纪以来,都市亚文化,如拜金主义、消费主义逐渐向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人性的丑恶悄然浮出水面,乡村道德底线被一再刷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权力书写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决定知青能否返乡、农村青年能否入伍,逐渐演变成权力与金钱相勾结。

乡村权力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使人变得疯狂,村民不惜放弃尊严、抛弃道德底线,变得自甘堕落、恬不知耻。竞选者为了争夺权力,更是不择手段,上演一出出乡村闹剧。争权成功的竞选者对权力倍感珍惜,在乡村自治体制的作用下,权力欲肆意发酵,迅速膨胀,手中的权力使其成为乡村特权阶层,掌控着一方人的生死。上级督查制度本是应对基层滥用权力的一种监察制度,然而随着村长过分讨好迎合、肆意解读曲解,反而使村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在新世纪乡土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了权力与金钱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的摧毁性力量,感受到了为经济利益争夺权力的非正义性,不论谁当选,只要不改变权力背后的实质,只能给原本贫困的乡村雪上加霜。

####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罗素. 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 吴三友,译. 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吴海清. 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叶君. 乡土·农村·家园·荒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 葛水平. 守望[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6] 刘庆邦. 黄泥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7] 黄佳能. 市场经济与90年代中后期农村题材小说[J]. 当代文坛,2000(1).

[8] 何弘. 新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的中原作家群[J]. 中原文化研究,2013(6).

[9] 周大新. 湖光山色[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0] 刘庆邦. 眼光[C]//刘庆邦. 到城里去.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Analysis on the Rural Power Dissimilation of Local Novels in the New Century

Ji Yanan

(*Zhongyuan Culture Research Magazine*,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native novelist in the new century writing of the rural power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subculture of urban society constantly invades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re is a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great economic benefits of power. Therefore, the fight for power is getting fiercer, a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ney and power leads to a difficult transition of power.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people abandon the bottom line, make the value concept of “laughing poor and not smiling” rampant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rample the purity of the loc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rural autonomy system, the village chief’s power is strengthened and it becomes the privileged class of rural society. The villagers’ reverence and fear for privilege lead to deformity changes in human nature.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rbitrarily distort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superior organizations, and show pathological echo, acceptance and flattery to the superior organizations. The native novelists in the new century have found and captured the change of local social power, exposed the dark side of rural power, and unearth the institutionalized human frailty.

**Key words:** new century local novels; rural power; money combined with power; rural autonomy; power alienation

# “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定义的非对称性

——对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一点再思考

刘德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 广州 510420)

**摘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微型对话”有着清晰的可操作的定义,但对“大型对话”的定义却非常模糊,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性。据此考察作为其理论载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便会发现,“微型对话”在陀氏作品中比比皆是,而“大型对话”却了无踪影,乃至后世研究者的解释也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换言之,巴赫金的“大型对话”概念,只具有理论的阐释性,却没有分析的可操作性。故此,令人怀疑他的复调理论,不只是提出一种文学理论,而是隐藏着一种“对话型”社会。其所区分的“独白型”和“对话型”,也可能针对的是一种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主体理论,其核心是告别“独白型”主体而建设“对话型”主体。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微型对话;大型对话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4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20-05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这一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使得旧有的艺术形式中的许多基本因素都获得了根本改造。他将这一艺术思维类型的创新称之为“复调型。”<sup>[1]</sup>

巴赫金认为,“复调型”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的

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sup>[1]4-5</sup>。

在对《穷人》与果戈里的《外套》的比较研究中,巴赫金认为陀氏笔下的杰符什金不再是果戈里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贫穷的官吏到了杰符什金那里,却变成了贫穷官吏的自我意识。一切造成作者和读者眼中的贫穷官吏形象的材料和因素形成的艺术视觉,转向了主人公,由主人公本人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描写、刻画和界定。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是实现了一场小规模哥白尼式变革。

让我们来看《穷人》,瓦莲卡把《外套》借给马卡尔·杰符什金,杰符什金对此却深感羞辱:

本月6日您捐给我的那本书,现在赶

收稿日期:2017-11-10

作者简介:刘德飞(1990—),男,安徽滁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文艺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巴赫金诗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紧还给您,同时在这封信里还要急于向您解释清楚……这一切您凭良心,应该知道,亲爱的,他也应该知道啊。既然要写作品,就应当什么都知道……当然,确实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做了一样新东西,因此高兴得睡不着觉,比如说,你高兴地穿上一双新靴,心里别提多美啦;这是真的,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看到自己的脚上穿着精致漂亮的靴子,心里就高兴,这一点描绘得相当真实!……有的时候,你东躲西藏,躲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没有过错也要掩饰自己,不会在任何地方露面,因为你怕流言蜚语,怕他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把你的公务生活、家庭生活都写到书里去,印出来,让大家阅读、取笑、议论!……控诉。<sup>[2]63-65</sup>

杰符什金阅读《外套》时感到惶恐不安,也非常愤怒,因为他在阿卡基耶维奇身上认出了自己,仿佛人们窥视了他的贫困潦倒,展现了他的全部生活,将他的一切写了下来,却没给他半点申辩的机会。

杰符什金感到无可奈何,自己早就被人定了性,与此同时,他又觉着这样对待他极不公平。正是这一独特的“造逆”使得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描绘,主人公的语言也具有非同一般的特色:“前几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叶夫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发表高论,他说公民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他这是开玩笑(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这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就从不依赖别人。我有一块自己挣来的面包,的确,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有时甚至又干又硬,但是,这块面包是我劳动所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它。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知道,我做的不过是抄抄写写的工作,干得并不多;可我还是引以为豪;因为我在干活,我在流汗!是,说真的,我抄抄写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抄抄写写也是罪过吗?他们说:‘他就是抄写!’‘这个如同耗子般的小官吏在抄写!’难道抄抄写写就不体面了吗?我抄写得是么清晰,那么好,那么赏心悦目……升不上去。”<sup>[2]44</sup>

杰符什金极力揣测他人的语言,在他的自我表述中,贯穿着对他人对自己可能说出的话,他要考虑他人对这种自我表述会说什么,对这自白会有什么反应;杰符什金每说一句话都要回望不在场的谈话对方,并让对方话语进入谈话系统中,构成一个双声部。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总是以别人对他的感知为

背景。“‘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sup>[1]276</sup>

不仅如此,仿佛现实中杰符什金真的在和谈话的另一方激烈地争辩,本来是说话双方你一句我一句,由不同的声音说出来;现在却重叠在一个人的口中,融合在一个人的话语里。原本谈话双方之间的争辩,在一个人的声音里变成了相互对立的声音的尖锐交锋和冲突。正是对于他人意识和语言的“不断回望”,“决定了杰符什金的自我意识的主体发展、他的沮丧、争辩、反抗;他的语言的语气断续、句法的破碎、种种的重复和解释,还有冗赘”<sup>[1]279</sup>。总要极力预测他人的语言风格,成为巴赫金称道的“微型对话”的先决条件。在《罪与罚》中,有这样的片段:

显然,这里不是别人,正是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要走了运,可以上大学,可以成为交易所里的股东,他的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一个有钱的人,受到人们尊敬,也许晚年还会名声赫赫!可母亲怎么想呢?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啊,她们的心地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又多么偏心眼啊!可有什么办法,看起来咱们也逃脱不了索涅奇卡的命运!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尔梅拉多娃!只要世界存在,我的不朽的索涅奇卡!这个牺牲,你可好好掂过分量吗?这行吗?吃得消吗?有好处吗?明智吗?您知道吗,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决不比嫁给卢仁先生更糟糕?妈妈信上说:这里谈不上有爱情,可要是没有爱情,连尊重也办不到,那怎么办?相反,再产生厌恶、鄙视和怨恨,那时怎么办?到那时,不用说自然又得“保持纯洁”啰!不是这样吗?你们明白吗?卢仁的纯洁和索涅奇卡的纯洁是一路货。也许甚至更坏,更恶劣,更下流。因为,杜涅奇卡,您是希望生活舒服一些,可到那时干脆得饿死!“杜涅奇卡,这样的纯洁代价太高,太高啦!”如果往后受不住,您会后悔吗?会有多少痛苦、悲伤、诅咒,背着人悄悄的流多少眼泪呀!因为您究竟不是玛尔法·彼得洛夫娜呀!那时妈妈又怎么办!她现在就已经不得安生,

苦恼得很;如果到那时她亲眼看出了一切呢?我又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呢?杜涅奇卡,我不要您的牺牲;妈妈,我不要!只要我还活着,这件婚事就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我不同意!

接着的两段话是:

“要么干脆就不要活了!”他突然发狂似地喊叫起来,俯首贴耳地服从命运算了,一劳永逸,把行动、生活和爱人的权力全部放弃,把内心的一切都消灭掉!

“您明白吗?您明白吗,先生,走投无路是什么意思?”他突然想起昨天马尔梅拉多夫提的问题,“每个人总该还有条路可走呀……”<sup>[1]98-99</sup>

拉斯柯尔尼科夫几段对话式的内心独白,可以听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妹妹杜尼娅、母亲等人的对话,拉斯柯尔尼科夫分别复述了杜尼娅和母亲带有各自立场和目的的话,又加上了一层自己的语调——愤怒的、警告的、讽刺的语调。对白渗透到每个语词里,奏起了两种声音的交替和斗争。在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或内心独白中,囊括了他人的对话。在同一段话里,不同意向的声音和语言十分独特地组合起来。同一个意识中有两个不同意向的交替,这就是微型对话。

这样的微型对话在陀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形式也多种多样,不胜枚举。“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无论是一个人嘴上的话移到另一个人嘴上,而潜台词变了,还是一张嘴融合了两个人的话,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句话具有双重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同一般语言一致),又针对另一个语言(他人话语)而发。’它的本质就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个成分中的交锋和交错’。”<sup>[3]</sup>这一暗含叙述者和他人话语之间的交锋和交错具有不同的判断指向;赞成或反对、肯定或补充、问和答的关系。

微型对话确如巴赫金所言,可以在陀氏的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也是陀氏小说的独有特色。但巴赫金指出的陀氏小说的“大型对话”,笔者却始终没有发现像微型对话那样的成型状态,甚至让人怀疑它的存在。巴赫金自己的表述是:“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部分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对他来说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他是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建构的。”<sup>[1]56</sup>但是,并没有鲜明的例子可以为“大型对话”提供物质或实体性支撑。后来的研究者要么对

“大型对话”表示赞同,要么就是沿着巴赫金的叙述逻辑为“大型对话”找寻可以支撑的证据。如:“内部对话原则很特别,当它仅仅是处于双声语阶段,用双声形式表明思想矛盾的时候,属于微型对话,但是当内心矛盾已经发展分裂为两个人的时候,思想矛盾就变成了作品结构的形式,而且这种悬而未决的思想矛盾贯穿整个作品,这时,内部对话就不是微型对话,而变成了大型对话。”<sup>[4]32</sup>

有研究者认为,“大型对话”是结构上体现出来的主人公的对话,并非“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作者视野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sup>[1]95</sup>。换言之,这是一种广义的对话关系和对话的立场,是众多意识之间的对峙与交锋,这一对峙并不会随着小说的发展而消除,它们最终并不会形成带有作家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精神或观念。在这里,作家并不是小说的主宰者,而是作为对话的一方参与到整部小说的“大型对话”之中,作者与主人公并不是传统小说形式之中的主客体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

但真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那么,笔者不得不对小说《罪与罚》中“大型对话”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

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和立场,这些真理和立场全已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中得到了反映,纳入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全面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中;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开始就什么都考虑到了,他已经与周围的生活开始了全面的对话交往。依据巴赫金的理论,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杜妮亚、马尔美拉多夫等人分属于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统一的事件之中,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彼此之间相互对峙,形成一幅多元复调的世界,这看起来特别符合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论述,众多人物彼此相互独立,不相融合,都以各自的意识以及自己的世界相互对峙而不融合,互相之间对立式对话,各自表达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

在他看来,拉斯柯尔尼科夫“超人”的哲学思想,挑逗着年轻人炽热的心,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超人”还是一只虱子,因此,谋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是谋杀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没有成为拿破仑式的超人,良心的煎熬,恐惧的阴影,罪恶的折磨,使得他逐渐陷入到一种疯狂的病态中无法自拔,最后成为一头瑟瑟发抖的“畜生”。他在与其他几位主人公“声音”的对峙与对话中,寻觅到了“我是什么人?找到了自己的声音”<sup>[1]322</sup>,拉斯柯尔尼夫

放弃了先前的“超人哲学”，转向了索尼娅的“宗教哲学”。而这一思想一开始便被拉斯柯尔尼科夫纳入了内心对话之中。就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没有思想的形成过程，即使在一个别的主人公的意识范围内也没有表现（只是极少数例外）。主人公的思想材料总是一下子全都给予他，而且不是单个的思想……问题在于选用哪一个……在新的事实、新的观点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某种思想——这种事几乎是不存在的。问题只在于选择……进入了他的内心对话。”<sup>[1]321-323</sup>但是，巴赫金只看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除了一开始就什么都考虑到了，其他人的意识和立场纳入了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全面对话式的内心独白中，却“忽视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总是与他人的意识处于紧张的对峙与对话状态，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他人的“声音”（索尼娅）之间发生了不同于复调理论的“杂音”。

在《罪与罚》篇末，有这样一段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sup>[5]504</sup>诚然，索尼娅的宗教思想在小说的开头就纳入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中了，但是经历“罪与罚”的挣扎和痛苦之后，“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在他的意识中产生了”<sup>[5]504</sup>。从过程上看，巴赫金说的没错，这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早已存在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对话之中了，似乎并非如作家所言的那样，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正如巴赫金所言，并不是一个“新人”的形象获得重生。但是，巴赫金并没有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纯粹基于生活、思想立场和自我的完整个性的选择问题，也没有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之间发生的极为重要的“化学反应”，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反应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由索尼娅的宗教博爱以及自我牺牲感受到了自我灵魂中“爱的萌生”。索尼娅的宗教牺牲精神给予拉斯柯尔尼科夫新的希望，他在索尼娅身上看到的不光是基督宗教精神和博爱，还看到了索尼娅身上“神和人的合体”，这一形象在生活层面给他带来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的是他爱上索尼娅的这一过程，而巴赫金强调的是他选择生活立场的结果。

拉斯柯尔尼科夫铁的原则被“爱”（全新的思想进入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中）融化了，这不完全是思想斗争的结果——在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中进行选择，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和情感的体现。巴赫金

没有注意到罗佳内心“爱”的生长过程，这一生长过程恰是主人公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独立性的体现。而这一“爱”以及过程，就是长篇小说《罪与罚》最终所要表达的终极主体和价值观。但是在巴赫金看来，“大型对话”中的意识之间的对峙，并不会随着小说的发展而消亡，其中也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思想和代表作家的终极观念抑或是统一的价值立场。显然，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长篇小说《罪与罚》。因此，笔者认为，与“微型对话”相比，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大型对话”的论述并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因为巴赫金不会错到创造一种导致自己错误分析的理论，上述明显的破绽，以及“微型对话”定义的清晰性和“大型对话”定义的模糊性，在显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话中有“话”，颇有指桑说槐的味道。联系到巴赫金整个理论的广泛关怀，以及苏联时期的历史特殊性，巴赫金理论运用中的“破绽”以及它对复调理论的情有独钟，让人怀疑他是以文学言政治，是一种抵制苏式教条主义的新理论的文学包装。“大型对话”极有可能是巴赫金“对话型”社会的一个理论表达。而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型”社会的真正根基，却是一种“对话型”主体精神，即一个人不仅只服膺、掌握一种真理，从而形成“独白型”主体；还应该在内部分给对立的“真理”以适当位置，以形成“对话型”主体。这样解释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作者无从驾驭人物，人物有其独立的声音，才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

然而目前，这还仅仅停留在“猜想”阶段，一切留待于对巴赫金理论及其载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进一步探索的“小心求证”中。

#### 参考文献：

- [1]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2]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C]//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 臧仲伦, 曾思艺, 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15.
- [3] 黄继刚. 巴赫金的“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简评[J]. 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5(2).
- [4]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 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 [5] 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M]. 朱宪生, 曾思艺, 译. 合肥: 黄山书社, 201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Micro – dialogue” and “Macro – dialogue”: the Non – symmetry of Definition

——Thinking More About Bakhtin’s Theory of Polyphony.

LIU Defei

(Chinese Academ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Bakhtin’s polyphonic theory has a clear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micro – dialogue”, the definition of “macro – dialogue” is very vague, it forms an non – asymmetry. In Dostoyevsky’s novels, which is the carrier of his theory, “micro – dialogue”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but “macro – dialogue” is not as well as “micro – dialogue”. As a result, that the interpretations of later generations are hard to justify. In other words, the concept of Bakhtin’s “macro – dialogue” ha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merely, it has no the operability of analysis. Therefore, it has to be doubted that Bakhtin’s polyphonic theory is not only a literary theory, but a concept of a conversational society. It is classified as “monologue type” and “dialogue type”, which are possibly the subject theories required by the future society, the core purpose is to say goodbye to the “monologue type subject” to construct the “dialogue type subject”.

**Key words:** Bakhtin; polyphony; micro – dialogue; macro – dialogue

## 编者小识：俄罗斯批评家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

米哈伊·巴赫金(1895—1975),出生于俄罗斯西部的奥廖尔,父亲为未封爵位的贵族成员,堪称富室大家。一战期间,米哈伊·巴赫金和兄长尼古拉·巴赫金各奔东西。尼古拉后来赴剑桥大学深造,成为一名相当著名的古典语言学学者,20世纪30年代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期间相交。米哈伊·巴赫金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加入知识分子群体,1929年因投身于宗教团体的活动,疾病在身的他,仍然被判刑、流放。也许多舛的命途,更促使他思考。

巴赫金曾将书稿《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的问题》,呈交圣彼得堡大学,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校方没接受。1929年5月,他设法出版了此书。1963年,他出版该书的第二版,篇幅有所扩充,修订较大,新的书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时隔不久,1965年完成新著《拉伯雷与他的世界》。由此,巴赫金引起西方学界越来越强烈的重视。他所创建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和“狂欢”理论,为他赢得了“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20世纪最卓越的理论家之一”的赞誉。我国对巴赫金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陆续把他的理论译介过来。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一书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出一种面貌焕然一新的小说,即“复调”小说:作品包含着完全平等、独立

的声音,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主题,而并不服务于作者意识的立场。文学中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提出,1865年之前,已见于奥托·路德维希的反思,但由巴赫金的研究可发现,和以前的任何一位作家比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更进一步,他通过三四个角色展开的对话、交谈、辩论,围绕着舞台布景来构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属于“舞台布景式”,而非“全景式”。冲突的声音所产生的丰富性以及多重性的总体印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该书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通过一种偏激方式而体现了戏剧性,同时暗示作者接触了比较古老的体裁。

先说第一个功绩。巴赫金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通过多方对话展现的戏剧性冲突,文本由此走向开放性,也可以说是未完成性,召唤着读者的思考和审美参与。启迪我们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诗学,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

第二个功绩。作为一位研究小说的史学家,巴赫金对此前的小说可谓学识过人,他追溯了小说的历史渊源,把诸种体裁与狂欢、与中世纪的非官方文化联系起来,认为狂欢或狂欢隐含的态度,对高雅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他把文学研究的维度,从当时西方社会学诗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历史诗学,使研究走向了深入。因此,巴赫金成为“20世纪最卓越的理论家之一”,名至实归。



# 供给侧改革下的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刘战伟

(许昌学院 商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农产品质量与数量的有效供给,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以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和优势进行探讨,对河南省生态农业现状进行实质性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实现河南省生态农业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生态农业;建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5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25-05

2016年和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生态农业作为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发展与水土资源及其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但是仍然面临着农业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片面追求数量,忽略了向绿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 一、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和优势

### (一)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意义

1. 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强生态农业各个生产过程无污染技术的应用,从种植、生产、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有助于环境的保护和农业效益的提高,推动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生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加大技术检测工作的具体运用,使产品的安全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加强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环境健康发展。

2. 有利于河南省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河南省

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发展在整体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大。在“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下,生态农业无疑为河南省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全球对生态产品的年销售额已达625亿美元,其中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成为消费领头国家,尤其是农作物产品、水果、肉类等消费量巨大。欧盟各国自产的生态农业产品已经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有将近60%需要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其中就需要从我国大量进口,生态产品在国内国际上的市场潜力极大。河南省生态农业产品的大量输出,走向国际市场,经济价值翻倍增长,可有效地促进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3. 有利于河南省新农村的建设。近年来,为了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望,国家对新农村的建设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以此促进生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首先有利于河南省加大农业生产规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促进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其次,科学认识生态农业,促使其迈入新的台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使农户的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促进农村经济的不断成长;生态

**收稿日期:**2017-11-15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ZH00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ZZJH-504);河南省社科联研究项目(SK1-2017-3031)

**作者简介:**刘战伟(1979—),男,河南许昌人,硕士,美国欧道明大学访问学者,许昌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技术创新。

环境得到了改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使之与河南省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相切合,有利于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因此,生态农业的发展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

## (二) 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优势

### 1. 优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

河南省地处中原地区,地域辽阔,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重大,四季分明、阳光充沛、雨水充足、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交通便利,同时得天独厚的气候,丰富的地貌类型等为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和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2. 良好的市场基础

河南省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有茶叶、肉类制品等,在多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品牌效应,具有较大的市场号召力;河南本省消费者对本地农民产品的认同度逐年上升,使农产品的发展市场更为广阔。除此之外,本省庞大的人口数量也为农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这是河南相比其他省份更为突出的一点,也成为自身的一种优势。近年来,经济水平的高速增长,人们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的同时,人们对绿色消费,食品安全的意识也逐步增强,特别是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之后,生态农产品更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致使绿色食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大。良好的市场优势成就了如今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为生态农业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 3. 初具规模的产业化结构调整

河南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启动“优质高效农业工程”,开始着重对农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如今成果比较明显,产业化已显示出规模,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产业辅助支持。目前河南省的粮食生产区域化、规模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特别是特色产业区域化的发展,成效相对比较突出。比如新郑的大枣、周口的莲花味精、固始的鸡、信阳的茶叶、焦作的山药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还有漯河双汇,郑州花花牛、思念等龙头企业的崛起,提高了河南经济产业在外的知名度。此外,油料、蔬菜、花卉、药作物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畜牧业养殖业发展尤为迅猛,农副产品得到深度加工,进而提高附加值,不仅增加产品的产量还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 4. 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

从 2006 年《河南省农业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始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受

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通过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的报告,声明对污染问题建立终身追责制,同时制定了《河南省农产品产地环境保护条例》《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法规,为促进河南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14 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推动河南省都市生态农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郑州、许昌、洛阳等 6 个城市的生态农业圈进行试点,除此之外还出台相关系列文件,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生态农业的稳步发展。

## 二、供给侧改革下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现状

### (一) 以点带面、以典型带动生态农业全面发展

河南省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已初具规模。通过示范区的建设,使农民亲眼看到发展生态农业带来的收益,从而增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带动农民踊跃参与发展生态农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模式,以典型成功案例带动生态农业全面推广,使用以点带面的方式,促进其全面发展。例如河南兰考县南马庄延长农业发展链,促进生态与农业全面发展;河南晨明农业生态园将科技示范园与农业旅游示范园相结合,打造现代农业新发展;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将休闲旅游、农事活动、观光度假、示范基地、会议培训等功能融为一体,实现生态农业多样化发展。

### (二) 农业环境质量调查与科学研究支撑生态农业发展

河南省城调队在郑州、新乡等地对农业环境质量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和研究。几年来在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与协调下,从刚开始的资料收集、取样调查到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各项工作都已完成。例如,河南省能源环保站对河南省包括省会郑州、许昌、信阳、新乡等地的农畜产品的质量进行调查,然后通过抽样的方法,检测河南省内小麦、玉米、苹果等主要农产品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并找出阻碍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根据这些阻碍因素结合当时省情,利用科学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此加强各界人士对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双重重视,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促使农村的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在河南省得以和谐发展。

### (三) 农业生产标准化建设综合效益显著

农业标准化生产的进程不断加速。目前,河南省无公害无污染农产品的产地为 1256 个,得到农业部认定的农产品为 708 个,由此带来的经济收入超 150 亿元,可促进 380 万农户就业。农业生产标准

化示范园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张。目前,河南省通过国家标准的农业标准示范区 125 个,通过省级标准的有 450 个。在省内 60 多个县进一步扩大工作范围,让人们看到发展生态农业带来的切实效益,企业农产品产业化发展得到了提升。截至 2015 年底,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组织为 9200 家,国家级的龙头企业 25 家,省级的 343 家,加工产品主要为方便面、肉类、调味品等,农业生产标准化程度得到了提高。河南省各类农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 859 项,有 13 个县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加快了农产品向外输出的步伐,农业标准化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 三、供给侧改革下的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 生态农业理论体系不健全

完善支撑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过程,是一个综合性与交叉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学科的支持和配合,其中包含农学、经济科学、林学、生态科学、技术科学等。以前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研究,一般都是单一学科形式,对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未作深入研究,导致如今生态农业理论体系仍不健全。

#### (二) 生态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任何工程的开展都要有费用的支持,生态农业是一个庞大工程,当然其发展也须大额资金的投入。但是,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不足,这是一切问题存在的根源。一方面,我省生态农业正处于发展初期,生态农业工作的正常开展更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在工业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致使农业的财政投入比重逐年下滑,相对应的是生态农业也受到影响。资金的缺乏使工作无法全面开展,导致之前资金的投入也不了了之,造成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近年来不仅政府对生态农业的补助减少,农户在生态农业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减少。因此,国家必须重视资金不足给生态农业工作正常开展带来的阻碍,加大扶持力度,合理分配资金,使生态农业的资金投入能不断增加。

#### (三)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河南省在生态农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没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生态农业还是处于小规模试点阶段,形不成所谓的规模效益。一是因为现在河南省生态农业的发展宣传只是通过新闻报道,并没有利用更多的媒介使之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因此,政府

应加大对推广力度,使人们看到发展生态农业的切实利益,吸引群众对其进行投资,以此筹集社会资金,促使生态农业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环保部门把重点工作放在抓工业污染源和城市环境整治方面,对大环境的保护仍缺乏足够的认识。三是农牧部门片面追求农产品的高产,忽视提升农产品质量,工作处于应付状态等问题影响到了生态农业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引起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 (四) 农业生态环境脆弱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脆弱:一方面,农民对农药的使用缺乏科学性认识,农药和化肥使用泛滥,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不当,对垃圾废弃物随便丢弃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工业挖土造成土地浪费、水土流失等问题比较突出。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片面追求农产品的数量,不顾忌是否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不在乎是否违背生态平衡发展原理,粗暴式掠夺土地,同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大,使森林遭到破坏,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遭到污染,水土流失、江河蓄洪能力差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到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

#### (五) 生态农业技术低下

河南省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仍不太合理,不论是从投入方向还是从投入结构上来看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投入机制与驱动科技创新的要求不协调,特别是科技与金融之间不能很好地结合。其次,河南省平均文化素质水平较低,科学生态意识匮乏,农业科技人员不足。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政府重视程度不足,对生态农业科技的投入总量与力度不够,导致资金跟不上生态农业实际的发展步伐,导致一系列相互连贯的问题产生。为此,要想真正实现生态农业的大发展,首先要做的事是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技术支撑体系的建设,应用节能型农业技术、循环再利用技术,有效利用国际上各国优秀的农业科技市场,汲取国外生态农业发展的有效经验,寻求农业水平的快速提升。

### 四、供给侧改革下促进河南省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

#### (一) 加强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

生态农业是生态学和农业科学的结合,然而生态学还只是处于理论阶段,无法具体运用到农业的实际操作中。因此对生态农业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必须超越农林牧等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这些学科之间知识的交叉和汇总,使各界科学家协同研究,

共同完善相关的理论体系,及时解决生态农业建设中存在的理论瓶颈。

## (二)加大对生态农业资金的投资力度

近年来信贷在农业方面的扶持力度不断弱化,农民一下子拿不出更多的资金去发展生态农业,这就成为时下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河南省正处于现代农业发展初期阶段,各方面都存在不足,需要政府等给予支持。因此,国家要对生态农业的信贷给予政策支持,只有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减少农民的投资费用及风险,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加大对其资金投入,促使社会资金的募集,进而促进其不断壮大。国家要增加对生态农业方面的专项资金和银行贷款。创新适合生态农作化经营的融资方式,比如对大型生态农业项目来说可以通过股票、基金等手段来筹集资金,对于小型生态农业项目,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扩大贷款规模,并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对于农户来说,可以给予小额贷款扶持,低息贷款等,积极支持商品基地和出口特色农产品的加工企业,使之顺利走向国际市场,扩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协调

### 1. 制度保障

土地的种植收入是农民进行基本生活的保障,由于受过去陈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一般农民都不会想脱离种植土地,除非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不再需要辛苦种地来挣钱维持生活。目前国家对农村环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如《农村土地保护法》《农村环境保护法》等,但从未对生态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进行调节。针对上述问题的存在,政府要革新制度,健全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服务,进一步实施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减少农民对物质方面的担忧,让他们可以专心于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生态农业发展项目的建设、国家政策的扶持、污染治理等方面应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

### 2. 组织协调

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引导人们发展生态农业。通过组织系统的培训课程对发展生态农业的相关技术进行详细的讲解,使农民深入了解生态农业,明白发展生态农业带来的长远效益;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介多方面大力宣传,尤其要着重对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成功案例还有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意义这两方面进行讲授,使人们意识到发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的同时对生态农业产生浓厚的投资兴趣。

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

法规,用来调节经营者之间利益关系。一要鼓励农民自己建立自己的企业,自己当家做主,参与到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分享产品带来的利润,从而提高自己的收入,调动农民投入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二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定来调节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例如生态农业发展监督机制、市场风险防范基金等的设立,真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废水、废气、废渣的大量排放对土壤成分和水资源等都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土壤和水的污染严重影响生态农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必须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的生态环境标准,应该使用低毒、易分解的农药,限制使用添加剂和防腐剂,并制定严格的防污措施。针对河南省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1)在城郊,要严格把控城市“三废”的排放,严禁存在高污染高消耗企业,积极推进清洁生产企业的发展;(2)在广大农村地区,提高对农药使用的科学认识,积极倡导农民使用有机肥,普及防治病虫害相关技术,把现代生物技术逐步应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土壤的改良,农产品加工等。除此之外,还要避免新污染源的产生,在控制目前问题的基础上,对农村环境及时进行监察,避免后续问题的产生。

河南省农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比较浅这个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河南省要在控制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农村年轻人的素质。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支出,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户进行有关生态农业的科技培训与讲解,使农民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技术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成为会生产懂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在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意识已被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人的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成为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刻不容缓。

## (五)加大生态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的前提是要加大对其资金的投放,只有坚持以科技振兴农业发展,才能加快河南省生态农业的建设。加强科技部门与财税、金融部门的统筹协调,加大对研发成果的激励政策,落实对企业科技创新在税收方面的扶持,鼓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科技研发,增加政府对生态农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了加大广大干部对此的重视程度,将增加科技投入的具体完成情况,加入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年度考核指标和干部政绩考察的内容中去,使这项工作能够真正落实,而不只是局限于政策文本。

**参考文献:**

- [1] 王小龙, 吴大付. 河南农业标准化生产现状分析与思考[J]. 广东农业科学, 2010(7).
- [2] 严义成. 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障碍探究[J]. 科技信息, 2009(14).
- [3] 杜宏. 发展生态农业的障碍因子分析[J]. 河北农业科技, 2008(7).
- [4] 周集体, 项学敏, 康晓林. 生态农业理论及其发展初探[J].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08(2).
- [5] 王启云. 从战略高度认识和发展我国生态农业[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 [6] 丁毓良, 武春友. 生态农业产业化内涵与发展模式研究

-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
- [7] 吴海峰. 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以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例[J]. 经济研究参考, 2007(63).
- [8] 戴志春. 生态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 科技咨询导报, 2007(20).
- [9] 李斌, 袁靖.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路径[J]. 特区经济, 2007(6).
- [10] 张学英, 尹玲莉. 论生态农业系统建设[J]. 安徽农业科学, 2007(7).

(责任编辑 许峻)

##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Reform of Supply Side**

LIU Zhanwei

(School of Busines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Henan 461000, China)

**Abstract:** How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has become the main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In this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have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and 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analyzed the natur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given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 reform of supply sid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uggestions

#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优化研究

——以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为例

冯珊珊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通过构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论证分析,根据两个系统综合得分对评价对象的临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序,把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划分为6种类型,并为进一步促进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临空经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熵权-TOPSIS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6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30-06

2015年7月,国家发改委、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关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选择若干条件成熟的临空经济区开展试点示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批复10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获批先后顺序是郑州、北京、青岛、重庆、广州、上海、成都、长沙、贵阳和杭州。尤其是2017年5月,接连批复长沙、贵阳和杭州3个临空经济示范区,意味着国家对临空经济示范区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际机场协会(ACI)的研究调查数据,每100万航空旅客运输量将产生1.3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和增加2500个就业岗位<sup>[1]</sup>。大力推动临空产业发展,临空区域建设将成为地方政府打造新经济增长极、发展地区区域经济的重要推手。

临空经济区是依托航空枢纽和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高时效、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集聚发展航空运输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形成的特殊经济区域,是民航业与区域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重要载体。国外最早的临空经济形态开始于1959年在爱尔兰香农国际航空港成立的自由贸易区。1965年美国航空专家McKinley Conway在题为“The Fly-in Concept”的论文

中最早提出临空经济概念<sup>[2]</sup>。目前关于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马晓科<sup>[3]</sup>、赵文<sup>[4]</sup>分别以郑州航空港和首都第二国际机场为例,阐述了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为了更加清晰客观地论述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发展情况,本文通过建立临空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进行实证分析。

## 一、指标体系构建

### (一)研究区概况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获批先后顺序依次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于2013年2月7日批复,占地面积415平方千米,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为核心;北京(大兴机场)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6年10月12日批复,占地150平方千米;青岛(胶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6年10月20日批复,占地149平方千米;重庆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6年10月20日批复,占地147.48平方千米;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7年1月4日批复,占地135.5平方千米;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7年1月6日批复,占地13.89平方千米;成都临空经

收稿日期:2017-09-22

作者简介:冯珊珊(1994—),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策划、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

济示范区,于2017年3月3日批复,占地100.4平方千米;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7年5月17日批复,占地140平方千米;贵阳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7年5月18日批复,占地148平方千米;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于2017年5月23日批复,占地142.7平方千米。

(二)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来源

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完备性、主成分性和独立性原则,通过借鉴曹允春<sup>[5]</sup>、刘莉<sup>[6]</sup>等人的研究,选取临空经济发展支撑因素、发展表

现、发展作用、发展环境4个二级指标,30个三级指标构建临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7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区域基本情况、经济实力、财政金融、对外开放、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又具体细分为31个三级指标(表2)。

原始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资料计算得到。

表1 临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三级指标层 D
	准则(一级指标) B	子准则(二级准则) C	
临空经济系统	临空经济发展支撑因素 B <sub>1</sub> (w <sub>B1</sub> = 0.4359)	航空业发展水平 C <sub>1</sub> (w <sub>C1</sub> = 0.1901)	旅客吞吐量(w <sub>11</sub> = 0.0482)
			货邮吞吐量(w <sub>12</sub> = 0.0403)
		起降架次(w <sub>13</sub> = 0.0406)	
		机场连通性(w <sub>14</sub> = 0.0331)	
	腹地支持 C <sub>2</sub> (w <sub>C2</sub> = 0.1378)	跑道数量(w <sub>15</sub> = 0.0296)	
		基地航空公司数量(w <sub>16</sub> = 0.0285)	
	临空经济发展表现 B <sub>2</sub> (w <sub>B2</sub> = 0.1807)	产业结构 C <sub>3</sub> (w <sub>C3</sub> = 0.0872)	航班密度(w <sub>17</sub> = 0.0884)
			国际航线可达性(w <sub>18</sub> = 0.0623)
	临空经济发展作用 B <sub>3</sub> (w <sub>B3</sub> = 0.2025)	空间结构 C <sub>4</sub> (w <sub>C4</sub> = 0.0718)	地区生产总值(w <sub>21</sub> = 0.0260)
			人均生产总值(w <sub>22</sub> = 0.0250)
对机场影响 C <sub>5</sub> (w <sub>C5</sub> = 0.0644)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w <sub>23</sub> = 0.0303)	
		对腹地影响 C <sub>6</sub> (w <sub>C6</sub> = 0.1267)	临空经济区跨国企业数量(w <sub>31</sub> = 0.0529)
临空经济发展环境 B <sub>4</sub> (w <sub>B4</sub> = 0.1810)	基础条件 C <sub>7</sub> (w <sub>C7</sub> = 0.1357)	主导产业集聚程度(w <sub>32</sub> = 0.0161)	
		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w <sub>61</sub> = 0.0504)	
	政府支持 C <sub>8</sub> (w <sub>C8</sub> = 0.0626)	对就业的影响(w <sub>62</sub> = 0.0594)	
		科技发展能力 C <sub>9</sub> (w <sub>C9</sub> = 0.1238)	区域区位条件(w <sub>71</sub> = 0.0146)
		地面交通可达(w <sub>72</sub> = 0.0210)	
		年均财政补贴金额(w <sub>81</sub> = 0.0183)	
		重要基础设施投入(w <sub>82</sub> = 0.0208)	
		相关优惠政策(w <sub>83</sub> = 0.0150)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w <sub>91</sub> = 0.0253)	
		外向型经济程度(w <sub>92</sub> = 0.0606)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临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比较客观,从而提高结论的信任度和可靠性。TOPSIS法是由C. L. Huang和K. Yoon于1981年首次提出的一种适用于多项指标、多个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的分析方法,它对样本量、数据分布及指标多少无

特殊要求和限制。其基本原理是将原始样本归一化后形成数据矩阵,构造决策问题中各个指标的最劣解和最优解,然后计算比较对象与最劣解和最优解的欧式距离,根据各指标的相对接近程度,即贴进度,进行比较对象的优劣排序,作为评判决策的依据<sup>[7]</sup>。

1. 确定指标权重和排序的步骤<sup>[8]</sup>

①将原始数据矩阵 $X_{ij}$ 通过极差标准化,消除数据量纲得 $X'_{ij}$ ;

表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目标层)A	二级(准则层)B	三级(指标层)C
区域 经济 系统	区域基本情况 B <sub>1</sub> (w <sub>B1</sub> = 0.1661)	人口总数(w <sub>11</sub> = 0.0300)
		土地面积(w <sub>12</sub> = 0.0887)
		登记失业率(w <sub>13</sub> = 0.0239)
		地区生产总值(w <sub>21</sub> = 0.0225)
		GDP 增长率(w <sub>22</sub> = 0.0308)
	经济实力 B <sub>2</sub> (w <sub>B2</sub> = 0.0721)	人均生产总值(w <sub>23</sub> = 0.0216)
		城镇化率(w <sub>24</sub> = 0.0182)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w <sub>25</sub> = 0.0148)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w <sub>26</sub> = 0.0371)
		固定资产投资(w <sub>27</sub> = 0.0262)
	财政金融 B <sub>3</sub> (w <sub>B3</sub> = 0.1058)	工业增加值(w <sub>28</sub> = 0.0144)
		财政收入(w <sub>31</sub> = 0.0350)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w <sub>32</sub> = 0.0541)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w <sub>33</sub> = 0.0393)
		对外开放 B <sub>4</sub> (w <sub>B4</sub> = 0.1720)
	生活水平 B <sub>5</sub> (w <sub>B5</sub> = 0.1287)	进出口总额(w <sub>41</sub> = 0.0638)
		实际利用外资(w <sub>42</sub> = 0.0228)
		人均可支配收入(w <sub>51</sub> = 0.0207)
		人均消费支出(w <sub>52</sub> = 0.0206)
		恩格尔系数(w <sub>53</sub> = 0.0195)
	基础设施 B <sub>6</sub> (w <sub>B6</sub> = 0.148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w <sub>54</sub> = 0.020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w <sub>61</sub> = 0.0228)
		绿化覆盖率(w <sub>62</sub> = 0.0400)
		互联网用户数(w <sub>63</sub> = 0.0224)
		邮电业务总量(w <sub>64</sub> = 0.0404)
	科技创新 B <sub>7</sub> (w <sub>B7</sub> = 0.2066)	卫生机构数量(w <sub>65</sub> = 0.0639)
		城镇污水处理率(w <sub>66</sub> = 0.0256)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w <sub>67</sub> = 0.0102)
高等学校数量(w <sub>71</sub> = 0.0208)		
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 (w <sub>72</sub> = 0.0484)		
		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w <sub>73</sub> = 0.0407)
		专利申请量(w <sub>74</sub> = 0.0404)

根据数值的差异程度计算指标  $j$  的差异系数,即指标的差异度  $S_j$ ;

$$\textcircled{3} \text{ 计算第 } j \text{ 项指标的权重: } w_j = \frac{S_j}{\sum_{j=1}^n S_j};$$

④ 利用熵权欧氏距离计算各个比较对象与最劣解和最优解的距离  $d_i^-$  和  $d_i^+$ ;

⑤ 基于  $d_i^+$  和  $d_i^-$  两个距离值计算各比较对象状态的贴近度  $\eta_i: \eta_i = \frac{d_i^-}{d_i^+ + d_i^-}; i = 1, 2, \dots, m; 0 \leq \eta_i \leq 1$ , 最后将各评价对象按照贴近度  $\eta_i$  进行降序排列。

### 2.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模型

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sup>[9]</sup>:  $C = \frac{2\sqrt{u_1 u_2}}{u_1 + u_2}$ ,  $C$  表示耦合度,  $u_1$  表示临空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u_2$  表示区域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由于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两个子系统各自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会出现无法真实反映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情况。为此,进一步引入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sqrt{CT}, T = \alpha u_1 + \beta u_2$ 。其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T$  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综合协调指数,  $\alpha, \beta$  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促进程度是有差异的,设定  $\alpha = 0.4; \beta = 0.6$ 。

### (二) 数据处理

#### 1. 指标权重及排序

根据上文介绍的熵权 - TOPSIS 法的操作步骤,借助 Matlab 软件,首先计算三级指标的权重  $w_{ij}$ , 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然后,计算二级准则层指标 B 的贴近度,利用贴近度  $\eta_i$  计算二级指标权重  $w_{Bi}$ , 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最后,根据一级目标层 A 的综合得分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textcircled{2} \text{ 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 R_j = \left( \sum_{i=1}^m u_{ij} \ln u_{ij} \right),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u_{ij} = \frac{1 + x'_{ij}}{\sum_{i=1}^m (1 + x'_{ij})}, \text{ 然后}$$

表3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发展水平排序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青岛	郑州	杭州	长沙	贵阳
综合得分	0.9339	0.6472	0.6033	0.3396	0.3083	0.2564	0.2886	0.2700	0.1618	0.0765
排序	1	2	3	4	5	8	6	7	9	10

表4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排序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青岛	郑州	杭州	长沙	贵阳
综合得分	0.5604	0.5345	0.3541	0.2994	0.4253	0.2094	0.2337	0.2593	0.2456	0.2426
排序	1	2	4	5	3	10	9	6	7	8

### 2.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类型划分

利用耦合度模型计算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结果可划分为十个等级(表 5)。

当  $u_1 = u_2$  时,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属于在同一

协调度等级下同步发展。

### 3.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结果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情况,结果如表 6 以及图 1 所示。全部临空



经济示范区的耦合度在 0.8538 ~ 0.9998 之间变动,除贵阳外其他城市差距非常小,说明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都非常强。杭州的耦合度最高,成都次之,贵阳最后一名。协调度在 0.1762 ~ 0.7098 之间

变动,各示范区之间差距比较大,排名第一的北京和排名垫底的贵阳相差 0.5336,说明各示范区协调情况存在极大不均衡,贵阳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协调。

表 5 协调度等级及其划分标准

D	耦合协调类型	$u_1 > u_2$	$u_1 < u_2$	可接受程度
0 ~ 0.09	极度失调衰退型			失调衰退区(不可接受)0 ~ 0.29
0.1 ~ 0.19	严重失调衰退型			
0.2 ~ 0.29	中度失调衰退型			
0.3 ~ 0.39	轻度失调衰退型			过渡区(勉强接受)0.3 ~ 0.59
0.4 ~ 0.49	濒临失调衰退型	区域经济发展落后	临空经济发展落后	
0.5 ~ 0.59	勉强耦合协调型			
0.6 ~ 0.69	初级耦合协调型			耦合协调区(可接受)0.6 ~ 1.00
0.7 ~ 0.79	中级耦合协调型			
0.8 ~ 0.89	良好耦合协调型			
0.9 ~ 1.00	优质耦合协调型			

表 6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临空经济示范区	$u_1$	$u_2$	C	T	D	$u_1$ 与 $u_2$ 比较	耦合协调类型
北京	0.9339	0.5604	0.9683	0.7098	0.8290	$u_1 > u_2$	良好耦合协调型
上海	0.6472	0.5345	0.9954	0.5796	0.7596	$u_1 > u_2$	中级耦合协调型
广州	0.6033	0.3541	0.9655	0.4538	0.6619	$u_1 > u_2$	初级耦合协调型
成都	0.3396	0.2994	0.9980	0.3155	0.5611	$u_1 > u_2$	勉强耦合协调型
重庆	0.3083	0.4253	0.9872	0.3785	0.6113	$u_1 < u_2$	初级耦合协调型
青岛	0.2564	0.2094	0.9949	0.2282	0.4765	$u_1 > u_2$	濒临失调衰退型
郑州	0.2886	0.2337	0.9945	0.2557	0.5042	$u_1 > u_2$	勉强耦合协调型
杭州	0.2700	0.2593	0.9998	0.2636	0.5133	$u_1 > u_2$	勉强耦合协调型
长沙	0.1618	0.2456	0.9786	0.2121	0.4556	$u_1 < u_2$	濒临失调衰退型
贵阳	0.0765	0.2426	0.8538	0.1762	0.3878	$u_1 < u_2$	轻度失调衰退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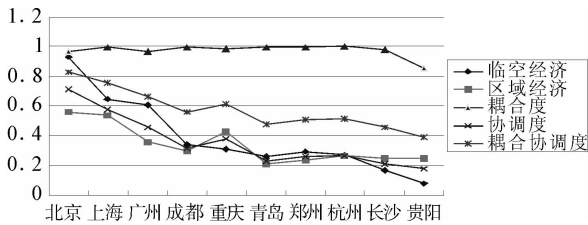


图 1 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在临空经济发展指数、区域经济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等方面发展不均衡,北京和上海表现较好,其他城市发展均比较落后但差距不大。可以看出,国际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金融中心的上海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和经济优势,其发展潜力大于其他城市。总体来说,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关系。

### 三、结论分析与建议

#### (一) 结论分析

根据表 6 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在 0.3878 ~ 0.8290 之间变动,各临空经济示范区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大。据此把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分为以下 6 种类型。

#### 1. 良好耦合协调型

北京是唯一一个良好耦合协调的地区,但区域经济相对落后。北京首都机场无论是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还是起降架次方面都领先于其他机场。北京是最具实力的临空经济区,其临空经济发展处于快速成长期,并接近于成熟期,随着北京临空经济示范区依托的北京大兴机场的逐步建设和完善,必将分担首都机场的承载量和货运吞吐量,首都机场也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 2. 中级耦合协调型

上海属于中级耦合协调,区域经济落后。上海是我国的金融中心,世界级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其地区发展水平非常高,但与临空经济相比,区域经济落后,说明上海临空经济的发展处于成长期,并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其发展速度快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已经集聚了信息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两大产业的多家企业,为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 3. 初级耦合协调型

广州和重庆属于初级耦合协调,说明两大系统相互协调能力较差。广州是区域经济落后,重庆是临空经济落后。广州和重庆的临空经济都处于起步期,但广州发展水平高于重庆。广州日前宣布将投资 3000 亿元用于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表现出政府对

临空经济发展的重视。广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与世界连通性高,临空经济产业园吸引力强。重庆作为内陆重要城市,其地区发展较为领先,但是航空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临空经济发展缓慢。

#### 4. 勉强耦合协调型

此类型包括成都、郑州、杭州,均属于区域经济落后。成都、郑州、杭州作为三个省会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和临空经济相比,区域经济相对落后,说明这三个地区的临空经济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郑州作为第一个批复建设国家级航空港区的城市,临空经济发展具有条件优势,成都和杭州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但三个城市在区域经济和临空经济方面都有极大的前进和发展空间。

#### 5. 濒临失调衰退型

此类型包括青岛和长沙,青岛是区域经济落后,长沙是临空经济落后。青岛的临空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发展缓慢,需要提升地区经济以支持临空经济发展;长沙临空经济区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优于周边城市机场各项指标的优势,在众多中部城市中率先获批建设临空经济区。但相对于北京、上海来说,长沙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临空经济发展空间巨大,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和合理规划临空经济区的发展。

#### 6. 轻度失调衰退型

贵阳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临空经济落后。贵阳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临空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都比较落后。地区生产总值、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在所有临空经济区中实力最差,所以两个系统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贵阳首先应该提升地区经济实力,只有地区经济水平得到提升之后,才有能力投资建设临空经济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临空经济产业园。

从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和起降架次排名全国前三位的北京、上海、广州都是区域经济落后,说明其客货源实力强劲,临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势头迅猛。像长沙和贵阳这类区域经济发展稍差的地区,临空经济相对落后,说明区域经济对临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小。

### (二) 建议

#### 1. 合理定位,优化产业形态布局

国家在批复每个临空经济区时对其规划文件中都有明确的定位,临空经济区要根据国家的批复文件,结合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及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合理明确的定位,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构建高端产业体系,避免所有临空经济区发展千篇一律。比如重庆

临空经济区主要分为临空制造区、临空商务区、临空物流区、临空会展区和临空都市农业区五大临空功能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一核领三区、两廊系三心、两轴连三环”为空间布局,包括北部城市综合服务区、东部临港型商展交易区、南部高端制造区。此外,在产业布局方面,一方面要注重招商选资,突出高端,节约集约用地,主要引进航空培训、飞机维修、飞机拆解改造和电子商务、物流等高端项目和企业,进一步优化临空产业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区域内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僵尸企业以及注册地和税收不在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企业进行清理、规范和搬迁,实现腾笼换鸟,确保新引项目落地建设,在建项目尽快投产。通过对产业的提档升级,逐步建立与示范区相适应的高端临空产业体系。

#### 2. 产业融合,延伸临空经济产业链

产业融合是延伸产业链的一种方式。示范区发展以临空产业为主,临空产业主要以航空核心产业、高端制造产业、现代服务产业为主,所以应依托各空港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临空指向性高的先进制造业,通过重点吸引主要制造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打造更为完整的制造产业链。比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刚好抓住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时机,给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机,手机的时效性很强,飞机运输很有优势。临空经济区成为地方转型升级和高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推动很多相关产业迅速做大做强,如将航空产业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融合,打造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园区。比如,广州空港城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全国首个空港文旅小镇落地广州临空经济区,依托小城镇,致力于打造现代商业综合体,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休闲空间。其他临空经济区可以借鉴此种发展方式,打造航空+地方特色文化模式,“港一产一城”一体化发展,不仅延伸了临空经济的产业链,还带动了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使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提升。

#### 3. 依托“一带一路”,强化对外开放能力

“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倡议,上海、广州、青岛、重庆、郑州、长沙等都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城市。临空经济区使得一些内陆城市变成对外开放的高地,国家明确指出加强港口等节点城市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支持郑州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的互联互通,可以促进节点城市的临空经济和电子

商务的发展。在有自贸区的城市,比如上海、郑州等,可以加强临空经济区与自贸区的紧密联系,共同促进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借势“一带一路”,培育出入境旅游航空枢纽。出入境旅游是以促进旅游者的跨国流动而发展起来的产业,能够快速提升区域“人流”,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临空经济示范区城市都是物流交通中转集聚地,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众多,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旅游业市场潜力非常大<sup>[10]</sup>。

#### 4. 联合高铁经济,构建“空铁联合体”

随着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迎来“高铁时代”,高铁不仅推动区域经济的产业升级和转型,而且推动区域经济的产业格局变革。民航和高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竞争关系,而是联手合作的共赢关系。二者都具有自己的优劣势,比如民航的价格比较高,但高铁的速度和安全性相对民航而言稍弱,所以二者合作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共赢。比如郑州拥有“米”字型高铁网络,可以把高铁和航空相结合,不仅为乘客提供更多的便利,也能促进各自的发展。展开空铁合作,在高铁和机场之间开通公交车或者轻轨,航空公司代售高铁车票,航班不正常时通过高铁运输旅客等。通过把高铁和民航相结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空铁联合体”。

#### 四、结语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世界经济活动的逐渐融入,未来中国对航空领域投资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临空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越来越重要。本文通过构建临空经济与区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

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论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十大临空经济示范区的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都有待提高。未来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对临空经济的投入建设,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参考文献:

- [1]戴春晨,王鹏钧. 临空城市十强有哪些? 城市间竞争,临空产业见高下[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7-08-01(8).
- [2]龚峰,冯智贵. 国内外临空经济研究综述[J]. 物流工程与管理,2012,34(3):154-157.
- [3]马晓科.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作用机理:以郑州航空港为例[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7):118-122.
- [4]赵文. 临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作用机理:以首都第二国际机场兴建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6):120-125.
- [5]崔婷,曹允春. 临空经济发展状况评价与发展阶段判定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110-115.
- [6]刘莉. 基于AHP的临空经济区发展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构建[J].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18(2):37-42.
- [7]李伟,杨国才.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城市竞争力综合比较与时间演化分析:以“中四角”城市群为例[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0):77-86.
- [8]张广海,赵韦舒.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化互动效应及其空间差异[J]. 经济地理,2017,37(1):196-204.
- [9]崔木花.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J]. 经济地理,2015,35(7):72-78.
- [10]何泉吟. “一带一路”建设中内陆节点城市临空经济发展建议[J]. 经济纵横,2015(9):13-1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Measur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Airport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Top Ten Airport Economic Demonstration Zones

FENG Shansha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irport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upl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we analy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irport econom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ten air economic demonstration zones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degre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two systems, we select the level of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en air economic demonstration zones, which ar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and give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irport econom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airport economy; regional economy; coupled coordination;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 基于 DEA 的上市物流企业效率评价

蒋亚楠

(甘肃政法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随着物流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物流效率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多数企业将物流视为“第三方利润源泉”,这不仅丰富了物流理论而且促进了物流实践的发展。对物流效率的评价也是提高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文章从国内外学者对物流企业效率的研究成果入手,总结现有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的指标,并以2012—2016年中国18家上市物流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指标,利润总额为产出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CRS、VRS两个角度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造成我国上市物流企业效率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规模绩效不佳,并针对物流企业的现状,结合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用,提出物流企业应加快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助力企业发展。

**关键词:**上市物流企业;DEA;效率;物流数据;物流信息平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7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36-06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物流业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稳步提升。近几年,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区域经济规划的提出,加快了我国跨区域物流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中国构筑全球一体化的物流通道,为中国物流业走向世界带来新的契机。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我国物流业形势发展总体良好,但其处于发展初期,表现出高投入、低产出、高耗能、低效率等特点,与发达国家物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高达18%,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5个百分点,约为美国、日本的两倍。为了深入了解我国物流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本文对18家上市物流企业近五年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以发现我国物流企业中的资源利用情况和总体发展水平,进而针对企业的运营现状,结合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用,为其合理配置资源,突破发展中的瓶颈,提升物流效率提出建议。

## 一、文献回顾

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物流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Schin-

nar(1980)在评价第三方物流企业时,采用投入导向的DEA研究方法进行物流企业的效率评价;Anthoy(2002)利用DEA方法,以职工人数、固定资产为投入指标,销售量为产出指标研究配送企业的生产效率<sup>[1]</sup>;Hokey(2003)基于产出导向型选取职工工资、运营设备与财产规模和运营成本作为投入指标,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对美国的6家知名第三方物流企业效率评价<sup>[2]</sup>;张宝友(2008)运用DEA和层次分析法对上市企业物流绩效进行评价<sup>[3]</sup>,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绩效;邓学平(2009)采用DEA-CCR/BCC模型,以固定资产、职工薪酬、运营成本作为投入指标,税前利润作为产出指标对中国沪深港28家上市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研究表明物流企业效率高低与企业规模没有必然联系,企业应注重核心技术的改进,而不是盲目的重组与扩张<sup>[4]</sup>;孟鑫(2015)选取从业人数、固定资产与物流里程作为投入指标,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增加值总额作为产出指标研究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的效率<sup>[5]</sup>。杨佳伟(2016)基于网络DEA模型,对18家水上运输上市物流企业的盈利化和市场化效率进行分析,该方法运用两阶

收稿日期:2017-10-13

作者简介:蒋亚楠(1993—),女,山东济宁人,甘肃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战略管理。

段评价指标体系,以生产和运作视角构建上市物流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注重物流企业盈利化和市场化的协同发展是提升物流企业效率的关键<sup>[6]</sup>。

我国物流企业效率的评价研究晚于发达国家,而且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市场成熟度低,理论基础薄弱。物流企业中高效的物流体系仍未建立,多数学者是从微观层面对单个物流企业进行效率评价,不利于把握我国物流行业的总体发展态势,不利于研究物流企业效率的动态调整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在宏观上从物流行业类型的视角进行评价。笔者选取 18 家上市公司涵盖运输类、港口类和航空类行业类型对其 2012—2016 年 5 年的数据进行效率评价。在数据的选择上,笔者选取面板数据,兼具横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一方面反映出物流企业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扩大样本容量,使结果更精确。

## 二、DEA 基本原理

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 DEA),也称为非参数方法或 Farrell 型有效分析法,该方法起源于 Farrell 对生产率的研究,1957 年 Farrell 首次用生产边界概念对技术效率进行估计,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单一投入单一产出的情况<sup>[7]</sup>。1978 年 Charnes 和 Cooper 等人综合运用数学、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开辟了一种高效科学的线性规划方法<sup>[8]</sup>。这种方法是对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的有效方法。

DEA 中 CCR(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和 BCC(规模报酬可变)模型是评价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有效模型。

CCR 模型为:

$$\begin{cases} \min[\theta - \varepsilon(e^{-T}s^- + e^{+T}s^+)] \\ \text{s. t.} \\ \sum_{j=1}^n X_j \lambda_j + s^- = \theta X_0 \\ \sum_{j=1}^n Y_j \lambda_j + s^+ = Y_0 \\ \lambda_j \geq 0, j = 1, 2, \dots, n; s^+ \geq 0; s^- \geq 0 \end{cases}$$

BCC 模型为:

$$\begin{cases} \min[\theta - \varepsilon(e^{-T}s^- + e^{+T}s^+)] \\ \sum_{j=1}^n X_j \lambda_j + s^- = \theta X_0 \\ \sum_{j=1}^n Y_j \lambda_j + s^+ = Y_0 \\ \sum_{j=1}^n \lambda_j = 1 \\ \lambda \geq 0, j = 1, 2, \dots, n; s^+ \geq 0; s^- \geq 0 \end{cases}$$

其中,  $X_{ij}$ 、 $Y_{ij}$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的第  $i$  项投入指标和第  $r$  项产出指标。 $s^-$ 、 $s^+$  为松弛变量,分别代表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 $\theta$  为决策单位的效率值,若  $\theta^0 = 1, S_i^{-0} = 0, S_i^{+0} = 0$ , 则  $DMU_{j_0}$  为 DEA 有效,位于管理前沿;若仅  $\theta^0 = 1, DMU_{j_0}$  为 DEA 无效。

## 三、样本数据选取和指标的选择

### (一) 样本数据选取

我国物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以中小企业居多。中小企业的数获得难度大,且准确度低,代表性弱。上市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高,报告可读性强,数据容易获取,而且上市企业在管理和运营上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交易所上市的 18 家具有代表性的物流企业,对其 2012—2016 年的年报数据运用 DEA 软件进行分析。同时,为了更好地分析差异,本文把物流业分为港口类、航空类和运输类。由于物流行业的多元化发展,一些物流公司除物流业务外还有租赁、制造、房地产等业务。为了保证 DEA 模型数据的有效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取了物流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60% 以上的物流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剔除了数据不全和数据为负值的企业。

### (二) 指标选择

指标体系是对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的基本依据,因此运用 DEA 模型评价物流企业效率时,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选取至关重要。本文将不同的公司作为生产的决策单元。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对物流企业效率评价的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指标的选择对于客观准确评价物流企业效率至关重要。表 1 列出了相关文献对于物流企业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为本文提供参考。

表 1 相关学者们构建过的指标体系

研究者	研究内容	指标的选取
邓学平	28 家上市物流公司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实证研究与分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职工薪酬、运营成本 产出指标:利润总额
孟鑫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物流企业效率评价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从业人数、物流里程 产出指标:货运周转量与物流业增加值总额
王舒鸿 <sup>[9]</sup>	沪深上市公司 76 家物流企业生产效率分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主营业务成本 产出指标:利润总额
李晓梅 <sup>[10]</sup>	2006—2015 年 A 股上市的 16 家国有物流企业绩效实证分析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总额、营业成本 产出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
翟卫东 <sup>[11]</sup>	15 家上市物流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研究	投入指标:固定资产、职工工资 产出指标:税前利润

本文结合文献研究的成果,制定了相关的指标体系。选取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指标,利润总额为产出指标,并对相关的指标进行了具体分析。

固定资产是企业总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资产中创造价值的主要资产。物流企业的固定资产能否被合理利用,以及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物流企业的经济效率。本文选取固定资产作为第一个投入变量。

员工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运作者,是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资源,对技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在物流行业中,运输人员,搬运人员,装卸和配送人员占有很大的比重,且员工的流动性非常高。劳动力是物流行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所以劳动力数量(员工人数)为第二个投入变量。

利润是企业的重要经营成果,也是衡量企业经营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利润指标的选取上,考虑到各地税收政策的差异,有些企业净利润可能为零甚至为负值,为保证 DEA 模型数据的有效性,本文选取利润总额为产出变量。

####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运用 DEAP2.1 软件,把 18 家上市物流企业的投入与产出数据代入 DEA 模型中的 CRS 和 VRS 进行求解,得到 18 家上市物流企业近 5 年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 (一)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实现最大产出的能力,反映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率<sup>[12]</sup>。由表 2 得到我国 18 家上市物流公司的技术效率均值为 0.325,表明我国上市物流公司效率水平偏低,投入产出组合低下,资源利用率低,还存在 67.5% 的提升空间。其中盐田港近 5 年的技术效率都为 1,达到 DEA 有效,说明盐田港近 5 年都处于在投入固定的情形下,获得最大产出,或在产出固定的情形下,投入最低。上海机场、上港集团、深赤湾、外运发展,技术效率分别为 0.599、0.564、0.549、0.531,说明这四家企业投入产出组合效率较高,资源利用比较合理,但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企业应尽快调整投入产出的比例,以达到 DEA 有效。

从公司类型看,运输类物流企业平均技术效率为 0.241,港口类为 0.459,航空类为 0.259,港口类技术效率最高,运输类最低。说明近 5 年港口类的物流企业发展态势高于运输类和航空类。港口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港口物流产业的兴起,港口业大多

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港口交通设施的完善,因此,港口业的物流效率取得了很大进步。

表 2 技术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0.020	0.003	0.042	0.068	0.027	0.032
	铁龙物流	0.329	0.311	0.229	0.241	0.228	0.268
	外运发展	0.513	0.409	0.261	0.471	1.000	0.531
	保税科技	0.551	0.565	0.333	0.097	0.171	0.343
	大秦铁路	0.166	0.171	0.179	0.206	0.126	0.170
	中储股份	0.123	0.117	0.137	0.232	0.412	0.204
	均值	0.284	0.263	0.197	0.219	0.241	0.241
港口类	上港集团	0.390	0.449	0.523	0.681	0.775	0.564
	营口港	0.242	0.224	0.155	0.173	0.207	0.200
	锦州港	0.137	0.149	0.211	0.137	0.063	0.139
	盐田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深赤湾	0.458	0.486	0.391	0.637	0.773	0.549
	天津港	0.214	0.251	0.265	0.355	0.427	0.302
	均值	0.407	0.427	0.424	0.497	0.541	0.459
航空类	白云机场	0.278	0.326	0.128	0.181	0.204	0.223
	海南航空	0.311	0.294	0.305	0.421	0.513	0.369
	中国国航	0.137	0.081	0.074	0.148	0.181	0.124
	深圳机场	0.186	0.161	0.071	0.185	0.205	0.162
	上海机场	0.429	0.524	0.488	0.734	0.822	0.599
	南方航空	0.072	0.048	0.038	0.092	0.116	0.073
	均值	0.236	0.239	0.184	0.294	0.340	0.259
总体均值		0.309	0.309	0.268	0.337	0.403	0.325

纵向比较来看,2013—2014 年,技术效率的总体均值由 0.309 降至 0.268,这是因为油价上涨,使得物流企业运输成本提高。此外,航空业还受到汇兑损失的影响。2014—2015 年,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物流企业总体均值由 0.268 提升至 0.337,2016 年达到 0.403,说明我国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大了物流需求,物流技术效率有所提高。

##### (二)纯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是企业制度和管理水平带来的效率,是企业由于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 = 1,表示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上,其投入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的。纯技术效率值越高,资源配置合理程度越高。从表 3 来看,我国物流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要优于技术效率(0.640 > 0.325);18 家上市物流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值在 0.600 左右波动,表明目前我国物流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水平较高,但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还有 40% 左右的上升空间。上港集团、盐田港近 5 年的纯技术效率都为 1,说明其在 18 家上市物流企业达到 DEA 有效,投入要素组合最为合理有效。外运发展、保税科技、大秦铁路有 4 年达到 DEA 有效,纯技术效率都为 1,说明这三家企业纯技术效率水平比较稳定,且维持在较高

水平。18 家企业中,有 10 家企业达到了均值以上,占总体样本的 67%,说明我国物流企业总体资源配置与技术利用效率较高,但先进物流技术的推广还不足。

表 3 纯技术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0.044	0.006	0.075	0.092	0.032	0.050
	铁龙物流	0.802	0.624	0.427	0.338	0.274	0.493
	外运发展	1.000	1.000	0.886	1.000	1.000	0.977
	保税科技	1.000	1.000	0.338	1.000	1.000	0.868
	大秦铁路	1.000	1.000	1.000	1.000	0.876	0.975
	中储股份	0.625	0.581	0.706	0.698	0.775	0.677
	均值	0.745	0.702	0.572	0.688	0.660	0.673
港口类	上港集团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营口港	0.504	0.404	0.273	0.234	0.249	0.333
	锦州港	0.233	0.235	0.307	0.169	0.072	0.203
	盐田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深赤湾	0.820	0.772	0.592	0.780	0.871	0.767
	天津港	0.630	0.626	0.505	0.496	0.526	0.557
	均值	0.698	0.673	0.613	0.613	0.620	0.643
航空类	白云机场	0.616	0.662	0.674	0.651	0.658	0.652
	海南航空	0.760	0.620	0.571	0.606	0.648	0.641
	中国国航	0.655	0.389	0.341	0.623	1.000	0.602
	深圳机场	0.800	0.305	0.133	0.271	0.252	0.352
	上海机场	0.987	1.000	0.919	1.000	1.000	0.981
	南方航空	0.384	0.255	0.193	0.415	0.749	0.399
	均值	0.700	0.539	0.472	0.594	0.718	0.605
总体均值	0.714	0.638	0.552	0.632	0.666	0.640	

从公司类型看,运输类物流企业的平均纯技术效率为 0.673,港口类为 0.643,航空类为 0.605。运输类物流企业的纯技术效率明显优于港口类和航空类,近 5 年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投入都高于港口类和航空类。

从纵向比较来看,铁龙物流的近 5 年的纯技术效率呈下行趋势,说明近 5 年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其未来发展的着力点是进一步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完善投入要素的配置机制,努力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 (三) 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是由于企业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反映企业离规模最优状态的程度<sup>[13]</sup>。规模效率 = 1,说明规模效率有效。规模效率 < 1 时,规模效率无效,此时又分为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减。如表 4 所示,相对于纯技术效率,我国上市物流企业的规模效率较低,总体均值为 0.521。从数量上,只有 1 家企业盐田港近 5 年达到 DEA 有效,占样本量的 5.6%。因此,造成我国物流企业总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低下而非纯技术效率低,即公司存在过多的资源浪费问题。

表 4 规模效率

分类	企业名称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均值
运输类	中远航运	0.463	0.519	0.558	0.737	0.826	0.621
	铁龙物流	0.410	0.499	0.537	0.713	0.831	0.598
	外运发展	0.513	0.409	0.294	0.471	1.000	0.537
	保税科技	0.551	0.565	0.986	0.097	0.171	0.474
	大秦铁路	0.166	0.171	0.179	0.206	0.144	0.173
	中储股份	0.197	0.201	0.194	0.333	0.532	0.291
	均值	0.383	0.394	0.458	0.426	0.584	0.449
港口类	上港集团	0.390	0.449	0.523	0.681	0.775	0.564
	营口港	0.480	0.553	0.568	0.739	0.829	0.634
	锦州港	0.585	0.634	0.687	0.811	0.881	0.720
	盐田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深赤湾	0.559	0.630	0.660	0.817	0.887	0.711
	天津港	0.339	0.400	0.526	0.716	0.812	0.559
	均值	0.559	0.611	0.661	0.794	0.864	0.698
航空类	白云机场	0.452	0.493	0.190	0.277	0.310	0.344
	海南航空	0.409	0.475	0.534	0.694	0.791	0.581
	中国国航	0.210	0.207	0.218	0.238	0.181	0.211
	深圳机场	0.233	0.528	0.532	0.683	0.814	0.558
	上海机场	0.435	0.524	0.531	0.734	0.822	0.609
	南方航空	0.186	0.186	0.198	0.222	0.155	0.189
	均值	0.321	0.402	0.367	0.475	0.512	0.415
总体均值	0.421	0.469	0.495	0.565	0.653	0.521	

盐田港近 5 年的经营绩效都达到了比较理想的状态,企业的投入满足了发展的要求,公司不需要调整规模,只需维持较好的发展状态。保税科技等其他公司在 2012—2016 年均存在着规模报酬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企业的投入要素的资源配置与投入规模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企业规模成为制约企业效率提高的关键。18 家企业中,15 家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这些企业存在超越最优投入规模水平、过度投入资源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应适时调整资本结构,收缩资本,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由此可见,物流企业的规模与生产效率没有必然的关系。企业规模扩大而提升生产效率往往出现在企业发展的初期,企业管理层不能仅仅把扩大规模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更应该把企业发展的核心放在技术与管理方面,将生产调整至最佳状态。

### 五、政策建议与结论

通过对 18 家上市物流企业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物流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偏低。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两者共同影响的结果<sup>[8]</sup>。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上市物流企业的规模效率低是造成我国总体技术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即很多企业存在过度扩张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现象;纯技术效率较高,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因此,为了改善我国目前上市物流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本

文提出如下建议。

### (一) 优化资源配置

本文通过对上市物流企业的效率的评价,发现达到 DEA 有效的企业较少,反映了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问题,即产出不足或投入冗余,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是根本。在当今企业的生产与发展中,物流企业经济效率的高低,不仅仅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的规模,还与资源的配置情况密切相关。其中,资源配置涵盖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两个方面。

首先,关注物流人才的培养。我国物流业发展水平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sup>[14]</sup>。因此,完善人才考评机制,招聘职业技能水平能够满足当前岗位需求的员工以及引进物流高素质人才,给企业发展注入新的物流理念和物流管理方法。另一方面,企业要及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在物流行业得以推广,使得没有经过培训的员工在利用这些技术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技术资源的浪费。因此,企业对员工要定期进行培训以提高员工的素质,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其次,在企业对物资采购与保管时,如果不按照实际工作情况进行配置,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因此,企业要与时俱进,凭借已有的优势资源,及时调整资源,通过资产重组,整合资源,提高竞争力,提升企业效率。

### (二) 引进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物流技术创新

现代物流企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的竞争,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增强物流技术水平才是经营的重点。物流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并预测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大数据技术在物流企业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物流企业的运行效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智慧物流是今后物流业的发展方向。

#### 1. 提高管理层对大数据技术的认识度

目前,国内的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产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物流大数据的概念和技术缺乏科学而系统的了解,物流企业的技术人员缺乏系统的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培训和考核。政府要提高对大数据发展战略的认识,加大在物流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加快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加强信息沟通<sup>[15]</sup>。企业管理者应变革思维模式,抓住时代的脉搏,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迅速开展物联网传感技术、GPS、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学习。例如在数据收集时,主要筛选与物流相关的信息,如客户订单需求及订货量、物流配送路线

选择、仓库选址等信息。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对物流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使得物流员工从传统的日常业务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关注具有战略导向的工作,将大数据转化为资源优势,提供更加专业的信息支持,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

#### 2. 加强安全防护

虽然大数据在物流企业的应用能够提高物流企业的运行效率,助力企业发展,但是在企业高效的管理和利用大数据之前,大数据可能转变为大风险。这是因为数据在存储和传输时,如果技术不完善,数据很可能面临被篡改和截留的风险。物流企业的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当事企业,也与许多的利益相关者密切相关,数据一旦泄露,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经济和信用损失,严重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对数据的安全保护监管主要由公安、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监管,多头监管难免导致工作中的推诿扯皮,因此政府要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确保监管没有漏洞。物流企业要建立更加安全的用户访问制度,发展符合自身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

### (三) 加快物流标准化建设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物流国际化的发展,物流企业也认识到物流行业的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而物流的标准化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因此,我国应针对当前物流标准存在的问题,开展物流标准化的研究工作。例如,制定标准化的物流工作规范、专业术语以及工作流程。加快我国物流与国际物流的顺利接轨。物流行业的标准应该由国家物流业标准化委员会制定,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制定不同的物流行业运行标准。由于物流行业类型多,可以先试点,然后全面推行,达到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效果。

### (四) 优化组织管理水平,建立适合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机制。

我国大部分上市物流企业是国有企业,机构臃肿,管理不力,借助体制优势盲目扩张投资,降低了企业的效率,政企不分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其体制缺陷成为企业发展的羁绊<sup>[16]</sup>。因此,政府要从企业的经营者转为引导者,使企业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建立适合物流行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升物流行业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 六、结束语

本文在阐释了物流企业效率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了 18 家上市物流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固定资产、员工人数为投入变量,以利润总额为产出变量,运用 DEA 模型对 2012—2016 年的数



据进行分析得出上市物流企业总体技术水平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无效率。企业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调整资源,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衡量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率。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智慧化物流是今后物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应立足现实,抓住大数据的发展机遇,积极加入适合自身发展的物流信息平台。DEA 这种科学而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能有效评估物流活动的动态绩效,使得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了解自己,认清形势,从而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参考文献:

- [1] Anthony R, Cornelia D. An Integrated Bench Marking Approach to Distribution Center Performance Using DEA Modeling[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2(1):19-32.
- [2] 刘翔. 基于 DEA 法的中国上市物流企业效率评价[D]. 南昌:江西财经大学, 2015.
- [3] 张宝友, 达庆利, 黄祖庆. 中国上市物流公司动态绩效评价及对策[J]. *系统工程*, 2008(4):6-10.
- [4] 邓学平. 中国物流企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与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43-47.
- [5] 孟鑫. 基于 DEA 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效率分析[J]. *企业经济*, 2016(12):108-113.
- [6] 杨佳伟, 王美强. 基于网络 DEA 的中国上市物流企业绩

- 效评价[J]. *企业经济*, 2016(11):125-130.
- [7] 徐新闻. 中国物流产业效率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 2016.
- [8] 邢雯佳, 万幼清. 基于 DEA 的物流上市公司绩效评价与对策[J]. *科技创业*, 2014(3):38-41.
- [9] 王舒鸿, 宋马林. 基于 DEA 方法集的物流企业生产效率分析[J]. *物流技术*, 2010(8):52-55.
- [10] 李晓梅, 白雪飞. 基于超效率 CCR-DEA 的国有物流企业绩效实证分析[J]. *中国流通经济*, 2016(4):26-33.
- [11] 翟卫东. 中国上市物流企业生产管理效率的 DEA 模型研究[J]. *物流技术*, 2013(6):125-146.
- [12] 蔡丰. 基于 DEA 的我国上市物流企业运营绩效评价研究[D]. 洛阳:河南科技大学, 2015.
- [13] 高清华. 物流企业服务创新及其绩效评价实证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2.
- [14] 王柳根. 基于 DEA 和 AHP 的大型物流企业绩效评价和影响因素研究:以 X 公司为例[D]. 杭州:浙江大学, 2011.
- [15] 王柏谊, 孙庆峰. 大数据时代物流信息平台构建与建设对策研究[J]. *情报科学*, 2016(3):52-61.
- [16] 唐建荣, 刘淑芬. 基于 DEA 的上市物流企业绩效评价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5(5):65-6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List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Based on DEA

JIANG Yan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the logistics efficiency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many scholars. For most companies, the logistics is considered as a source of third-party profits and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logistics. The evaluation of logistics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abroad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the summary of the existing logistics enterprise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ex. Chinese 18 listed logistics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6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fixed assets and the number of workers as input indicators, the operating profit as the output indicators, we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se enterprises from the CRS and VRS perspective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e poor efficiency are the poor scale performance of list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we consider that logistics enterprises should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Key words:** List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DEA; efficiency; Logistics data; logistics information platform

# 实现审计全覆盖方法分析

夏 宏

(河南大学 财务处,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审计全覆盖是新时期国家对审计机关提出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在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方面进展显著,但财政资金审计覆盖率总体不高,监督效果还未达到审计全覆盖的要求。实现审计全覆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本文分析了我国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意义、审计全覆盖的现状,并提出了审计全覆盖的方法。实现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应从完善审计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制定审计计划、审计专业人才建设、技术支持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审计全覆盖;审计监督;财政资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8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42-04

## 一、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意义

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监督的重要手段,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

目前,政府审计对象日趋多元化,审计内容日趋复杂化,审计资源相对紧缺,监督对象就容易出现盲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审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财政收支、财经法纪的审计,而是以真实性为基础,兼顾效率、经济效益与经济责任并重的审计业务格局,构建审计“免疫系统”及综合性履行职能,不断增强审计的威慑力和实效性。我国的政府审计已经由单纯的财政收支管理、财经法纪审计发展到以真实性为基础,经济效益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并重的格局中来。同时,审计监督的理念也有很大的改变,从以前的流于形式到现在的实质重于形式。

2013年,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提出审计监督全覆盖是通过科学的安排审计计划,选择审计方式,使所有的监督对象在一定时期内都能接受审计监督,形成一种动态的审计全覆盖体系。审计目标和任务的实现是建立在努力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不断提高审计的威慑力和有效性之上。

审计监督全覆盖是新时期国家对审计机关的基

本要求,审计机关要在职权范围内,对所有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使用部门和单位以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企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全面的审计,不留盲区,从而做到对审计监督对象和财政资金使用各个环节的全面覆盖。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国家审计工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财政资金收支审计等微观经济领域,更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展开,防范经济社会运行风险。审计全覆盖的提出不仅会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提高使用效率,还将会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运行绩效,同时,审计全覆盖在促进国家治理更加科学化、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也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 二、审计全覆盖现状分析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根据李克强总理“审计工作要全覆盖,凡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和项目,都要接受审计监督”这一要求,不断扩大政府审计的范围,更新审计方法,转变传统的审计监督理念,让审计的阳光照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角落。目前,审计监督全覆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难题:

收稿日期:2017-10-27

作者简介:夏宏(1985—),女,河南睢县人,硕士,河南大学财务处经济师,研究方向:会计、财政。

### （一）立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有关审计法规,规定了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对审计范围和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在法律上实现了审计全覆盖。但是在审计全覆盖相关的具体法规上欠缺规范化和全面性,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模糊,口径不一,前后矛盾等问题还层出不穷,这大大增加了审计执法的难度,严重制约了审计全覆盖的推进。

### （二）审计的广度、深度方面

过去审计主要是对财务的审计,而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又多出了比如环境审计、绩效审计、责任审计等形式,同时,审计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但是在审计实践中仍是过多重视财务审计,没有发展形成多层次的审计体系。这样就造成了往往从单一的财务层面反映被审计单位状况,而不能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全面状况、真实状况。科学合理的审计覆盖面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有效保障,也是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保障作用的前提。

在审计深度方面也很难达到审计全覆盖的要求。以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为例,审计通常仅限于中央财政资金在北京地区的使用情况,很少甚至几乎不涉及资金在北京地区以外的运行情况,这样就很难实现财政资金在纵向方面的有效监督。

### （三）审计人员队伍方面

目前,很多审计机关普遍存在着审计人数少,时间紧,工作量大的问题,并且审计全覆盖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一时间难以达到显著的效果。目前,我国的审计力量总量不足,审计机关人员在结构上也不尽合理,很多审计机关缺乏专业性、复合型人才,使得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的审计很难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随着经济的发展,审计对象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各界对政府审计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审计力量的增长远未跟上审计需求的增长。审计工作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多,使得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原来越严重,这影响了审计工作的覆盖面,要实现审计全覆盖存在极大的困难。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工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审计全覆盖的程度。

### （四）审计技术方面

目前,审计机关已经基本实现了会计的电算化,财务软件的应用也已经普及,但是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比如计算机局域网的建设、内部网上数据和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审计信

息化程度低主要在于审计机关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人员投入都不够。

很多审计机关特别是一些地方审计机关的信息共享平台模式较为单一,数据云、数据库与审计手段统筹规划的运用还没得到普及。另外,由于审计资源的涉密性质,没有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给予信息发布者以信任感,使得很多审计资源的获得仍然依靠传统的收集方法。

## 三、审计全覆盖方法分析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审计全覆盖应选择渐进的方式方法,突破制约审计全覆盖的薄弱环节,分层次实现审计的全面覆盖。审计全覆盖主要包括审计监督对象的全面覆盖和审计监督内容的全面覆盖。

### （一）完善审计监督法律法规

加快规范现有的审计制度以及地方部门审计规章条文,加快设计法制化建设,使审计业务有法可依,依法定责,是实现审计全覆盖的根本途径。应根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要求,修订审计相关法律法规,拓展审计范围,明确设计对象,细化审计内容,为审计全覆盖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为审计人员更好的贯彻执行审计全覆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还要积极探索与审计全覆盖相适应的新的准则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范围,把审计全覆盖上升到国家法律可以保障的层面,清除实施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的障碍。还应尽快完善地方审计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很好的指导地方审计机关的工作,保障其审计职能,顺利实现地方审计全覆盖。

一般来说,国家治理的法制化程度越高,审计全覆盖就越具有实效。因此,必须上升高度,从依法治国的高度认真对待实现审计全覆盖过程中所面临的审计法律法规完善问题。在加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的同时还应完善审计全覆盖相关的具体的法律法规,为审计全覆盖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通过推动完善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地规划和配置审计监督资源。

### （二）科学合理地制定审计计划

审计计划是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基本保障。审计计划是审计工作的起点,为有效实现审计全覆盖,审计机关在制定审计计划时要做到科学统筹,全面安排。实行审计全覆盖要把全部审计对象纳入监督视野,准确把握监督对象的覆盖情况,并根据实时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为审计计划提供参考依据。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进行审计,确保政府预

算的有效执行是国家审计机关的基本职责。审计作为国家预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需要与政府预算周期相匹配。审计部门在制定年度审计计划时需要与政府的项目规划紧密结合,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安排计划,做到审计对象明确,目标可行,进度可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国家不可能将全部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运用于审计机构,因而某一审计项目也不可能无穷尽的耗费审计资源。审计全覆盖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指对所有的审计对象和审计环节都给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审计,而是有重点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审计对象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审计,并且不遗漏任何需要审计的对象。审计工作要围绕政府的工作中心,服从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全面把握相关经济领域的总体情况,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统筹部署,有计划地进行,突出重点审计项目,提高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审计频率,确保实现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全覆盖。同时兼顾一般审计项目,制定科学合理的审计周期。由于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要编制与长期目标相适应的动态可持续的长期计划,然后制定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且短期计划和中期计划要与长期计划有机结合。对于不同的审计对象要制定不同的审计计划,实现审计对象和审计环节的全面覆盖。

因此,在审计计划制定之初就应先确定审计目标,合理确定重要性程度,从总体上对被审计对象发表审计意见。

(三)将高端审计人才和复合型审计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

随着国家对审计全覆盖要求的不断提出,审计人员力量不足愈来愈明显,尤其是高端审计人才的匮乏,这是制约着我国实现审计全覆盖的瓶颈。

审计全覆盖对审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审计人员除了应精通财会、审计知识,还应掌握法律、管理、金融、工程、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过硬的政治素养、灵活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审计人才的培养应通过继续教育、培训等手段,鼓励审计人员多参加法律、金融、经济管理等的培训,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然而对于很多审计机关来说,由于经费有限和教育资源稀缺,审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虽然每年也会有很多培训,但是培训的内容与实际工作中的审计项目没有关联性,也没有使培训内容得以有效推广应用的平台,使得审计人员的培训缺乏系统性。因此,应考虑制订一个定期的、切合审计方案的培训

计划,建立一套高标准的教育培训制度,增强教育培训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比如实行审前培训、中长期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和培训,可以按照专业、类别分别进行不同的有针对性的业务交流和培训,使他们及时更新目前审计工作的最新政策、最新的审计技巧和方法,改善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

坚持以审计全覆盖为导向,以提高审计实效为目标,建立科学的人才流动机制,有针对性地引入资源环境类、项目工程类、计算机类等各方面专业性人才,着重审计队伍中高端人才的培养,提高审计工作的专业性、精准性。积极打造审计队伍职业化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尽快推动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全面实现。

(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好审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和维护,保证审计信息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如今知识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要实现审计全覆盖,传统的审计技术和方法已满足不了审计信息化的要求,因此,必须利用互联网构建大数据审计信息平台系统,利用其收集整理结果的优势,全面覆盖,重点突出协助采集数据,分类存储,全面分析,提高审计的效率,同时降低审计风险,实现监督的常态化,从而实现审计全覆盖。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基本的信息系统处理操作知识,利用智能化,制定相对应的审计方法和手段,使信息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如今很多被审计对象提供的数据,包括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等多元化的数据资源,组成庞大复杂的数据,极大地扩展我们的审计视野,使审计全覆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大数据环境下,审计人员面临的原始资料是具有高度概括性、模糊性、关联性的海量电子数据,因此,审计人员应坚持以数据为核心,数据分析与现场检查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关注资金的流向,从中发现疑点,同时要有数据纵向关联分析和横向关联分析的观点,预算执行单位数据与财政预算数据之间的关联分析,财政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关联分析以及不同领域单位之间的横向关联分析。通过对数据的关联分析,多维度挖掘,利用信息资源快速流通的优势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借助于金审工程,加大数据综合利用的力度,推进审计数据中心建设和审计管理的数字化,实现与被审计单位数据信息的实时联接,突破现有审计项目行

业部门的局限,构建和完善审计专业数据库和大数据平台建设。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家审计数据库和数字化审计平台建设可以积极推进数据中心联网审计和对所有审计数据关联分析,打破当下审计过程中经常面对的壁垒。通过信息技术获取审计信息,借助于大数据处理工具,实现数字化审计,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核查问题和进行宏观分析的能力,实现对被审计单位的精准定位,提高审计的质量和审计的效率,从而实现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

#### 四、结语

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是我国审计机关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审计技术、审计格局还不尽完善,审计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我国目前审计监督的覆盖面距离全覆盖的要求相去甚远,审计全覆盖作为审计机关监督和制约财政资金使用和权利运行的有效措施还未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审计监督全覆盖并不是一种新的审计模式,它只是实现审计目的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审计全覆盖以实现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为主要目的。国家实行审计全覆盖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公共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全面审计,重点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项目、关键性领域审计,推动国家法制化建设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我国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是建设更高水平监督框架的阶段性目标。审计监督的全覆盖是我国深化内部改革的要求,同时也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促进审计监督的全面覆盖要充分考虑审计力量、审计技术、审计资源等因素,突出重点,全面兼顾,稳步推进。审计全覆盖是有步骤、有重点、有成效的全覆盖。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审计全覆盖应制订科学合理的审计计划、完善审计相关的制度建设,同时加强审计全覆盖所要求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

#### 参考文献:

- [1] 刘家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 审计研究, 2008(3).
- [2] 张涛涛. 新常态下国家审计全覆盖实现路径探析[J]. 财会通讯, 2016(22).
- [3] 徐薇. 国家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实现路径研究[J]. 审计研究, 2012(4).
- [4] 戚振东, 尹平.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全覆盖: 一个理论框架[J]. 学海, 2015(6).
- [5] 任艳利, 梁哲, 韩妍妍. 审计全覆盖的现状、原因分析及实现路径[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5(9).

(责任编辑 许峻)

## Analysis on the Methods of Realizing Complete Coverage for Audit

XIA Hong

(Finance Offi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Complete coverage for audit is the strategic objective with of the audit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period. Currently, complete coverage of audit supervision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audit coverage of financial capital is generally lagging and supervision effect has not yet reached complete coverage of the audit requirements. Realizing complete coverage of the audit is a long-term and arduous task.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izing complete coverage of the audit in our country and the status of complete cover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of the complete coverage for the audit. Realizing complete coverage of the audit supervision should start with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related to audit, scientifically formulating the audit plans, audit professionals, technical support, etc.

**Key words:** complete coverage for audit; audit supervision; financial fund

# 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精准信息服务机制探析

胡永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 郑州 450044)

**摘要:**从信息服务的角度,以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外出务工返乡创业的信息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信息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双创”信息短缺的原由。同时探讨满足“双创”人员的创业信息需求途径,为信息服务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推进创业信息服务主体和客体间的交融关系,构建起贫困地区精准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贫困地区“双创”人员 精准信息服务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09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46-04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以及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尤其是到贫困地区进行创业创新,简称“双创”。“双创”是外出务工群体创业基本要素如技术、信息、管理、理念、资金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理性的创业方式方法,也标志着外出务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国家为推进这一模式的持续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举措,不断改进并逐步完善“双创”的内外环境,拓宽了就业机会,增大了创业余地。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快捷的市场信息是返乡“双创”的基本要素,能否及时获取各类创业信息关乎到“双创”的成败。不难理解,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由于创业信息流通,获取较为便利,返乡“双创”进展得比较顺利,整体上容易形成良性循环。但在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信息较为闭塞,严重地制约着返乡人员进行“双创”的步伐,且往往酿成恶性循环。作为“双创”的主体,返乡人员通常具有搜索意识不够强烈、搜索内容不够广泛等信息搜索行为滞后的特征,致使他们的创业遇到了不少困难,而这一点,在返乡农民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难看出,掌握市场信息不

够全面灵活,了解市场行情信息较为滞后,极大地拽拖“双创”的进程,影响着创业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急需精准信息服务机制为之提供支持。

我们以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为调查对象,考察创业信息服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方案,并探索构建精准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 一、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信息服务现状

### (一)“双创”信息供给量较少

近年来,国际市场低迷,出口订单不断滑坡,使致力于供需国际市场的就业岗位不断缩减。而与此同时,国内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部分务工人员选择回乡创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力量。然而,由于受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理条件复杂等现状的制约,出现了期待“双创”的人员返乡后闲散在家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需求信息识别难度大,定制“双创”服务信息成本较高,造成面向该地区的创业的必要信息供给严重失衡。另一方面,限于自身能力和条件,在创业之前,“双创”人员对创业信息需求量较大,而且还要经过一个不断地筛选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7-11-3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一般课题)“面向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的精准信息服务机制研究”(2017B251)

**作者简介:**胡永启(1973—),男,河南嵩县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副教授。

## （二）制约“双创”信息因素多

制约贫困地区“双创”的因素有：当地政府管理、服务的理念和思路不够便民惠民，党和国家制定的“双创”优惠政策未完全落到实处，“双创”资金、融资渠道不充足或通畅，“双创”必备资源如土地等成为发展瓶颈，“双创”还缺乏合乎现况的管理经营方式与方法，多数地区尚不具备“双创”人员接受再培训与再教育的条件，等等。所有这些是“双创”人员在主观上所不能完全克服的，这就要求多方联动起来，合作解决问题。

## （三）“双创”信息获取渠道狭窄

由于贫困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农村光缆线路、无线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加之接触信息的机会不均衡，这必然造成返乡“双创”人员获取创业信息的渠道变狭变窄。问卷调查发现，作为“双创”的主体，创业者获取信息还主要通过传统媒介如电视、报纸及广播等，或是通过人际传播，把互联网当作获取创业信息重要渠道的情况并不多见。

## （四）“双创”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

信息服务体系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因组建起步晚，一些关键性的内容或步骤尚处于探索尝试阶段，故当前处于不健全、不完善的状态，致使信息服务主体如返乡“双创”人员、为“双创”提供基本保障的基层国家机构以及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如县乡农村科学技术推行推广站（室）等，难以得到必要的信息而影响到“双创”的进程，甚至是停滞不前。

## 二、“双创”信息短缺探因

### （一）信源不对称

就“双创”人员的主体而言，由于各人的知识能力不同和所处地域环境的差异，导致对有关创业信息的了解有差异，理解度也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比起经济发达地区来，他们所获取的创业信息又较为贫乏。即个人和区域经济等存在的差异，使信源难以对称，在“双创”进程中，创业人员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 （二）信道不通畅

由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网络流通功效受限，信道常被干扰或是相互冲突，加之信息技术应用不够，在“双创”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漏报、迟报甚至是误报、不报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着就业信息的流通与发布。

### （三）信息能力弱

对于“双创”人员来说，使用信息能力是他们求

职就业的重要前提。然而在信息的海洋中，所有信息具有真伪、正负价值、有序与无序之分，故而，判断和接纳信息的能力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返乡“双创”人员在信息利用能力上存在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比较之下，贫困地区的创业人员通常属于弱者，极不利于“双创”的开展。

## 三、返乡“双创”信息服务的政策建议

针对“双创”信息服务现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势态，提出如下举措。

### （一）搭建“双创”信息服务平台

当前，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发展中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上支持、资金上扶持，努力搭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双创”信息服务平台。在提供信息服务时，政府应具备“数据信息先行”的发展思路，实时监控、分析和预测“双创”信息需求变化，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快速查询、精准锁定等功能，根据各阶段的实际情况为“双创”提供动态化的信息服务，帮助决策者适时调整政策、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和作用。

### （二）完善信息服务方式

就现阶段而言，部分地区虽然已基本上实现了精准扶贫工作的信息化，但在具体操作环节却由于信息传递缓慢、信息失真等原因，使得信息服务工作刻板、僵化。因此，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以移动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信息载体，针对“双创”信息化建设中的重点领域进行政策设计、制度设计和工程设计，对整个“双创”信息平台数据实施动态化存储和管理。另一方面，不断加大贫困地区网络基础建设力度，积极为“双创”人员筹措产业扶贫启动资金，4G基站建设、互联网光纤宽带建设和家庭光纤宽带覆盖，满足“双创”信息需求。

### （三）拓宽创业信息发布渠道

构造“线上线下”完善对接平台。通过搭建定期现场招聘会平台及就业网络服务平台，构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对接平台，用人单位与求职者可通过一体化平台进行有效对接。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积极拓宽创业信息发布渠道，完善对接平台，打通“双创”对接服务的瓶颈。线上，搭建一个可使“双创”群体随时随地展开信息交流的虚拟社交网，然后通过智能推荐分组等引导措施激活该网络，最终在“双创”群体之间形成线上信息互助社区，从而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

线下,通过人际关系网形成信息互助小组,同时运用社团闭包、会员闭包等原理开展线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提高线上信息互助社区活跃度、黏度,促使“双创”群体间迅速建立起强、弱联系,从而促进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的构建,推动线下信息互助小组的形成。

政府可以搭建公共“双创”服务平台,开设现场信息发布窗口、基层服务平台、“双创”网站、微博、微信、QQ群、电话、短信等多功能多形式的信息发布渠道,“双创”人员可以通过任一渠道进行相应的信息发布和获取,并将相关的信息汇集于同一平台下。

嵌入“电话回访”提升服务成效。通过市公共就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定期电话回访,更新广大用户的最新“双创”需求,跟踪用户的对接情况,通过定期跟踪回访服务提升信息的准确性及服务有效性。

#### (四)增强“双创”人员返乡创业的信息意识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推断,当周围环境提供的信息能满足用户信息需求时,用户就会产生满足感并对信息提供方产生良好印象。由于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不同,贫困地区返乡“双创”人员信息意识和使用通信设备的能力有所差异,信息意识薄弱群体即使在遇到需要信息时也可能因为缺乏认知水平而不会发生信息使用行为。对此,文化部门可邀请信息专家对“双创”群体开展一系列信息培训,培养他们对信息的敏感度,提高其信息主体意识、信息公平意识、信息安全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进而重视自身发言权、表决权和获得完整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可通过宣传教育,使“双创”群体进一步认识到获知信息的价值,充分认识信息服务的重要性,比如,信息能力是求职就业的重要前提,是工作能力的构成要素和维护权益的重要关键,也是全面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保障,更是他们及其子女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等等。

#### 四、精准信息服务机制的交融共进

从信息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双创”信息服务包括创业信息服务主体、创业信息、创业信息服务客体三项基本元素。那么,如何使三者在不断发展中相互交融、合力共进,是解决“双创”精准信息服务长期机制的关键所在。

##### (一)建立健全“双创”信息服务的主体机制

构建信息服务主体机制,主要是构建政策扶持、创业手续、创业经验、投资项目、银行贷款等机制。其中,政府起着先决的作用,可通过某一地区的试

点,实现本地区与相关部门间的政策联动,保证所出台扶持政策符合实际,并能够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注重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方案,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使政策更具有引领性、预见性、前瞻性。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放权简政,使创业手续办理简便化、快捷化。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不仅有利于国家“双创”政策的顺利推行,而且可使“双创”人员获得知遇感,便于形成良性的发展态势。创业经验主要集中在已经创业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创业的群体当中,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可以继续推行,失败的教训也要引以为戒。同时,及时再总结创业经验,使之不断得以优化,奔着把创业成功扩展至最大化、把失败降至最小化的目标,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于“双创”的人员从中受益。投资项目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降低、防范投资风险。在政策规定的范围,银行为“双创”人员提供及时的充足的信贷,也是建立健全“双创”信息服务主体重要组成方面。不断完善“双创”所必备的各种信息服务主体,齐头并进,发挥各自的作用,使“双创”人员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增收的余地。

##### (二)激发“双创”信息服务的主体

“双创”信息服务主体更倾向于生产者,即“双创”人员,主要包括就业增收、均衡发展、利益共享、民生普惠、生态补偿等机制。贫困地区“双创”人员返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实现就业,并通过就业创收增收,这是政策扶持人如政府必须关照到的重要方面。“双创”进行到一定阶段,均衡发展才有可能得以较好的实施,在“双创”群体中,优胜者带动迟弱者,最终走向均衡发展的轨道上。坚持利益共享,使“双创”群体得以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对于迟弱者,在可供享用的利益面前,可以轻松及时地得到各种创业信息,而找到均衡发展的节点。经过“双创”人员的不断努力,社会财富得到了充分积累,民生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民生普惠机制也会进一步得以完善。而另一方面,在“双创”过程中,免不了影响到生态环境,处理好发展与生态间的关系,保护环境,建设美好生态家园,是持续造福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比较而言,后两项更多地需由政府来统筹完成。

##### (三)不断完善创业信息的沟通机制

一方是创业信息服务主体,一方是创业信息服务客体,一个是把接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一个是把需要的信息接收过来,经由筛选加以利用。而二者共同的作用体是创业信息,构建沟通机制就是搭建



创业信息服务主体与客体间的桥梁。具体而言,沟通机制可分作直接沟通和间接沟通两种。由于同处一个地区,构建直接沟通机制可达到更好的预期目的,如一些政府的政策扶持,可把“双创”人员集中起来,直接进行传达,又如创业经验传递,更可手把手地阐述创业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等。相应地,对于地处不同的区域,则适合建立间接沟通机制。而在多数情况下,则需要两种沟通机制齐驱并行,通过直接沟通传递他处不易获取的信息,通过间接沟通获取本地不可获取的信息,只有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 (四)三位一体,融通并进

前面已谈到,不论是创业信息服务的主体还是客体,各自的内部需要协同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组成部分的作用,才能彰显出整体效力;同样,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看,围绕创业信息的服务主体和客体间,需要做到而且应当做到合三为一,相互融通,才能使创业信息高效、快捷运转,逐步建立健全“双创”精准信息服务的长效机制。

#### 参考文献:

- [1]黄辉.精准脱贫战略下的图书馆文化扶贫精准识别[J].图书情报知识,2017(1).
- [2]李鸿雁.连片特困区高校图书馆为区域扶贫服务的原则与对策[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 [3]赵奇钊.武陵山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服务对策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5(2).
- [4]刘海涛.朝阳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信息服务对策研究[M]//“决策论坛:企业行政管理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6.
- [5]刘溢海.“双创”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基于河南省4市12县的实证分析[J].调研世界,2016(11).
- [6]记者.农民工返乡“双创”成热潮[N].国际商报,2017-12-29.
- [7]张军扩,张永伟.让“双创”成为发展新动能[N].经济日报,2016-02-25.
- [8]佚名.以“双创”促发展[EB/OL].中工网论坛(<http://bbs.worker.cn>)2016-7-11.

(责任编辑 许峻)

## Research of the Precise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for Return “Double Creation” Personnel in Poor Areas

HU Yongqi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migrant workers, wh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and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t also studi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information shortage in the “double creation”. Meanwhile, this work explores the ways to meet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double creation” personnel, so as to provide some constru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comments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We expect this work is benefit to promote the ble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of entrepreneurial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construct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cision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oor areas.

**Key words:** poor areas; “double creation” personnel; accurate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 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研究

唐天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体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首先,采用文献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推理出“健康中原城市群”是构建中原城市群体系的重要内容,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原城市群”构建的基本要素,打造健康社区应从打造社区体育开始。再次,通过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构建了包含政策保障措施、健康传播载体、特色发展项目等3个方面、6个层次、共27个目标要素构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理论框架。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健康中原;社区体育;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0

**中图分类号:**Q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50-04

## 一、前言

2017年1月5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题为《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由此,涵盖以郑州为中心、包含周边7个地区的中原城市群正式成立。“中原城市群”正式成为我国7大国家级城市群之一。

《规划》为中部地区的崛起确立了基调。促进中原城市群健康快速的发展就成为中原人民伟大的历史使命。中原建设正式以促进中原城市群和谐发展为己任,以全方位发展为方向,力争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

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最核心的基础是人的链接性,打造一体化的健康的城市群是中原城市群所覆盖的各地区人民心连心的纽带<sup>[1]</sup>。

“健康城市”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一项全球性的行动战略。该战略提出:健康城市要求实现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等3个方面的健康要求。根据健康城市的要素要求,我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众多城市都在积极地创建健康城市。

郑州毗邻开封、洛阳、许昌、焦作、新乡等地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中原城市群

的区域特点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以城市、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主要人口的聚集地的特征。由此,我们打造健康中原,必须依托中原城市群的区域特点来进行规划。而复杂的人群分布,可以将“社区”作为细胞单位来进行科学研究。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成要素,打造健康中原必须以打造健康社区为基础。健康社区的打造离不开社区体育的贡献。

本文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适用于中原城市群各大社区的“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首先要探寻出适用于中原城市群7大地区性中心城市健康社区体育构成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的评价措施具体化,努力为专家、学者制订健康社区制度提供方向,为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思路提供参考。我们相信,“健康社区”的打造必将对于健康中原城市群的建设、对于树立一体化的中原城市群文化建设、对于区域协调化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一)研究对象

中原城市群9市区按照高端、中端和基层三个层次筛选出建业森林半岛社区为高端代表,地方房地产公司建立社区为中端代表,城市拆迁周转房社

收稿日期:2017-12-03

作者简介:唐天龙(1979—),男,河南信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体育学院讲师,从事社会体育学研究。

区为基层代表,共 54 个社区(每个区域高端:中段:基层比例为 1:2:3)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走访社区办公室,问卷调查社区居民。

## (二)研究方法

### 1. 文献资料法

广泛阅读党报、中原人文刊物等,深入领会健康中原概念,学习中原城市群相关政策,领会中原城市群的划分范围等。

### 2. 问卷调查法

发放开放式问卷调查表,提出问题,如:“请您列举出你们社区体育当前做的工作中你最满意和满意若干点”等,走访选出的 9 城市 54 个社区居民,回收共 1080 份问卷调查表(保证每小区 20 份),将调查表居民所选出的答案进行归纳汇总,并列成表格。

### 3. 专家访谈法

探访国家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地方城市群社会体育办公室一线人员,进行座谈,将问卷调查筛选的要素和专家讨论,请专家给予权重划分。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原城市群”构建的基本要素

关于如何界定社区,《社会体育学》中提出以下概念:“所谓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人群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以多种社会关系进行结合,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的社会实体。”<sup>[2]</sup>就是说,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社会实体。只是社区这种实体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很分明,甚至存在包含的关系。

社区体育是构建健康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人群健康、环境健康,还是社会健康,都需要社区体育的蓬勃发展来促进,社区体育在人的健康塑造、社区人际关系和谐打造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由小城镇的体育研究引发出社区体育的概念。<sup>[3]</sup>后来,包括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针对于社区的研究,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要素也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 1995 年《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促使学者将社区体育的性质、功能进一步明确。<sup>[4]</sup>

近年来,针对社区体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菲的成效,公益性体育设施建设取得可喜成果,社区体育健身组织建设有新进展,群众健身活动空前活跃,社区体育法规制度不断完善,崇尚健身已成社会风尚

等。但还依然存在问题,如缺乏相关机构强有力的组织管理,缺乏与之配套的场地设施,缺乏大量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从事志愿服务等。<sup>[5]</sup>

顺应当前社区发展的需要,并立足于中原区域特色,积极关注国内乃至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社区体育发展现状,选择出相关发展要素,既能够为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发展提供方向,同时也为社区体育监管部门的考察提供依据。

(二)适合中原城市群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建立既要顺应发展又要立足现实

1.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保障措施

社区体育需要相关政策的扶持,需要地方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监管,每一个社区都需要固定的社区体育管理机构,机构的设置应该包括健全的制度、专职的管理人员和政府给予的优厚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资金扶持和专职人员待遇的提高。<sup>[6]</sup>

社会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社区体育部门的宣传力度,将社区居民从房间里面走出来、健康交流,需要从居民的内在需求出发,需要提高每一位居民的参与动机,利用互联网手段加强多媒体和自媒体的宣传,建立微信群、主题公众号,加强社区板画制作,鼓励实体表演等方式、方法将社区体育的优势深植人心。

地方政府加强扶持政策的出台,要求社区建设增加居民健身场所的面积,要求社区附近的学校、工厂定时为附近居民开放,要求运动场地定期派固定人员排查和维修,并设立维修专项基金等。

2.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引进与时俱进的特色项目

社区体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社区人的参与度和社区体育项目设计的科学性。研究认为项目的基础化、时代性和项目是否具有地区特点是评价项目设置优劣的标准。

社区体育基础化,即社区体育本着从健康预防、健康治疗和疾病防治的基本点出发,既关注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关注居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度。

所有项目的设置应能够利用社区的优势资源,有篮球场的社区发展篮球运动,有河流社区发展水上项目,做到因地制宜,百花齐放。项目的设计应突出区域特色,例如焦作要突出太极拳文化,洛阳突出网球文化,许昌重点发展三国文化等。所有项目的参与比例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体现。

社区体育项目设置要突出时代特点,老年人群体、青年人群体和儿童群体都要求有适合年龄发展

的项目。项目的设置应该与国际化、城市化接轨,积极创新,大胆改革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促进社区体育发展。

### 3.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需要因地制宜的健康传播载体

社区体育政策保障措施的实施和具体社区体育工作的安排均离不开载体的务实开展。因此健康传播载体在社区体育考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载体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是技术人员的配备。社会体育需要适当比

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专业管理、项目的具体指导和专业的培训工作。第二是一定数量的运动协会构建。考察运动协会有没有突出常规化、多样化和规范化的特点。第三是各类活动举办有没有体现出定期化、规范化和参与人群固定化的特点。

### 4.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框架的构建

根据调查研究分析结果,研究小组制订如图 1 所示社区体育目标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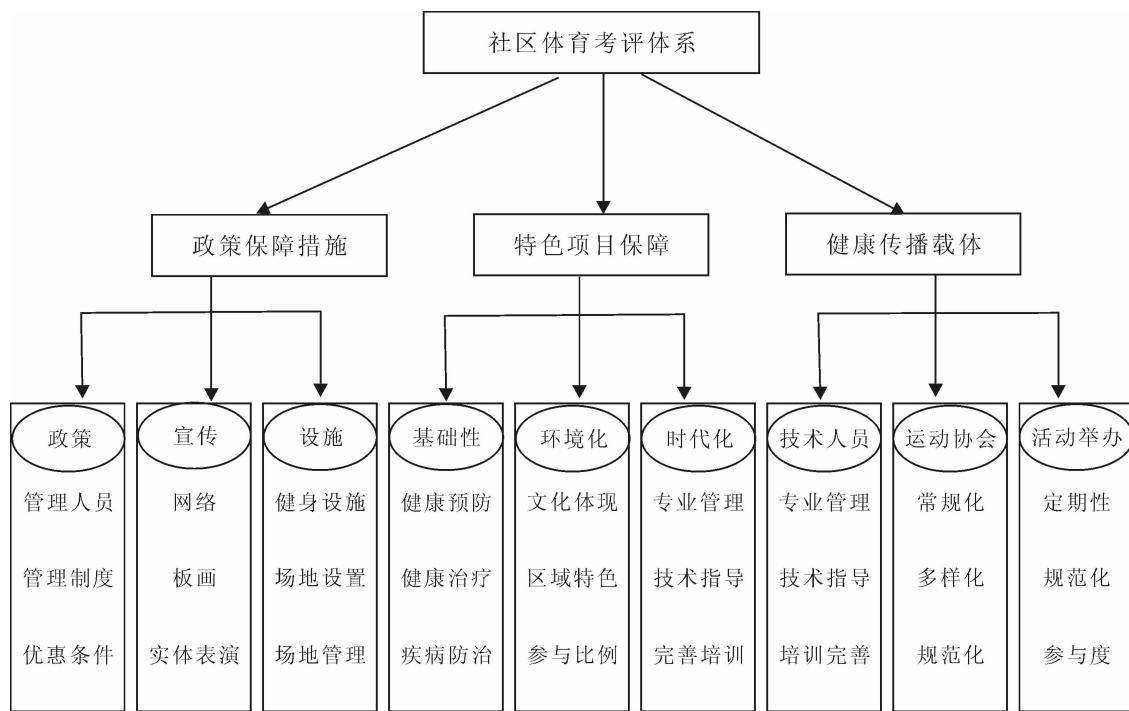


图 1 社区体育目标体系

## 四、政策建议

### (一)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构建需要与区域特色相结合

中原城市群涵盖包括郑州在内的八个城市。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区的文化都各具特色,例如郑州的商都文化、焦作的太极文化、许昌的三国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所涵盖的社区文化包罗万象。不同区域社区居民的要求也各具特色。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打造中原社区体育考评体系就应该站在党的十九大思想高度来理解。只有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构建具有包容性和指导性的考评体系,才能更好地引导社区体育建设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体育文化的需要,才能更好地解决现

实矛盾。

### (二) 社区体育体系考评体系的落实需要政府的统一领导,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配合

之所以建立一套考评体系,既是为契合中原文化发展而提出的目标性建设,也是为了通过将指标进一步量化,给社区体育工作建设提供公平考评的标准。本考评体系的 27 个要素均占有不同的权重,概括起来,这些指标需要我们体育部门、卫生部门、宣传部门、基建管理部门的紧密结合。需要调动财力、人力实现信息化、团体化、广泛化。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高度重视,统一协调。

### (三)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技术指标需要涵盖多项技术

社区体育的完善需要网络信息化的支持,只有实现社区体育和网络信息的一体化,才能将社区体

育的宣传和引导做到位,才能有效整合场地资源。

社区体育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科研单位的支持,只有将社区体育和地方体育研究所、体育类高校实现一体化,才能促使未来指标量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才能保证社区体育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社区体育的发展需要卫生健康技术的支持,社区体育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实现居民的身体和心理的完全健康。社区体育只有和附近医院,保健所等部门实现一体化运作,才能给人民群众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

## 五、结论

(一)无论从中原城市群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党中央、省委省政府方针政策落实来看,中原城市群的打造和革新需要建立健全的健康城市群体。

(二)加快社会体育的发展,促使社区体育的完善,以卫生和体育部门为主,整合其他职能部门的力量,制定健康的规划措施,是健康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国民健康素质的保证,也是构成健康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要素。

(三)根据开放式问卷采集数据和最终的专家认定结果,汇总 72 条标准,本小组最终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将影响因子概括为 3 个方面,9 大层次,共 27 个要素。

建设“健康中原”不是卫生、体育,或者其他任

何一个部门单独能实现的,它强调充分发挥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促进人类的健康。<sup>[7]</sup>

社区体育考评体系的建立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相关监督部门的考评提供了依据。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将相关考评要素加以量化,会帮助相关社区探索核心发展要素,进一步为相关部门考评工作的量化评比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 吕姿之.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M].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人学联合出版社,1998:8-9.
- [2] 黄敬亨. 社区健康促进的现状与展望[J]. 中国健康教育,1999,15(3):9-11.
- [3] 刘仁盛. “健康促进”新理念与体育健康教育关系论析[J]. 体育与科学,2004,25(2):78.
- [4] 林万顺. 浅述社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作用[J]. 青岛医学报,2004(2):154.
- [5] 杨晓岚. 分析体育运动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J]. 松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8(4):77-78.
- [6] 肖林鹏. 公共体育服务概念及其理论分析[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6):125-129.
- [7] 范冬云.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43-4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Study on Community Sports Evaluation System in Central China Urban Agglomeration

TANG Tianlo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survey and logical analysis, we can get conclusions that “Healthy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To build a healthy community, which is a basic elements of the “Healthy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we should begin with the building of community sports. Through expert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we construct a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community sports evaluation system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tains 27 target elements including 3 aspects and 6 levels.

**Key words:** Central Plains city group; healthy Central Plains; community sports; system

#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 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缺失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周艳云

(东南大学法学院,南京 211189)

**摘要:**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含有大量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世贸组织在制定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时不经过正式的规则修正程序就增加加入成员国在世贸组织的基本条约下的义务。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制定上的无规性违反 WTO 的实质公平与程序公正原则,并引发诸多贸易争端。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问题凸显。如何保障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是学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制定应遵循实质公平原则和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颁布其权威解释,增强其透明度,是解决其正当性缺失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入世议定书;超 WTO 规则;负 WTO 规则;正当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1

**中图分类号:**D9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54-05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含有大量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加入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扩大和修改了适用于已加入成员国的 WTO 多边贸易协议中的行为规则。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使中国比原来的 WTO 成员国遵守附加的更严格的行为准则。WTO 制宪条约,即建立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WTO 协议)只规定当一个国家和 WTO 成员国之间协商同意此条款方可加入 WTO。世贸组织协定禁止对其条文进行保留,只许可在其附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保留,任何对 WTO 多边条约的修正都必须遵循一整套严格程序。因此,修改 WTO 法律规定的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条款不能归入保留或修改的类别。尽管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普遍存在,但是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如何保障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是学界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制定应遵循实质公

平原则和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颁布其权威解释,增强其透明度,是解决其正当性缺失问题的有效路径。

## 二、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缺失的流弊

(一)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缺失

加入承诺构成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主体与来源,是加入条款的一部分,载于加入国的加入议定书中。世贸组织已经形成了要求其加入的成员对其加入时的承诺承担义务的惯例。因为各加入国承诺的范围和内容各不相同,所以 WTO 中各加入国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也迥异,各加入国承担的超 WTO 和负 WTO 义务也不同。许多超 WTO 规则义务超出 WTO 协议中所涵盖的义务(超 WTO 条款),包括对国内经济改革、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健康和环境法规、知识产权保护、透明度和正当程序、外交政策的承诺。<sup>[1]</sup>有些负 WTO 规则需要加入国家放弃其基于 WTO 协议

收稿日期:2017-10-23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WTO 争端解决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研究”(14AFX027)

作者简介:周艳云(1979—),女,湖南衡阳人,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学研究。

的权利(负 WTO 条款),如此规定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特殊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条款。通过运用这些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以达致减损 WTO 协议的基准而实现对加入国产品不利之目的。<sup>[2]</sup>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的加入协议的案文遵循最小变化的标准格式,超出多边贸易协定要求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类型相当有限。工作组报告中所载国家的具体承诺都以引用方式加入各项议定书中,这些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主要涉及复边贸易协定、私有化、次级中央政府和透明度。<sup>[3]</sup>然而,随着中国 2001 年加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于任何以前的加入协议,中国加入协议不是标准化文件。相反,中国加入协议的文本包含十八条含有七个附件的实质性条款部分(不包括货物和服务减让时间表)。<sup>[4]</sup>另外,中国加入议定书还涵盖了中国工作组报告中的 143 段具体承诺。<sup>[5]</sup>这些规则规定了大量的扩大、修改或偏离 WTO 协议条款的中国特定规则。<sup>[6]</sup>这些规则中的大多数是超 WTO 规则,即规定比 WTO 协议的要求更严格的义务规则。其涵盖范围广泛,从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承诺,到国家治理模式的具体承诺,甚至到直接投资待遇和其他不符合关贸总协定或服务贸易总协定清单的商业让步。<sup>[7]</sup>中国某些具体的国家特定规则是负 WTO 规则,允许成员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背离现行的世贸组织原则。这些负 WTO 规则包括特殊的贸易救济规则,允许其他成员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主体,并在歧视的基础上对中国产品实施保障措施。虽然其中一些规则有施行的截止日期,但大多数中国的特殊规定都是永久性的。<sup>①</sup>中国加入协议明显地修改了 WTO 中关于中国贸易行为方面的规则。尽管与标准大相径庭,中国加入议定书仍然是世贸组织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8]</sup>

中国入世后,世贸组织已恢复使用加入议定书的标准化文本,但继续要求加入国家承担更多的规则承诺的做法却继续下去。<sup>②</sup>现在的标准做法是在工作组报告中规定所有的国家具体规定,并通过引用将其纳入加入议定书,而不是将其列入加入议定书的主要文本。以 2012 年俄罗斯加入为例。俄罗斯加入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只包括 10 个标准段落,但通过引用纳入俄罗斯工作组报告 163 个段落中的附加承诺。俄罗斯工作组报告长度为 612 页,总共包括 1451 段。相比之下,中国工作组报告只有 176 页和 343 段。自从中国入世以来加入 WTO 的规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要求加入国履行不属于多边贸易协

定部分的规则的各种国家特定规则是 WTO 的标准做法,且成员国也不再质疑这种做法的适当性。<sup>③</sup>

由于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对加入的成员设置了与世贸组织多边协定的要求所不同的和更严格的行为规则,减损了 WTO 非歧视原则,导致对加入成员的不公正对待。在体制层面上,世贸组织从未提供其加入成员实行与创始成员不同的法律标准的原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也未阐明有关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存在的统一和明晰的理由。到目前为止,在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所引发的问题上正确认识的缺乏导致 WTO 加入规则方面的争端日益增多,WTO 条约框架下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的不明确状态致使已加入的成员与其他成员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不确定性产生。由于 WTO 加入议定书中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这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不良的后果。

## (二)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缺失的弊端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已经引起 20 多个 WTO 争端,其中大部分涉及中国。<sup>④</sup>2006 年,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中这类诉求首次提出,投诉人指控中国违反工作组报告中关于汽车零部件的国家特定规则。尽管加入议定书不是 DSU 下的“附属协议”,但专家小组在 WTO 争端解决中认可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强制性。此后,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索赔诉求在中国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承诺的基础上提出。其中包括:中国财务信息服务案,其中载有关于中国对服务部门的独立监管的具体承诺的要求;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其核心诉求是中国违反有关贸易权的加入承诺;中国补助、贷款和其他奖励措施案,其中包括中国不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承诺;中国税收案,其中包括中国对补贴和内部措施的具体承诺的要求;中国风电案和中国汽车零部件补贴案,其中包括中国对透明度的特殊承诺的要求;中国原材料案和中国稀土案,这两个是针对中国出口关税特别承诺备受瞩目的案例;中国纺织品案,是墨西哥提出的一项争议,声称中国违反了工作组报告中载入的 38 项加入承诺。

中国还提起了一些涉及加入议定书中负 WTO 规则的投诉。其中包括: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对美国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的一起案件;对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的两次投诉;对美国对中国产品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四起案件。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中国声称被诉方措施与加入议定书的国家特殊贸易救济规则不一致。除中国以外,有至少两名加入的成员卷入了有关加入议定书的 WTO 争端。一个是亚美尼亚,其关于关税和内部税收的具体加入承诺已成为乌克兰在此争议中提出索赔的法律依据。另一个是对美国提出了两个单独案件的越南,其中包括美国对越南虾的反倾销措施与越南加入议定书的反倾销条款不符。

### (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缺失的实质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问题的实质是歧视。世贸组织在对加入成员的待遇不太优惠的情况下,需要提供这样做的清晰的理由(程序公平),这样的理由需符合 WTO 的目标和原则,也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实质公平)。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不能单靠国家的同意。加入国在其加入议定书中同意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事实本身并不适用于这些规则。相反,理由必须来自理性,来源于实质和程序上的公平性,即国际社会更基本的价值观。

应该明确的是,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制定不一定是歧视性做法,并不是所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都是歧视性的。如欧盟的加入条约通常包含加入国家的国家特定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使加入国的法律完全符合欧盟法律,或提供暂时减免欧盟法律的过渡措施,以促进加入国家的一体化。<sup>[9]</sup>因此,欧盟加入条约中的国家特定规则与国际联盟的原则和目标是完全匹配的,也不会引起歧视问题。同样,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许多国家的特定规则只是在加入国家的背景下阐述了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要求加入国家将其具体的法律和惯例纳入 WTO 协议。如此的规则并非歧视性(只要符合世贸组织协定有关规定),无需进行特别的合法性关切。

问题在于超 WTO 和负 WTO 的规定,与原来的成员相比,对加入成员实行不利的待遇。<sup>[10]</sup>从程序公正的角度而言,不利的待遇必须由理性解释。然而,加入议定书很少阐述其加入 WTO 的最新规定的理由。事实上,世贸组织从来没有承认这些加入条款是世贸组织法律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另一类克减。<sup>⑤</sup>认为此种类别的最惠国待遇克减的存在是一个“不方便的真相”,而避免讨论。<sup>⑥</sup>对加入规则的矛盾的官方态度可能有助于在世贸组织中忽略对这些规则制作中心目录和索引。没有中心目录,就难

以知道目前存在多少这样的规则,以及它们的确切内容。因为这些规则中的许多都是非标准的法律语言,分散在个别加入成员的冗长的工作组报告中。缺乏明确的理由和透明度的加入规则也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准则。

在实质上的公平性方面,对加入的成员国加上附加规则可能存在两种理由。第一种理由是需要调整竞争环境。如果加入国家存在有可能会对其他成员的贸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系统性问题,而且不能得到世贸组织协定的有效管理,那么旨在抵消这种不利影响的特定规则可能成为实现世贸组织成员实质平等的机制。这个论点特别可以用来证明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关“非市场条件”的某些负 WTO 规则。该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一个连贯的世贸组织规定的理论。“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不是世贸组织协定中使用的概念。这些条款在中国加入协议中首次出现。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尽管市场在政府的重大影响下运作,但已经开发了功能性的国内市场。即使假设中国经济中的“非市场”因素可能会扭曲贸易,不能按照世贸组织协定的正常规则进行有效的管制,中国加入议定书未能提供有针对性的来处理这些因素的方式。例如,“非市场经济”条件的存在被认为是中国议定书中特别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定的理由。然而,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特别反倾销规则有效期为 15 年,这是一个任意选择的时期,而特别反补贴规定则是无限期的。最极端的情况是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虽然这个明确的歧视性机制违反了世贸组织多边保障措施的每项原则,但其合理性无法在任何一项 WTO 文件中找到理由。在负 WTO 规则中原则和一致性的缺乏背离了这些规则的真正本质。这些规则在实践中已经成为保护主义而不是调整竞争环境的手段。第二种理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由于更加严格的超 WTO 规则提高了世贸组织的基准水平,可以说这种规则推动了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论点与优惠贸易协定相似。根据世贸组织的法律,成员国可以并在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内相互给予优惠待遇,但不适用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减损的最主要的理由是,贸易协定增加了贸易自由化。许多优惠贸易协定还规定了超越 WTO 协定范围的规则。然而,加入协议中的超 WTO 规则和优惠贸易协定中的超 WTO 规则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最重要的是,优惠贸易协定中的超 WTO 规则并不是由 WTO 规定和执行的。加入优惠贸易协定是 WTO 成员的权利,而不是义务。相比之下,超



WTO 规则是在 WTO 体制中建立的。事实上,加入协议中的超 WTO 规则仅仅是减损被 WTO 授权的最惠国待遇的唯一方式,所有其他 WTO 法律项下的最惠国待遇的例外都是允许的。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不够证明这种系统规定的歧视是正当的。这是特别考虑到大多数加入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WTO 法律,这些国家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策空间,而不是受到更严格的规则约束。

### 三、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缺失问题的解决路向

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正当性缺失问题如何解决? 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 (一) 依循实质公平原则制定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

世贸组织也可以提前通过一套决定提高所有新来者的行为准则水平的超 WTO 标准。这些标准可能包括超出 WTO 规定范围的对出口关税的约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民待遇,以及对国内监管体系的透明度和正当程序的更严格要求等的超 WTO 标准。考虑到每个申请国的具体情况,可以按世贸组织的加入标准与加入国谈判新的义务。世贸组织可以选择将新加入的成员视为与原成员不同的层级,并对其加以更严格的规定,前提是这种差别待遇是以一套预先确定的标准为基础,而不是通过特设规则制定的。此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层级享有差别待遇,允许其在 WTO 法律框架内制定优惠贸易协定。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所实行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差别待遇局限于 WTO 的一个或多个目标的要求,并且是按照一定的条件给予的。这种做法将以统一规范的方式推广超 WTO 规则的制定原则,从而减少加入制度的合法性的不足。

#### (二) 遵循新旧成员权利义务统一原则制定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

加入议定书仍然可以规定具体国家的超 WTO 或负 WTO 的规则,但这些规则不能超出现有 WTO 协议的范围。如果希望采用超 WTO 或负 WTO 的规则,则必须证明其适用的原则与原成员适用的原则相一致方为有效。为了防止加入 WTO 中制定无原则性的规则,“WTO 协定”需要将加入的条款设定一些限制。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有广泛的权力规定适用于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条款,但这些术语“应基于与已经适用在其成员的其他国家的原则相一致的原则”。可以在“WTO 协定”第十二条第 1 款中增加类似的条款:“任何国家,可以

按照本协议及其和 WTO 之间的条款加入本协议。这些条款应以与适用于世贸组织已加入成员的原则相一致。”根据这一规定,声明世贸组织协议对原始成员和后加入成员“在任何方面都不区分”。<sup>[11]</sup>

#### (三) 增强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透明度

在系统层面上,如果不了解所有偏离 WTO 协议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那么,对 WTO 条约法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鉴于非歧视性原则和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两项基本原则<sup>[12]</sup>,所以世贸组织对最惠国待遇进行减损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缺失。应该敦促世贸组织秘书处主动编制超越或违反世贸组织协定条款的所有国家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在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尚未明晰国家特定规则的数量,以及它们的确切内容。虽然所有的加入协议和工作组报告是公开的,但是对于每个加入的成员而言,确定国家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规则通常为加入成员以非标准法律语言表述的具体“承诺”,并分散在冗长的工作组报告中。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由于所有具体国家的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都是“WTO 协定”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被公众所了解。以集中和系统的方式发布这些规则将有助于交易者监控其合规性。世贸组织可以采取步骤从程序上使其加入规则的制定更加透明化,以便根据程序公平提高其合法性。提高系统透明度的第一步是将所有国家的特定规则承诺进行编译和编目,并在世贸组织官方网站上出版。为完成此汇编,世贸组织秘书处应努力确定所有国家的超 WTO 或负 WTO 规则的具体承诺,并将其纳入世贸组织分析索引进行正式公布。

#### (四) 颁布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的权威解释

通过条约解释可以缓解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在无原则性制定问题上的不利后果。根据《世贸组织协定》的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有权对 WTO 规定作出解释。如果总理事会可以对加入议定书和世贸组织协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加入议定书的超 WTO 义务作为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般例外情况等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那将能有效解释国家特定规则的合法性问题。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应主要承担起解释加入协议的任务,需要对入世制度的历史和政治现实有清晰的认知。同时,需要明晰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是构成 WTO 法律最惠国待遇条款减损理由的新类别。虽然世贸组织司法机构可能没有权力宣布一个不合理的国家超 WTO 和负 WTO 规则“违宪”,但其确实有权利和

手段来解释规则,以尽量减少其破坏性影响。这种解释方式将完全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编纂的国际条约解释规则。如果世贸组织司法机构愿意采取基于上诉原则来解释国家的特定规则,将有助于补救 WTO 加入制度中的合法性危机。

#### 注释:

- ①持续时间有限的负 WTO 规则为:“非市场经济”的反倾销措施(15 年),特定产品保障机制(12 年)和特殊纺织品保障(7 年)(中国加入协议第 15 与 16 段,和中国工作组报告第 242 段)。具有内置到期日的超 WTO 规则是过渡性审查机制(10 年)(中国加入议定书第 18 段)。
- ②中国加入以来,已有 16 个国家加入 WTO。所有加入成员的加入文件可在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_e.htm) 查阅。
- ③在《秘书处说明 2000 版》中,有人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但不再出现在其后续版本中。
- ④关于涉及加入协议的世贸组织争端清单见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id=A30](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dispu_agreements_index_e.htm?id=A30)。
- ⑤见世界贸易体系基本原则及其主要例外情况的解释的网站, [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fact2\\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fact2_e.htm),并解释加入过程,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_e.htm)。
- ⑥加入会员国政府可能不希望强调其接受的加入 WTO 义务,以免事实上在国内引起政治批评。

#### 参考文献:

- [1]梁意.论新一代中外自贸协定中的“超 WTO”条款及其

强制执行[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7(6).

- [2]余敏友,刘雪红.从外部基准看中国补贴领域的超 WTO 义务[J].国际贸易,2015(2).
- [3]WTO Secretariat. Technical Note on Accession Process (WT/ACC/7/Rev.2) (Nov. 1, 2000):73-74.
- [4]韩秀丽.论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以《中国入世议定书》为中心[J].环球法律评论,2014(2).
- [5]刘瑛.论 WTO 争端解决中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解释[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 [6]Julia Ya Qin. “WTO - Plus” 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Legal System—An Appraisal of the China Accession Protocol[J]. J. WORLD TRADE,2003,37(3):483.
- [7]胡加祥.《中国入世议定书》法律性质之分析[J].当代法学,2014(2).
- [8]王琢.入世议定书差异性条款的性质[J].学术论坛,2015(7).
- [9]谷川.欧盟法的一体化之维:基础、协调及秩序运作[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 [10]任清.《中国加入议定书》研究的两个十年:兼论加入议定书的强制执行性等问题[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4(2).
- [11]范兰宁.论“超 WTO 义务”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以“美欧墨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为样本[J].太平洋学报,2012(6).
- [12]胡加祥,彭德雷. WTO 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法律原则与中国实践[J].时代法学,2012(1).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WTO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and its S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Rules of “WTO - plus” Rules and “WTO - minus”

Rules in the China Accession Protocol

ZHOU Yanyun

(School of Law,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accession protocol of WTO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such as “WTO - plus” rules and “WTO - minus” rules. The unprincipled and undisciplined nature in shaping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has caused many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to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fairness, and led to numerous trade disputes.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face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How to resolve the crisis and give the legitimacy of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 and solved by the WTO and the academician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determined difference standards,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unanimity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embers, publish their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nhance their transparency. They are the effective ways to resolve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national specific rules.

**Key words:** accession protocol of WTO; “WTO - plus” rules; “WTO - minus” rules; Legality

# 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转变

闫 敏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

**摘要:**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整个社会中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因为公民通过“上访”这种活动,社会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过度依赖信访制度来调解社会的纠纷,并因此出现了“信访不信法”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人们所形成的一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这种思维会形成一种定势进而对我们公民的法治思维产生一定的冲击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前者具有实质理性的特征因而更接近人治思维,后者具有形式理性特征。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部署,相应地公民法治思维开始得到重视。因而如何让部分群众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转变成具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公民,是依法治国的重点也是难点。

**关键词:**信访制度;信访不信法;法治思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2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59-06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sup>①</sup>信访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我们党根据群众路线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浓浓的中国特色,因为从革命时期开始我们党就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这一传统从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因而信访制度是我们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制度见证,更是历史见证。我国公民也将信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维权制度。信访制度的建立立足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论,该理论的重要来源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官僚制的批判及其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对中国王朝更迭历史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的政治制度是以人民群众的参与为基础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制度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因此,信访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sup>[1]</sup>

## 一、信访制度的发展

我国信访制度的正式起点要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人民工作的决定》说起,它奠定了信访制度的基础。在此之后我国的信访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其中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使信访制度更加规范化与制度化。进入21世纪之后,国务院又在原来《信访条例》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于2005年推行新的《信访条例》。我国的信访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应星教授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1年6月—1979年1月)是大众动员型信访阶段;第二阶段(1979年1月—1982年2月)是拨乱反正型信访阶段;第三阶段(1982年2月至今)是安定团结型信访阶段。<sup>[2]</sup>应星教授对信访制度三个阶段的划分体现了信访制度功能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该制度建立的初期主要是起到动员群众的政治功能,通过人民群众对于党员干部的监督检举与揭发,从而起到净化党员干部队伍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功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使信访制度

收稿日期:2017-11-18

作者简介:闫敏(1991—),女,山东临沂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出现某种程度的失效,政府控制信访活动成为了主要的任务。唐皇凤将信访制度功能变化总结为:信访制度建立之初是对官僚制度的监督、对民意的及时掌握以及缓和政治冲突,主要是起到政治缓冲的作用,而到了后期信访制度开始逐渐成为政治控制功能中的主要制度要素之一。<sup>[3]</sup>另外,我国学者肖萍在对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研究中提出了信访制度的“实然功能”与“应然功能”的划分,她认为信访制度的“实然功能”包括沟通功能、监督功能、调节功能和救济功能,并且认为前两者才是信访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功能,而后两者不应该是信访这种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功能,后两者超出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而“应然功能”是指信访制度应该具有监督功能,沟通功能和安全阀功能。<sup>[4]</sup>于建嵘博士也曾谈到:“信访制度本质应当是收集和传达老百姓民意的一种制度设计,相当于一个秘书的角色。但现在却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而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sup>②</sup>

通过对以上学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的信访制度从最开始的作为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手段到逐步发展成为群众化解纠纷的惯用方式。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曾经几次出现“信访洪峰”现象。基本上每年要进行上访的人数呈现递增的趋势,并且上访者的身份越来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也即全社会各个阶层参与上访的群体越来越多。伴随着上访人数量增大的后果是,上访越来越非制度化,如出现了集体上访、闹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在上访过程中上访者与政府机构的冲突增多,对抗性增强。通过以上过程的演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多群众将信访方式作为维护权益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sup>[1]</sup>。渐渐地“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是很多群众选择解决纠纷的出发点,更是落脚点,而司法救济途径排在其后,这显然与我国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相违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形式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并且通过了《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 二、“信访不信法”现象及其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原因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伴随着信访制度功能变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毕竟最开始的信访大部分是从其政治功能的角度来动员社会大众与党中央的领导密切配合,政治职能为当时的信访制度存在

提供了一个政治根基。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信访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监督与联系功能发展为救济和调节功能。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在此阶段更加尖锐,并且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因而信访的政治功能开始弱化,其救济和调节功能逐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强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一个逐步积累并强化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功能转型到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一时期,信访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途径。不可否认信访制度在此期间发挥了它重要的调节纠纷的功能,尽管该功能不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但是它确实起到了一定化解社会纠纷的重要功能。作为一种社会救济途径,信访具有高效与快捷的特点,一旦通过信访方式反映的情况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群众的很多纠纷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因而信访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被很多民众看成是非常重要的救济制度,这种“信访”救济式思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社会所普遍共有的思维状态。笔者认为从改革开放到我国倡导建立法治国家这一期间内,是“信访”救济式思维高度发展的时期,因为相比较其他的权利或是纠纷解决途径来说,信访具有灵活性、广泛性和及时性的特点。<sup>[5]</sup>而其他权利救济途径如司法救济在此阶段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信访救济这种方式在此阶段发展迅猛,从本质上来说这与我国法治建设起步晚有很大的关系,在法治发展没有得到全社会足够重视的前提之下,我们对通过司法途径救济自身权利的方式是生疏与模糊的。

对此童知伟教授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主体制度未能满足社会正义的需求。因而处于次要地位的政治制度被经常用来部分地取代主体政治制度,甚至超越主体政治制度,成为推进社会正义的“惯常体制”。<sup>[6]</sup>信访制度在政治制度中应该处于补充的地位,但是因主体制度如人大制度、司法制度不能提供并充分发挥其救济功能,让处于补充功能的信访制度反倒成为了解决社会纠纷的主要途径,这样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出现了错位现象。这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信访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

从我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信访制度成为社会主要制度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从古代开始就是“人治”社会,群众一般对官员抱有敬重之情,把很多的纠纷的解决寄托在这些官员身上。从老百姓对官员的称呼“父母官”就能体现出,普通民众对于依靠

“清官”解决纠纷抱有期望。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通过个人修养的境界进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此从社会治理能力来看，根据儒家思想只要个人的德行和修养到达一定境界，那么社会的治理肯定是会得到认可的。在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通过德治的方式而不是靠法治来治理社会，而德治要依靠官员的自身素质和品德修养，因而这种德治之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来讲是人治的体现。而信访制度本身也是依靠相关政府官员的批示或是得到相关机构的重视，从而纠纷得以集中处理。可以说，信访就是传统的德治思想的变形体现。<sup>[7]</sup>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sup>[8]</sup>

### 三、“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对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部分群众解决纠纷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信访，总是觉得信访才是主要的维权手段。于是“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愈演愈烈。逐渐地这种个别信访行为开始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信访行动，因为个人的行动会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就像“破窗效应”带来的结果，只要有人开始破坏窗户，之后就会有很多人破坏这扇已被破坏的窗子。毕竟信访这种行为方式虽然有《信访条例》对其进行规制，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并遵守它。因为通过信访方式是完全不同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司法途径强调的是一种规范性即对于不同的主体普遍适用并且具有可预期性。而通过信访方式解决纠纷却更多地体现的是处理纠纷结果的差异性与特别性。正是这种处理结果的差异性进一步激发了上访者的上访热情，因此久而久之，部分社会群众会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通过信访的方式处理纠纷会有意外收获。尤其是很多人开始尝试用极端的方式信访，这样就可以得到相关部门及其负责人的注意，所谓的“把事情闹大”进而就能使很多问题得到高效甚至是高质量的解决。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很多群众开始尝试“闹访”“缠讼”、集体上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等方式将自己的纠纷闹大，不仅如此，很多的上访者为了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还会通过自杀、有组织地堵塞交通要道、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等方式进行所谓的上访。可以说通过以上极端方式进行上访的群众，就是在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影响之下，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政府的底线，这也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底线。因而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与上访者之间矛盾重重，政府各种“截访”与阻止

上访者上访的行为时有发生。很多时候群众是去找政府帮忙解决纠纷的，但是在找政府的过程中又与政府产生了种种矛盾，就像“雪球”越滚越大。当政府在迫于社会各界压力之下与上访者进行妥协之后，结果便是上访者告诉后来的闹访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在这种心态影响之下所形成的思维便是“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在这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的影响之下，更多的上访者选择将事情闹大，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反正政府会基于社会舆论压力或者是上级部门“0上访指标”的考核，不会忽视闹访者的。一边是公民非法治方式的“信访”波涛汹涌，一边是政府部门非法治方式的“维稳”，在两种非法治方式的相互强化之下，社会矛盾化解陷入“救助—息访—再访”“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怪圈中。<sup>[9]</sup>

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而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该制度反倒是成了社会矛盾的制造源头。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与我们群众之中存在的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很多的维权群众会变得更加非理性化，本身这种思维就不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更甚至有人会抱有“机会主义违法”的侥幸心理来通过信访的方式进行维权。在“信访不信法”式思维的引导下，人们更加喜欢以“快餐”式的心理来解决自身的矛盾，进而相互比较的是通过更加极端的方式来使自己的问题得到相关部门的解决。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让整个社会的上访者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接近违法的边缘。而这给我们的政府的维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政府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息访。为了息访地方政府专门拿出必要的经费来处理相关上访问题，并且为了完成上级政府考核进行各种“截访”工作。这样政府和不停的上访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拉锯战，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群众所具有的“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对此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更加加剧了部分群众对法律的漠视，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摆设。当他们遇到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不再是寄托于通过程序方式处理问题，而是希望通过“特事特办”也就是法律之外寻找出路，通过找领导找关系的方式或是通过将问题“扩大化”的方式将其问题得到解决。进而整个社会都会在这种“信访不信法”式的思维引导之下处理他们自己的纠纷问题，

这会形成一种破坏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的不良风气,影响全社会的法治发展水平与法治发展进度,同时也加大了我们政府部门的负担,不只是业务负担更是财政负担,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全社会的人民群众。

#### 四、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转变

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的发展战略就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立足于“法治中国”的语境,我们要从多个维度建设法治中国。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话语,在整个社会治理系统中,法治应该有充分的话语权;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中,法律有了支配思维的核心话语权,我们才有逐步接近法治理想的可能。而在思维方式上我们长期处于强势的政治话语和道德话语的压制之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压制着公民和社会组织权利的有效发挥,人们很难享受法治所带来的自由与自主。<sup>[10]</sup>而当代中国的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种问题表现在: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sup>[11]</sup>而这四种思维正是“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法治思维是对这四种思维的纠正与改进。因此我们要努力实现从“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到公民法治思维的转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根治我们在“人治”影响之下形成的“信访不信法”式思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法治思维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政府的维度,一般来说很多学者对于法治思维的研究是专门从这个维度进行的。而另一个维度是公民。<sup>[9]</sup>这是因为如果说立法、执法、司法大多是通过对公权力的运用和对公权力的限制来实现法治的,那么用法和守法则是通过社会主体运用法律规则来实现的。正是因此法治思维不单是公权力主体的思维,更应该是社会主体即公民的思维。<sup>[12]</sup>而空谈这种公民的法治思维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借助相关的措施才能逐步建立起公民的法治思维。

(一)加强法治宣传,促使个人掌握法律知识,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思维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间接经验、语言和符号的学习,因此法律知识的学习对法治思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下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主要还是个人,只有个人通过逐步学习法律的相关知

识,形成自身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才能让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当然让每个人都像法律职业者那样系统地掌握法律知识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法治思维能够形成。毕竟每个个体不一定要掌握所有的法律知识,而只要掌握与自身发展领域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即可。其实法治思维最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对待问题的解决方式,不一定就能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它却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甚至可以说,就算一个人对相关具体的法律规定知之甚少,但是只要当他遇到矛盾、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法律,通过法律方式、法律途径去解决纠纷,那么说明他就已经具备法治思维了。<sup>[13]</sup>而法律知识的学习除了个人的学习之外,就是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各界对法律的宣传。回顾我国的法治宣传可以看出,我们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但是还是离我们想要形成的法治思维有一定的距离。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法治宣传进行得更加专业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行业或者群体的不同而强化在特定领域的法治宣传。这样做的好处是与相关领域的群众密切联系,因为这些法律知识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更有动力学习该领域的法律知识。毕竟法治思维是一种“抽象—具体—再抽象”的思考过程。<sup>[14]</sup>但是法治思维运行的前提是人们脑中的知识库,必须具有相关的法律知识作为基础。因此,针对各个领域加强法治宣传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建立法治思维的基础,从而在接下来的法治思维形成中进一步加强法律信仰意识的培育。

(二)改革现有信访制度,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

从信访制度的产生到发展来看,信访制度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它的产生与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功能转变就否认该制度的存在价值。从目前学界对于信访制度的研究看,主要有三种对待信访制度的方案:一是“取消信访论”,二是“强化信访论”,三是“整合信访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大部分学者是比较赞同“整合信访论”的。在保留原有信访制度的前提下,针对信访制度中不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地方进行改革。从目前信访制度对司法终局性的挑战和信访功能错位的现实来看,当务之急就是要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要提高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将原本应由司法行使的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之中分离出来归还给司法机关,降低群众倚仗信访方式进行权利救济的期待值。因此要对目前的信访制

度进行合理的分流,将一般的涉诉案件优先纳入司法程序,对于重大的信访救济要归入以人大制度为核心的权威救济机制。<sup>[15]</sup>在改革信访制度之前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要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防止其越权干涉司法领域的纠纷。这是因为信访制度在我国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行政权占据主导的国家,行政权管理了太多的事项。<sup>[16]</sup>因此要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将其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建立相关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的权威。明确划清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权利救济上的界限,防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随意干涉,确保司法权对权利救济的终极性。

同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应弱化通过上访率来衡量下级政府部门的业绩,不按信访量来给地方排名。<sup>[17]</sup>因为这种来自上级的信访压力会加剧政府部门与上访群众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加重政府的负担。本身行政权力就具有主动性,如果再强调通过上访率来考核政府的业绩,那么会使行政权力更加主动地干涉本身属于司法领域的权利救济事项。因此,要想使信访制度沿着制度化、程序化的道路发展,必须要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进行必要的界限划分,并且还要对信访制度进行改革。

### (三)提高司法权威,形成完善的社会法律救济制度

部分群众的“信访不信法”式思维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我们的司法权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不高,明显要逊色于行政权在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使得人们一遇到问题就想办法“托关系”“找熟人”解决自己的纠纷,而不去求助于司法机关,更不信任司法机关。久而久之人们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之下,习惯于“随大流”依靠政府解决纠纷问题,这样司法的权威被一步步削弱。从本质上讲“信访不信法”式思维就体现了行政权威大于司法权威,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利益纠纷的时候。但是从行政权所具有的主动性来看,它不适合过多地参与个体的权利救济,同时行政权也不具有终局性。因此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的实行信访与诉讼分离制度。对于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事项要从信访制度中分离出去,将这项事项交给司法机关来处理。<sup>[18]</sup>对于应当由司法机关管辖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尊重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防止个别领导干部干涉司法判决,应保障司法的权威。要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事项上严格划分自身的权限范围,防止

越权干预司法机关对纠纷问题的处理决定。行政机关要带头保障司法权依法行使,对于不属于自身管辖范围的事项主动移交司法机关,对于司法机关已经处理的纠纷,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理。总之,行政机关要在全社会起到带头保障司法权威的作用。

从人们过多地依赖信访制度进行维权这种现象来看,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是不够完善和健全的。因此,要加快建立全面的维权保障体系,使整个社会的维权保障体系更加全面化与多元化,这样也会减轻相关部门的压力,也能提高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避免案件长时间积压,毕竟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当然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体系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该是相互交叉与混乱的,而应该是相互配合与分工明确的。同时,要立足国情民情,通过立法的修定完善,适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降低行政诉讼门槛,规范简化行政诉讼程序,让人们相信法律,信任法院,打得起官司,打得赢官司,进而从制度上促进矛盾纠纷解决向法律救济渠道分流。<sup>[19]</sup>

“信访不信法”式思维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素也有其现实因素更有制度因素,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让其向公民法治思维模式转变绝非易事。尽管这看起来很难,但是不能成为阻挡我们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借口,因此我们要勇于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伴随着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的信访制度改革也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唯有不断地革新才能使我国的信访制度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才能充分发挥其本应具有的功能。

#### 注释:

- ①国务院:《信访条例》(2005),第一章第二条。
- ②转引自肖萍:《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政法论丛》,2006年第6期。

#### 参考文献:

- [1]王彦平.回归法治化轨道——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面临困境及化解途径[J].社会主义研究,2015(1).
- [2]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J].法学研究,2004(3).
- [3]唐皇凤.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 [4]肖萍.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J].政法论丛,2006(6).
- [5]李栋.信访制度改革与统一《信访法》的制定[J].法学,2014(12).

- [6]童知伟. 信访体制在中国宪法框架中的合理定位[J]. 现代法学,2011(1).
- [7]倪宇洁. 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审视[J]. 中国行政管理,2010(11).
- [8]温家宝总理同大学生谈法治[J]. 法制资讯,2009(12).
- [9]王聪.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价值、内涵及养成[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6).
- [10]陈金钊.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J]. 法学评论(双月刊),2014(6).
- [11]于浩.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J]. 北方法学,2014(3).
- [12]谢晖.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9)
- [13]杨建军. 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J]. 法学论坛,2013(5).
- [14]韩春晖. 论法治思维[J]. 行政法学研究,2013(3).
- [15]孙大雄. 信访制度功能的扭曲与理性回归[J]. 法商研究,2011(4).
- [16]陈朝兵.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分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13(4).
- [17]于建嵘. 信访制度改革三策[J]. 南风窗,2004(23).
- [18]蔡洪增,朱乐山. 以法治思维推进和创新信访工作的探索与思考[J]. 法制与经济,2015(Z1).
- [19]陈红英. “法治中国”语境下社会法治精神的重构[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 Changing from “Trusting Petition not Law” to Citizens’ Legal Thinking

YAN Min

(Department of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system of our country, petition system has played a role of “safety valve” in the whole society. Through the “petitions”, some social conflicts can be resolved. However,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ople rely too much on the petition system to mediate the social disputes, and thus the phenomenon of “Trusting Petition not Law” is emerging. What is reflected behind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people form a kind of “Trusting Petition not Law” style of thinking, and this kind of thinking will form a kind of trend and then exert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law thinking of our citizens.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se two kinds of thinking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e former with the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s closer to the thinking of rule by people and the latter has the form of rational feature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ith the deployment of the strategy of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he corresponding thinking of citizens on the rule of law begins to be emphasized. Therefore, how to change the popular thinking from the “Trusting Petition not Law” to the rule of law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Key words:** letters and visits system; “Trusting Petition not Law”; rule of law thinking



# 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与思考

仲 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不尽人意,已成为制约城市管理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考察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入手,发现城中村居民在收入、社区安全、生活环境、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而城乡分割的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相对滞后的管理体制,分别是引起城中村居民生存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因此,应从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城中村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转变居民思想观念、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就业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才可能实现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3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65-05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广泛分布在我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成为城市海洋当中的一座座“孤岛”。由于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等现象,对城中村居民的生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带来了诸如生存环境恶劣、安全隐患突出、精神文化生活缺失、收入低下等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居民恶劣的生存状况与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水平相差甚远,会激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因此,加快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不仅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不断促进城市管理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积极探索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办法。纵观现有研究情况,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开展了研究。一是从改造前的角度。栗志强<sup>[1]</sup>对郑州市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在社会保障、社区医疗服务、社区的居住环境和治安状况等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娄松柏与李苏<sup>[2]</sup>基于宁夏银川市的调查数据,对城中村居民的收支状况、居住环境、子女教育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中村小区的生活环境、治安、消防、社会保障等问题突出,从对旧城的空间格局重新部署、完善基础设施、把握长远利益的平衡点等方面提出了改善银川市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建议。郭伟<sup>[3]</sup>采取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平顶山市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教育、医疗、文娱、社保、住房、就业等多方面存在不足,但作者只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与模式,并没有就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提出具体的措施和建议。二是从改造后的角度。如王宁等<sup>[4]</sup>、刘丽华等<sup>[5]</sup>、张欣<sup>[6]</sup>、王宁与任进军<sup>[7]</sup>、刘潇<sup>[8]</sup>等学者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主要从收支变化、精神生活变化、邻里关系变化、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等方面,分别对兰州、郑州、天津等城市里部分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与改造前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普遍认为改造后居民的生存状况较改造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学者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纷纷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政策法规、实行免费的职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重建邻里关系等角度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居

收稿日期:2018-01-02

作者简介:仲岩(1964—),男,辽宁大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民生存状况的措施。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时间跨越较久,很难为解决城中村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有必要对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继续开展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多个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着重探究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旨在为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与参考。

### 一、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调查

尽管城中村居民所处的区域不同,其生存状况各异,但普遍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城中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居民收入相对较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中村原住村民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耕地,由于原住村民的文化、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出租房屋获得租金就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城中村房屋质量和居住环境普遍较差,很难吸引较高收入者来租住,主要租房人员是外来务工者和一些低收入者,因而城中村房屋出租的租金不可能太高,导致原住村民的收入并不理想。城中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已经成为改善与提高其生活水平的障碍。<sup>[2]</sup>

#### (二)社区安全隐患突出

城中村出租屋的租金较低,吸引了数倍于本村居民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除本村人员以外,外来人口既有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有学生、“三无”人员,甚至还有负案在逃的犯罪分子。<sup>[9]</sup>由于城中村人口构成复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们往往会因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利益冲突产生纠葛,使得城中村矛盾四起、冲突不断。同时,由于管理制度滞后缺失,城中村时常有偷盗、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赌博、吸毒、制假售假等社会不良现象和违法犯罪事件发生,造成当地治安隐患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威胁到城中村居民生存的安全。

#### (三)社区生活环境恶劣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城中村大部分的房屋是随着村庄原有的自然地理和地势结构而建,长期以来,资金支持不足,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滞后,村中道路狭窄曲折不规则,电力电讯线路架设、煤气及热力管道铺设不规范,排污设施老化不足。城中村规划无序的房屋建造以及随处可见的乱搭乱建,导致城中村在卫生、出行以及采光、通风等方面的条件十分不理想。同时,村民为了自身利益而过度地挤占与开发

土地,造成城中村公共绿地和健身娱乐等设施极度缺失,城中村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现象,社区生活环境相对恶劣。

#### (四)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缺失

当前,居住在城中村的人们大多数是失去土地后的原村民和外来流动人口,文化水平较低,小农意识较强,思想观念落后,城中村居民的生活观念、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还远没有跟上城市化所要求的步伐。由于城中村居民文化素质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在劳动工作之余,除了看电视,就是聊天、打麻将、打牌、下棋,很少参与其他的业余活动,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活动显得单调贫乏。同时,政府对城中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缺乏指导、监督和引导,导致城中村文化体制建设落后,投入资金严重不足,文化娱乐设施极度匮乏,极大制约了城中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提高。城中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处于较低的层次,带来了诸如赌博、吸毒、暴力、封建迷信活动等垃圾文化的盛行,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给城中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负面影响。

#### (五)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并行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由于城中村保留着村级建制以及农村户口,绝大多数城中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被纳入市区管辖范围,仍然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sup>[10]</sup>在这种城乡差别过大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城中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使得广大村民始终游离于城市的保障网之外。城中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失地村民在养老保险、劳动保护、失业救济、医疗救治等基本保障权益上遭受损失,已影响到城中村居民的公平生存权利,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 二、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分析

城中村居民生活质量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

#### (一)历史原因

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与制度性因素密切相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 1. 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下,农民受身份性质的限制,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

遇,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救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原住民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耕地,无法再通过农业劳动获得收入。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失地村民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使得城中村原住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天然地划分了所谓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特定身份,使得农民无法融入到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民进城务工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城就业,但是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只能在城市从事一些低级的体力劳动,由于收入水平较低,他们主要租住在房屋租金相对低廉的城中村,导致城中村人满为患。同时,城中村缺乏科学的管理,会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恶化。

## 2. 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农民依法享有对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对土地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速度,况且土地的审批权在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委会,所以农民能轻松地获得土地的新的使用权。在城市化进程大潮的冲击下,农民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在技术、经验、能力、知识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当城市化进程使村民逐渐失去耕地时,出租房屋便成为维系失地村民原有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受出租屋经济利益的诱导,很多城中村出现了违章建设、乱搭乱盖现象,<sup>[11]</sup>造成城中村混乱无序,居住区的出行、卫生、通风、采光等受到严重影响,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恶化。

### (二) 现实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致使城中村居民被排挤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城中村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相对滞后的管理体制是城中村居民生活质量低的现实原因。

#### 1. 管理体制滞后,管理不善

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取得城市发展需要的土地后,基本上将城中村事务“一揽子”留给村委会自行解决,村委会既要负担本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又要维护本村的社会福利、治安等社会管理。<sup>[9]</sup>在传统村落组织结构及社会网络关系影响下,村委会的管理仅限于对本村人的管理,对

数倍于本村人口的外来人口既无意管理也无力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长效管理机制,对城中村的整治工作流于突击应付,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有关管理工作缺乏认识和理解,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另外,城中村基础设施落后,黄赌毒泛滥、脏乱差蔓延的现象便难以避免。

#### 2.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就业,很多人从事位于城区的商业服务业,如从事餐饮、娱乐等各种服务业,从事批发、零售等各种商业。由于城中村的区位相对优越,房屋出租手续便捷、价格低廉,且人口密集,为外来人员进城从事服务业提供了方便,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租住,但城中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严重不足,庞大的暂住人口无疑增加了城中村的负担,给城中村的供水、供电、消防、治安等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最终成为导致居民生存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sup>[11]</sup>

### 三、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政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加快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应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 (一) 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城中村改造

虽然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是引起城中村居民生存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城中村的生存环境是直接关系到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现实物质基础,只有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才能实现其居民生存条件的改善。实施城中村改造最终要体现在以人为主体的改造上,以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切实把改善居民生存条件纳入到城中村改造规划之中,必须根据各个城中村不同的条件和特点,制定有利于居民居住的长期发展计划,尽可能地考虑把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有机地安排于一体或采取就近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生活便利的需要。同时,由于城中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发展阶段的差异,城中村呈现出潜在型、发展型与成熟型三种情况,<sup>[9]</sup>城中村的类型不一,在制定改造政策时切忌“一刀切”,对城中村改造工作应进行分类指导,才能在城中村改造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对于正在改造的村庄,在对城中村进行物质性清理改建的同时,可以适当建造一些廉租房,来替代原有城中村的功能,要关注村民的医疗、健身、休闲、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需求,尽力为村民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对于一些仍在发展的城中村,应加大对居民居住环

境的综合治理,以提高居民的生存条件。总之,城中村的改造是为了让居民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改造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不能恶化居民的生存状况。

## (二) 引导城中村居民转变思想观念

城中村人口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原住村民,也包括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历史原因,与现代市民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安于现状的意识严重,导致城中村居民的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甚至部分原住村民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完全依靠生活补助和出租房屋为生,养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这种人员素质不高、社会发育度较低的情况,往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大多数的城中村陷入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因此,要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就必须转变城中村居民的思想观念。一是要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sup>[12]</sup> 城中村是居民的集居地,也是他们修身养性之处,健康的社区文化能够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振奋人的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引导城中村居民树立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打造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政府应该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积极弘扬真善美,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社会不良风气,通过惩恶扬善,使丑恶现象无立身之地,让优良的文化在城中村扎根盛行。二是要使城中村居民树立求变求发展的思想观念。针对城中村居民思想落后、固步自封、发展意识淡薄的特点,<sup>[13]</sup> 政府及社会各界应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形式,逐步改变城中村居民保守、安于现状、缺乏开阔视野的小农意识,尤其是要改变原住村民长久以来形成的食租食利、坐享其成的思想,打破长期落后思想的束缚,不断培养他们的风险意识与竞争意识,树立起城中村居民自立自强、求变求发展的精神,要让他们在精神上实现脱贫。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

## (三)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关乎城中村村民的生存质量,我国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使城中村村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成为城中村居民生存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改变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有城乡差别的社会保障制系,使城中村原住村民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针对居住在城中村的农民工有流动性的特点,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关系的自由转移,逐渐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

在工伤、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等方面能够得到真正的保护。另外,应建立合理的城中村失地村民的征地补偿机制,制定征地补偿标准要因地制宜,使被征地村民的生活来源得到应有的保证,同时对征地补偿资金要加强管理,可将该部分资金实行多元化投资,实现资产增值,以确保失地村民的社会保障有充足的资金支持。<sup>[14]</sup>

## (四) 完善就业机制

就业是城中村失地村民和外来人员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要提高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就必须完善就业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城中村居民在就业能力和就业保障等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完善城中村居民的就业机制,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应加强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劳动就业部门要积极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电大及社会办学等的作用,对城中村居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就业的需要。其次,要努力为城中村居民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城中村居民自主创业,对自主创业的城中村居民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不断调动城中村居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最后,要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大力推进街道、社区、村等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以基层服务平台为依托,建立失业居民登记台账,不断开发就业岗位,对失业人员实施就业帮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化职业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服务行为,为用人单位和城中村求职人员提供有效的沟通渠道,增加其就业机会。此外,还应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网络便捷的优势,及时掌握用工需求,为城中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sup>[11]</sup>

## 四、结语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中村居民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改变,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表面上看,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集中反映了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与管理不善之间的矛盾,但从本质上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才是引起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恶化的深层次的原因。因此,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各地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从制度与政策层面上给予支持,必须对我国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变革,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确保城中村失地村民的合法利益。与此同时,还应尽快取消城乡差别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中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从而破除制约

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体制性障碍,实现对我国城中村问题的根治。当然,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改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依靠政府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这就要求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从各个方面确保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另外,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城中村在中国各地存在,城中村问题就不会消失,各地应理性看待城中村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用一以贯之的态度和劲头不断地改善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最后,城中村村民的生存状况具有地区特性,各地应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切勿照抄照搬某些地区成功的模式,应结合当地的情况,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计划和措施,城中村居民生存状况才能得到改善。

#### 参考文献:

[1] 栗志强. 中部地区城中村居民生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郑州市为例[J]. 社会工作,2007(7):43-45.  
[2] 娄松柏,李苏.“城中村”居民生存境况的调查研究:基于宁夏银川市的调查数据[J]. 科技广场,2015(10):250-256.  
[3] 郭伟.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现状及改造思路调查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5(12):8-9.  
[4] 王宁,王录仓,李纯斌.“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生活状况调

查研究: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2018,15(4):109-114.  
[5] 刘丽华,杨芳绒,卫红. 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研究[J]. 江西农业学报,2010(3):209-212.  
[6] 张欣. 天津市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研究:以东丽区万新街小王庄为例[J]. 才智,2011(30):305-306.  
[7] 王宁,任进军. 兰州市安宁区城中村改造后居民生活质量调查[J]. 甘肃高师学报,2012,17(6):122-124.  
[8] 刘潇. 对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再思考:基于居民生活状况的角度[J]. 企业研究,2013(18):185-186.  
[9] 马星.“城中村”问题的形成与更新改造[J]. 特区经济,2007(1):150-152.  
[10] 孟祥林.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J].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94-98.  
[11] 田静.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1.  
[12] 龚城华.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D]. 浙江宁波:宁波大学,2013.  
[13] 刘梦珂. 郑州市“城中村”问题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14] 江竞.“城中村”问题及对策[J]. 城乡建设,2007(10):70-71.

(责任编辑 姚虹)

##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ought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from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ZHONG Yan

(College of Economy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is unsatisfactor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we found that the residents of “village in the city” in terms of income, community security, living environment, cultural life and social security is obviously inadequate. Secondly, the divisi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l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are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that cause the existence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in the city”, transform the concept of residents,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residents of “village in the city”.

**Key words:** the residents of “village in the city”; living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 摄影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樊钢亮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遗产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摄影不像其他图像艺术形式诞生得那么早,它的诞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但是,在这看似不长的发展过程中,同样有其学科内涵的积淀——摄影史。在探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摄影史的研究方法离不开艺术史的参与。摄影史在艺术史研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学科话语权是不是得到了重视,特别是摄影史发展到今天,存在诸多的问题,接下来将何去何从,亦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关键词:**摄影史;艺术史;研究方法;话语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4

**中图分类号:**J4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70-04

## 一、摄影的发展

对摄影技术的探索有着漫长的过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墨子便发现:当光线穿过小孔,会把景物形象上下倒转,并投影到屏障之上。元初,我国古代科学家赵友钦著《革象新书》,其中的《小礪光景》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发现虽早,但我国未能成为摄影术诞生的国度。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据其原理而制作的“暗箱”被作为绘画辅助工具而得到广泛应用。世界第一张照片《窗外的风景》拍摄于1826年的法国,在摄影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的“达盖尔铜板摄影术”标志着摄影术的真正诞生,也为达盖尔赢得了“摄影之父”的美誉。随后,经过不断的改良,到柯达公司研制的胶片出现后,摄影从“神坛”走进了大众世界。

如果说德国古登堡的印刷术开启了印刷时代,那么摄影术的出现可以说是开辟了图像时代。摄影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传播的媒介的摄影通过对现场影像的再现使大规模的传播成为可能,这改变了人类的传播史。

摄影教育从摄影术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展开。最早的摄影教育诞生在欧洲的法国,在发展的过程

中产生了沙龙派、学院派以及自由学派。最初的摄影教育还不能称为学科,只是在法国的艾克斯-马赛大学、亚眠大学、波尔多大学、里尔大学、巴黎大学开设有与摄影相关的理论选修课程,随着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在相关选修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摄影学科教育,随后法国摄影学科教育逐渐在欧洲扩散开来,并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

摄影史研究是伴随摄影教育的发展同时产生的,摄影史教育在摄影术诞生地的法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在英美摄影高等教育课程中,主要注重摄影原理、摄影技艺及摄影应用课程。而在法国,列在第一位的则是“摄影史”“艺术史”等人文课程。很明显,在法国的摄影高等教育中,“摄影传统”的承继和“摄影精神”的养成是整个教育体系最为看重的。他们认为,在摄影教学里,摄影史研究的程度决定了学生对专业认识的高度,一名优秀的摄影师必定在摄影史研究领域具有同样优秀的成就。

## 二、艺术史中的摄影

摄影从诞生起就和艺术纠缠不清。在西方艺术史的语境里,摄影术一出现就伴随着严肃的讨论,在艺术批评理论体系里也开始出现了摄影批评理论。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本西方出版的摄影史所提

收稿日期:2017-11-05

作者简介:樊钢亮(1987—),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艺术史及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到的：“时至今日，在摄影梳理其脉络的过程中其本身已经拥有了一部关于自己的摄影史。”随着相关著作的不断问世，摄影在艺术史中的讨论以及摄影对其自身研究的反思日渐增多。摄影长期以来让我们的学者沉浸在具体的图像中，无法让我们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发现它的位置。随着摄影理论的发展，摄影在进入艺术史，并影响西方艺术观念发展的进程中，显然已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属于何种艺术形式？此问题曾引起过争议，“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为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接受而进行争论，在摄影学院派的眼里，摄影被称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已得到广泛认可、理由就是，（摄影）这一媒介在现代已经拥有了一部分对其给予热情的摄影师，这群摄影人并能够从摄影中获得灵感和身份认同感，从而形成较正式的谱系”<sup>[1]</sup>。而关于摄影是不是艺术的讨论在中国曾极为激烈，如宗白华“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照相片无往而美。何以故？摄影只是简单的摄取了自然界的表面，并不能表现出自然界最深层次的精神（除非摄影者以艺术手法对其进行处理）。艺术假的图画、雕刻却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主要是他们能从艺术家内心的精神层面，去表现自然所谓的精神，让艺术的创作，如自然的创作一样”<sup>[2]</sup>。随着摄影理论体系的建立，关于摄影是不是艺术的争议逐渐消失，摄影本身也越来越得到艺术史研究的重视。这种争议的平息与摄影自身的“制像”（picture-making）特性和发展进程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摄影逐渐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态并渗透到当代艺术这个大环境中，使艺术史研究者没有办法进行回避，且进一步引发了在艺术史写作过程中对其“特殊性”的探究。

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艺术美学方面。在摄影艺术风格演变、创作者个人艺术特色及所谓的摄影艺术概念还未被提及前，真正的摄影艺术史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这导致艺术学研究者开始对摄影的美学展开了新的讨论和思考。摄影的可复制性功能在19世纪还未展现出其自身优势，但是到了20世纪其复制功能大批量的出现，就开始影响到了艺术美学的传播。这时在艺术史的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配图，为读者提供了鉴赏的便利。另外还需要认识到，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摄影被西方艺术史学界接受为艺术形式的同时，摄影的风格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得到爆发。摄影创作者开始关注自身的风格、技术和拍摄内容，试图从这些方面争取自己

和美术的同地位。正是这样的背景，摄影开始从艺术美学研究的角落逐渐进入整个艺术史研究领域。

摄影进入艺术史，不可否认，与他自身的视觉特性有关。图像证史是艺术史研究过程中常用的方法，但谈到“真实性问题”，即摄影是不是可以作为有效的历史文献，却在艺术史的研究中遭到了质疑。我们之所以会轻易相信摄影图片的真实性，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照相机记录影像虽然是人的一种主观行为，但真实存在的物体影像在胶片上所留存的影迹，并不是所谓的人为之作，它是“自然的杰作”。在20世纪30年代，在电影界的发展大潮中出现了所谓的“文献纪录片”，在这样的背景下摄影领域也出现了“文献摄影”概念——拍摄普通人自然状态下的活动。“快速获取影像”这样的时代已经不知不觉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类自身所承担的历史感在这样的大潮中无形中受到了摄影的渗透。但是，对于摄影图片模仿绘画作品手法和构图这一现象，逐渐被艺术史家所重视。特别是冲印照片的技术可以创造不同的视觉效果，使我们更进一步对摄影是否可以作为历史文献提出了质疑。海因（Lewis Hine）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照片可能不会说谎，但是骗子可能会拍照。“摄影之类的图像从来不是历史证据，但它们本身就是历史性的”<sup>[3]</sup>，因为摄影图片和文字同样承载着记录历史的作用：摄影图片不仅在描绘历史，其自身同样也是历史。从玛格南图片社拍摄的大量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摄影图片的目的是有意识的唤醒观看者们的反思，摄影图片中的人物和绘画形式中所描绘的人物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具有记录的功能，也都是我们对社会理想的一种期待，而并不是自然形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特别意义上的演绎，这类无价的信息恰恰是其它历史载体难以提供的。“运用摄影图片去解释和品位历史，同时对图片的真实性加以否定，对其欺骗性进行放大，在形式上让我们认为图片在造假方面比文字容易一些。因此，过分的轻信图片或对图片真实性的怀疑，构成了一种极端的态度，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在抹灭摄影图片在历史研究中应该赋予的真正价值。”<sup>[4]</sup>

摄影在艺术史的地位随着各种艺术意识形态的发展，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然这取决于摄影在自我建构过程中，摄影作品、摄影家、摄影流派三者的相互配合，基于此，摄影不规则的非线性发展形态，则成为其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新的编史模式。

### 三、摄影史的话语权

摄影史经过自身努力开始作为“独立学科”在艺术史体系中出现,西方不少大学的艺术史系设立了摄影史教授席位,摄影史研究逐渐成熟。然而,在艺术批评家眼里,摄影所涉及的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讨论,目前的摄影史同样对很多基本问题还处于规避状态。这些艺术批评家运用西方出现的 New History(新艺术史)对摄影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摄影史再次进行了解读,“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和历史理论解释摄影史;第二,对人视觉感受的再现,包括社会形态的建构和认同中的作用,他们通过在心理学层面的分析对摄影史进行阐述;第三,利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对摄影史展开分析;第四,引入女性主义观念,对男权进行批判,重新肯定女性摄影师在摄影史的地位”<sup>[1]</sup>。摄影史在研究中的转变,和摄影自身的特性、摄影史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以及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是摄影史对之前注重形式分析的一种反叛;同时又受到当时艺术史学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摄影史研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对艺术史产生了呼应。因为摄影本身其实已经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加之大部分从事摄影史研究的学者都有艺术史专业背景,这些摄影史家与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艺术史”流派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摄影史的新思潮。

当然摄影史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科学技术史的进步。从最初的光学原理及化学感光材料的研究逐渐扩展到电子感光技术,摄影走过的每一步都深深地烙上了科技进步的痕迹,这也是摄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具体表现。与摄影相关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摄影不断去开辟新的影像创作领域。正如美国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所说的那样:“当摄影技术促使摄影形成新观念的时候,对我来说,摄影史就成了有技术支撑的摄影观念史。”摄影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参与,使得他在自身研究中就有了某种绝妙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帮助摄影史在艺术史领域博得了更多的眼球。随着数码摄影的出现,摄影的艺术独特性进一步通过科技展现出来,同时也影响了艺术史对摄影的研究。在摄影史的书写过程中,技术史成为其写作的显著特征,从理念到书写方式的独特性,使得摄影史的“话语权”显得格外重要。

“话语”(Discourse)这个词在摄影史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得到关注。其实“话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艺术史研究中,并没有特指摄影,但是随着摄影史地位的确立,在摄影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西方有关

艺术史学术会议上,我们开始接触到“摄影史的话语”“艺术史的话语”之类的短语。Discourse 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和 talk、conversation 和 dissertation 等单词所包含的意思相同。他们主要指的是交谈或讨论,并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含义,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摄影批评理论的不断展开,学者逐渐赋予了它越来越多复杂的含义。我们可以发现,在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表述中,它主要是指“被理解为言论的语言,与言语、与写作主题的主题有关”<sup>[5]</sup>。“话语”与权利关系以及社会实践的关系总是有一种暧昧的关系,他们之间相互交织,成为一体。当西方新艺术评论家试图把“话语”带入摄影史领域时,的确为摄影学科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使得摄影史在通往新境界的道路上,或多或少有了一些看似有用的线索。所谓有意义的“话语”传达,不仅仅是指言词、听觉和写作,同时它还包含影像与姿势。把摄影图像这一概念纳入“话语”世界,使得摄影家更加重视图像感官的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是如何体现其重要性的,“话语”实际上是揭示了权力的关系,这就促使摄影史研究者进一步去考察受众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与文化实践的关系。

摄影如何在艺术史领域中获得话语权——在学术层面拥有控制舆论的权力?在当代艺术思潮中,摄影话语权的力量还不具有引导该学科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话语权掌握在艺术评论家的手里,更准确地讲应该掌握在具有独立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者手里。建立摄影史研究方法体系不仅可以为艺术史研究提供多元性的选择,还能使此学科更加独立,在得到艺术史乃至其它学科界的认可之前,摄影史必须在关注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自身的劣势。由于摄影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借用艺术史的方法论体系,因此摄影史研究如果仅停留在“艺术史研究体系”这一学术层面上是难以在学科领域里树立起自身权威的。摄影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摄影史的研究已经铺开,对它的思考也正在深入,但有一点必须认识到,在短期内他们并不能结出硕果。因此需要我们有长期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沿着前人留下来的研究方向不断前进,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中去获得摄影史的话语权。

### 四、摄影史未来研究的方向

从学科发展角度,摄影史研究单从自身及艺术史研究角度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追随时代潮流,



与当今世界其他学科的研究趋势相结合。“21 世纪整个摄影史研究的走向,将表现出比较研究、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多种研究方法的交叉。同时它还会更多地借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已有研究成果。”<sup>[6]</sup>一定要充分把握好摄影发展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多角度分析和总结每一个时代摄影史研究的特点,深刻发掘产生其变化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另外还要结合社会环境和艺术史研究现状,在各类艺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去揭示摄影史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规律。

摄影史的一体性以及各类艺术形式的关联性,在以门类来区分艺术形式的研究中总是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使用比较研究、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作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摄影与其他视觉图像研究方式如符号学、图像学的比较研究,与传统文本的比较研究等跨文化视角的整体性研究。另外,摄影与非摄影、此类摄影与彼类摄影在区分时从来没有所谓的界限,因为他们本身就处在转化消长的发展规律之中。未来摄影史研究的思路可以预测是朝着文化一体性、艺术人文精神再次复归的方向发展。

### 五、结束语

摄影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尚未能自成体系。当前的摄影史研究大多借鉴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未来摄影史的研究应在理解艺术作

品以及它所包含的时代价值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学科研究体系。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在摄影史教育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要突破摄影史只在摄影院系开设的壁垒,使摄影史作为一种通识教育进入人文素养课程体系,使更多的人了解摄影史,丰富摄影史研究的学科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摄影本身所面临的优势和劣势,在制定相对应的策略时,要从学术和非学术两个方面入手,以便更好地在国际学术界争夺摄影史研究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B. The Contest of Meaning: Critical Histories of Photography[M].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9.
- [2]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3] 曹意强. 艺术史的视野[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6.
- [4] GORDON F, JOHN L. On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Visual[M]. London: Picturing Power, 1988.
- [5] 伊格尔顿. 文学理论导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6] 张燕. 21 世纪艺术史研究走向[J]. 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0(11).

(责任编辑 许峻)

## Photography Discourse Power in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FAN Gangliang

(College of Cultural Heritag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is later than other graphic art form, it depends on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though the developing process seems instantly, academic discipline has accumulated from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t is easy to find photography research method combined with art history is indispensable. What is role photography history in the art history study, whether its subject discourse right has been taken seriously,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history still has many problems, and where is the next step, above all of these are explor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history of photography; arts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discourse power

# “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研究

董世斌, 张晓丹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推进“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新媒体具有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信息承载量大、互动性较强等优势,对“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必要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有关新媒体合作的具体建议。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的合作与发展必将促进其他方面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增强我国的整体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媒体;合作;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5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74-04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有助于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沿线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带一路”倡议全面规划了我国各地的开放态势,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突出强调了内陆节点城市在对外经贸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将被打造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这将促进我国各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这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其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要想在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就需要让信息走在经济前面,利用媒体把政策优

势转变为机遇。新媒体是社会信息的供给者,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要大力加强各区域新媒体之间的合作。

## 一、新媒体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合作发展中的优势

### (一)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即时通讯、直播等全天候服务使信息能够零距离、跨时空全球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沟通让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没有秘密可言,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翻译软件等的出现,让不同的语言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壁垒,信息被毫无阻碍地进行了精准的传播,新媒体能够使科学技术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合作中进行同步的传播,使最新的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最大程度地加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合作的力度和准确度。

### (二)信息承载量大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过程非常复杂和繁琐,信息的存储和检索也成为技术发展的重点。新媒体以网络平台为载体无限度地承载信息,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把网络平台作为信息储存的一种载体,能

收稿日期:2018-01-06

基金项目:2017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问题研究”(2017B041)

作者简介:董世斌(1971—),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广告学、传播学研究。

够准确地把研究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毫无遗漏地存储起来,数据的整合和分析也不再需要人工进行,直接用数据分析等软件就可以一步搞定,极大地减少了人力和物力的消耗。通过搜索引擎能够准确地进行信息检索,快捷查找所需要的信息,把传统社会中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新媒体信息承载量的加大使“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之间关于技术和信息的沟通更加方便,能够以少量的财力把最大的效用发挥出来,沟通和交流毫无障碍。

### (三) 互动性较强

技术的研发是为了服务于人,新媒体技术反馈的迅捷在“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合作中能得到很大的运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各个方面,需要及时信息进行反馈,加强实施的效果。为了把国家的政策更好地利用起来,使制定的方案更加适合当地的情况,把政策的红利转变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机遇,依托新媒体技术进行的互动和沟通,能够及时接受和分享信息,为各地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宜的发展策略。

## 二、“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的必要性

### (一) 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使我国内陆节点城市连接成一个主体,有利于中西部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由于对外贸易便利,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逐渐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开发新媒体技术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东部地区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借助经济支撑和对外交流学习的便利条件,加大了在新媒体领域的投入,新媒体领域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内陆地区由于受交通不便利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为了使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我国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但中西部地区整体上还是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为内陆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国家加大了对内陆地区的投入,使新媒体发展缓慢的“一带一路”内陆节点城市能够向东部地区学习,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能够辐射和拉动周边地区,实现共同进步。

### (二) 产业结构不合理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全面发展技术,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国的

主要特征,大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结构链条中所占的比重较少。在以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以技术取胜、以技术决定是否为大国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对高新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产业结构的转型势在必行,必须加强各行各业的联系和交流,实现技术共享。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严重不均,东部区域主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中西部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虽然现在国家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并关闭一部分污染严重的不合格企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占据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要求我国加强东中西部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更要加强新媒体之间的合作,中西部地区要结合本区域特色,提高技术的研发,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转型。

### (三) 整体国力微弱

加强新媒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实现信息技术的共享,能够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做到扬长避短,实现整体国力的提升。由于地区特色、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对新媒体的投入力度和研发水平也不同,导致我国各地区新媒体的发展参差不齐,有的地区与世界的发展同步,有的地区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完全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地区的水平综合起来处于 $1+1<2$ 的标准,严重拉低了我国在新媒体领域的整体国力,这对我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竞争都是不利的,与我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不符。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的整体国力,使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断提高,需要加强各地区新媒体的合作,让它们能够发挥 $1+1>2$ 的威力,这是各地域促进自身发展和进步的要求。提升整体国力是我国各区域的共同责任,要共同发展新媒体,以节点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各个地区,实现共商、共享、共建。<sup>[1]</sup>

## 三、“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的影响因素

通过新媒体之间的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的联系,用信息技术打破区域之间的界限,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快我国的整体发展进程,但由于各地区存在差距,在合作期间面临许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 (一) 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由于每个地区所处的地理条件不同,致使经济的发展程度也相应地产生了差距。“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之间的合作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相遇,是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sup>[2]</sup>地区之间的

差异成为各地区之间交流、沟通、认同的壁垒,文化的不同导致地区间对各自文化的维护和对其他文化的排斥,经济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接触和理解的差异,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均衡,其发展定位也有很大的差距。<sup>[3]</sup>在《愿景和行动》中对内陆地区的定位主要是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支持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加强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通关合作,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布局,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sup>[4]</sup>这些定位的确立,主要是以当地的经济、文化、交通条件为依托,定位的不同会影响地区之间的合作。

## (二)受众群体因素

新媒体作为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受众作为新媒体的主体,是新媒体服务的重点,由于中国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些地域中存在的受众群体也大相径庭。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习惯都是在环境的影响中形成的,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每天接触事物的不同,导致受众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致使内陆区域间的新媒体合作出现了困境。中国内陆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较封闭,受众群体接触新事物的时间较晚、频率较低,在发达地域流行过的事物也许才在内陆流行起来,因此人们对事物更新换代的认知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学习能力较差,特别是在与东部沿线地区的新媒体合作中,由于东部地区新媒体紧跟时代的步伐,走在世界的前端,再加上沿线交通的便利和外来居住人口的增多,受众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对新媒体有了一定的认知,这正是内陆地区的受众所缺乏的,影响了新媒体之间的合作。

## (三)传播环境因素

地域的差距影响所处的环境、受众、经济、文化等,对生活环境影响更为重要。环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由于所处地区的不同,政府提出的政策以及实施效果等都各不相同,使得新媒体传播环境也有很大的差距。新媒体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微小因素,每个区域都拥有独特的传播环境,环境的不同致使各区域媒体的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成都、武汉、郑州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由于当地政府对新媒体的投入大、国家重视程度高,新媒体的发展较快,传播环境比较优

越,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正好相反,严重影响了地域间新媒体的相互合作。传播环境的差异使得新媒体在本区域内的发展速度和相互间合作所推行的速度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在其他地区所推行的促进新媒体发展的策略,如果照搬照用在本地区就有可能阻碍新媒体发展,地区之间新媒体的合作需要在本区域进行试点,这对新媒体的合作发展过程和结果的推行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 四、对“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的建议

节点城市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互补的全国骨干流通网络。<sup>[5]</sup>东中西部地区流通网络协调发展,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节点城市联动发展,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整合升级,全国的软实力明显提升,已为新媒体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新媒体,还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强合作。

### (一)技术领域的共商

随着媒体的变革,新旧媒体的碰撞和冲突时有发生,对新旧媒体进行融合,让社会进入融媒体时代的口号也越喊越响,但由于技术等的不成熟,使得新旧媒体的融合很不彻底,目前融媒体只是现存于大多数人观念中的名词。在“一带一路”我国内陆节点城市新媒体合作发展中,首先要针对新旧媒体进行具体的探讨,根据各地区新旧媒体的现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整合,特别是学习东部地区先进媒体经验,加强内陆城市之间的合作,促使融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sup>[6-7]</sup>

如今记者身兼数职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对记者人数有一定硬性要求的高端会议,这就需要有技术方面的研发和升级来满足新媒体对记者能力的要求。媒体与VR技术的进一步结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现今由于VR技术的不成熟和稀缺,VR设备笨重昂贵,只能在一些重要会议报道中才能见到VR设备的背影。“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加强对VR技术的进一步合作,节点城市的技术人员互相学习、共同研发,让VR技术能够如手机一样,实现由繁到简的过渡,特别是现今视频化的时代,图片能够使不同人种、不同语言的受众快速接受、理解信息,让VR设备操作摆脱繁琐的实施步骤,成为人人可用、人人能用的设施是时代的要求。<sup>[8]</sup>

### (二)媒体平台的共建

现今社会人人都拥有话语权,传统的主流媒体随着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立越来越被人们选择性

遗忘,人们获取信息、捕捉热点信息的渠道早已转变,这就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领下,主要节点城市共同合作,建立起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要显示出强大的互动性,以受众乐于接受的灵动活泼的文字、图片,辅以链接的方式对本地区的特色进行报道;报道内容要贴近受众,彰显热点;适时推出特色栏目的报道,让受众能够自发地转发、点赞、宣传推广,从而让地区受众与政府进行积极的互动和沟通,争取建立起受众信任的、权威的媒体平台。同时,对平台的建设要做好严格的把关工作。<sup>[9]</sup>

### (三)大数据的共享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记录和分析,人们生活的环境被数据化。数据共享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能够更加精确、更加全面地追踪社会所需,但由于利益等各方面的原因,数据共享一直处于理想状态。“一带一路”倡议为大数据的共享提供了平台,能够联合“一带一路”我国节点城市把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区域间达到共享。“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签订合作协议,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各个区域通过对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其他区域进行共享,通过各区域数据的汇总和共享,不仅能够使本区域制定的发展政策更具有针对性,更加适合自己的区域特色,而且使“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整

体的发展更进一步,从而促进中国新媒体行业的整体发展。

### 参考文献:

- [1]李富根. 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一带一路”媒体合作新格局[J]. 对外传播, 2016(10):16-17.
- [2]龚哲.“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媒体在文化遗产“走出去”中的作用[J]. 新媒体研究, 2017, 3(12):46-47.
- [3]陈虹虹.“一带一路”沿线媒体合作策略浅析:文化距离视角[J]. 传播与版权, 2017(2):167-169.
- [4]刘雪琳.“一带一路”战略对外传播效果的优化探讨[J]. 新闻传播, 2017(5):111.
- [5]阎晓明. 共建“一带一路”上的媒体合作之路[J]. 中国广播, 2016, 276(6):6-7.
- [6]姚青青. 融合视角下传媒产业发展研究综述[J]. 新媒体研究, 2017, 3(16):68-69.
- [7]定军, 陈海银. 一带一路区域节点城市迎来发展良机[J]. 大陆桥视野, 2015(7):75-77.
- [8]景威栋, 李丽, 景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新媒体助推藏医药文化传播的机遇和挑战[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17, 23(2):1-4.
- [9]苏宁, 杨传开.“丝路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节点的特征与发展意义[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8):74-83.

(责任编辑 姚虹)

## Research on “the Belt and Road” on the New Media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land Node Cities

DONG Shibin, ZHANG Xiaodan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people are surrounded by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As a major carrier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w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 the inland node ci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New media has the advantage of breakthrough time and space, great information carrying capacity and strong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impact of development, we put forward concrete proposals on the cooperation of new media.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in inland node cities will inevitably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other partie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new media;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 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挑战与策略选择

白志如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媒介融合时代品牌传播正在经历新的变化,本文结合媒介边界的消融、消费者主体性的重构、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等三个方面重新思考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革新老字号品牌观念,从建立有效传播接触点、确立独特产品及其形象、激励消费者个性化参与、挖掘品牌文化内涵以及主动建立品牌传播案例库等五个方面提出策略和建议,以期为老字号品牌传播的长期实践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启发。

**关键词:**中华老字号;品牌传播;消费者参与;案例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6

**中图分类号:**F2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78-04

媒介融合时代品牌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正在经历新的变化,传统品牌如何应用新的媒介进行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06年商务部开启振兴老字号、认定中华老字号活动,至今已有十余年,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老字号生存境遇一直存在问题。2007年商务部编纂的《中国品牌发展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一万多家,1990年认定“中华老字号”时剩约1600多家;2006年商务部重新认定“中华老字号”,至今共有1128家。这种递减趋势说明中华老字号并非基业长青。2016年3月商务部启动的大规模调研发现,部分老字号获得了创新和发展,例如全聚德、云南白药、同仁堂等,但是大部分老字号企业经营规模有限,品牌发展也受到地域局限,小作坊式生产依然存在,现存的一千多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只有10%蓬勃发展,不少经营出现危机。<sup>[1]</sup>2017年商务部等16部门联合印发《商务部等16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sup>[2]</sup>,提出实施“互联网+老字号”工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引导老字号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求,开发网络适销产品和款式,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老字号品牌如何驾驭新媒介力量,从而获得可持续性发展,成为老字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媒介边界的消融、消费者主体性的重构、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等三个方面,思考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提出在革新品牌传播观念、确立独特产品及其形象、激励消费者个性化参与、挖掘品牌文化内涵以及自主进行品牌传播案例库建设等五大方面重视相关的策略应用,展望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发展趋向,以期为老字号品牌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启示。

## 一、融媒时代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困境与挑战

媒介融合不仅是现实实践,而且是未来趋势,这成为思考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必然语境,在此背景下品牌传播理论有着实质性的转变。如果结合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困境进行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其面临的问题。

首先,媒介边界的消融意味着老字号品牌传播内容和样式更为多样化,但是多数老字号的品牌传播并未革新观念,或者并未深度把握媒介革新趋势。老字号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品牌老化,老字号的整体

收稿日期:2017-12-3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河南省老字号品牌传播体系的建设”(2015-ZD-166)

作者简介:白志如(1982—),女,河南禹州人,传播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与品牌传播。

品牌创新意识普遍薄弱。有研究者发现,49.21%的老字号未进行品牌形象创新,51.58%的老字号未进行或者仅仅有限进行了品牌推广创新,75.13%的老字号未进行品牌管理创新。不过老字号越是对未来预期良好,越是与客户和社会保持良好关系,越是具有质量和技术优势,就越注重品牌创新。<sup>[3]</sup>可见在老字号品牌创新意识普遍薄弱的情况下,老字号对媒介环境变化的把握程度直接反映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因为品牌形象、品牌推广等都需要借助媒介形式完成。目前河南老字号驾驭新媒介的能力尚不足,没有形成对融媒时代的正确认知。以微信公众号为例,河南老字号注册微信公众号的行为较为普遍,但是持续更新内容的老字号较少,这样浅尝辄止的“占有”行为不仅无益于传播,而且无益于“信任”关系的维系,因为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都直接关乎品牌形象与传播。老字号的新媒介应用不等于注册账号,也不等于拥有电商或者粉丝,而是需要老字号从全局上理解媒介边界的消融、线上线下的空间重构以及垂直化和细分化浪潮,这才是当前媒介正在经历的变革。

其次,消费者主体性的重构启示老字号品牌传播需要更加重视消费者的力量,但是消费者缺席是企业品牌传播的通病,在老字号品牌传播历史中尤其严重,而这正是当前变革最为明显的环节。一方面,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新媒介所促成的支付场景和消费习惯的变迁等都使得新生代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与行为模式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消费者不再是单纯的产品或者品牌“交易”的对象,而逐步成为“交往”对象。从交易行为向交往行为的转变,意味着消费者被还原为“整体的人”,正如科特勒等研究者在《营销革命 3.0: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sup>[4]</sup>中所持的观点,交换、交易被提升成互动、共鸣,人文精神成为营销的驱动力。因此,消费者的主体性如何被最大程度地保存和激发以及老字号的人文精神如何被挖掘,成为老字号品牌传播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河南老字号尚没有形成对新媒介时代消费者群体的正确认知,不能将新生代消费者及其消费行为模式的变化纳入到战略层面进行考虑,更多的老字号依然将消费者视为交易对象,而非长期的交往对象,因此在个性化产品创新以及消费者互动方面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最后,新媒介时代品牌共建的参与生态需要老字号在品牌传播方面重新思考多方关系的建构,这不仅包括消费者,还包括所有能够引入的开放力量,这是一项需要站在一定高度的长期战略规划。就河

南本土老字号而言,手工作坊与规模效应之间尚未达到均衡,这就造成河南本土老字号品牌观念薄弱,小富即安心态较为普遍,因此存在过于保守的路径依赖,这不仅是河南老字号的通病,也是其他传统老字号的通病,尤其是“在品牌传播上往往过于依赖一些老顾客的口碑,而忽视了对品牌的持续宣传和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者品牌情感的持续培育,导致顾客群体转移或消失。”<sup>[5]</sup>实际上消费者的承继和迭代是老字号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另外,地域老字号的产品特征往往具有地理限制,例如河南老字号分布密集的洛阳、开封、周口、南阳、新乡等,这使得老字号企业一方面对新媒介传播的广泛化价值难以认同,另一方面对新媒介的地理性价值也颇为生疏,因此很难有效利用新媒介力量。例如2017年天猫和北京老字号合作启动“天字号计划”,三个月后普及到全国,打造现代中国“全球表达”的“新中国名片”。天猫超市香港站推出内地“天字号计划”品牌活动,北冰洋、知味观、五芳斋、百雀羚等老字号借势出海,但是河南老字号产品却较少参与。根据天猫数据,2017年天猫海外成交覆盖国家地区数最多的十大老字号中,上海4家,北京、湖北、湖南、浙江、重庆、云南各1家。尽管河南老字号历史悠久,也需要在新趋势下积极探索,借助各方力量打造品牌传播态势是老字号的发展趋势,这需要引起老字号企业足够的重视。

## 二、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策略与建议

面临融媒时代的各方挑战,河南老字号不必跟风而行,但需要顺势而为。河南老字号需要在品牌传播策略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不仅包括品牌传播观念和意识、产品定位与形象,还包括消费者的个性化参与以及文化内涵的挖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操作性策略,品牌传播案例库的建设也应该被老字号视为学习和成长的间接经验储备和动力源泉,并被纳入到老字号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去。

### (一)转变品牌传播意识,建立有效的传播接触点

老字号品牌传播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全局思维,将媒介融合及相应的社会变化视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小作坊生产方式、小富即安的眼光与心态等会让地域性品牌在浑然不觉中失去很多机会,因为信息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小地方”,信息的流动及其对空间的重组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一种“剪刀差”效应,一旦过了这个“节点”,经营状况会良莠分明。美国学者戴维斯提出了品牌接触点,认为品牌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产生新的品牌接触

点,而任何一个接触点都是影响消费者的关键。<sup>[6]</sup>因此,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新媒介应用,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立和占有新媒介账号上疏于维护和管理,更不能将其等同于简单地拥有电商和粉丝,而是要具备新媒介全局观念和革新意识,要着眼于建立新媒介传播的网状结构,将老字号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视为重要的传播机会。

## (二) 维护产品的独特内涵,澄清品牌形象与定位

一方面,老字号要重视产品的独特性以及“匠人”精神的传承,这是老字号品牌屹立不倒的基础保障。有研究者对北京餐饮老字号品牌进行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保持老北京风味和食品安全信誉好这两个要素最为满意,对其经营方式缺乏创新、价格偏高较为不满。<sup>[7]</sup>河南老字号也主要分布于食品、餐饮、酿造等行业,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以家族经营、单一产品等形式维系生存,<sup>[8]</sup>因此也面临着如何围绕特色单品,丰富高质量产品体系的难题。与此同时,老字号品牌既不能盲目追逐年轻人市场,也不能忽略新生代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变迁,因为消费者对品质、品味的追求和消费行为、支付模式的变化是互相关联的,要以其产品的独特内涵维系一定规模的稳定消费群。另一方面,老字号要注重品牌传播方面的形象维护,因为品质不清、形象不明,会造成新生代对老字号品牌的认知模糊。例如老字号命名高度重复、商标之争此起彼伏等都会导致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形象的混淆。另外,同类产品的混淆竞争也会严重冲击老字号品牌形象。王守义十三香的品牌形象维护具有借鉴价值。该企业注册了“十三香”和“王守义十三香”等商标,并且申请了46项外观专利,从而将“五香粉”等多种鱼龙混杂的产品逐渐排出天然调味品市场,确立了稳固的品类第一形象。产品的独特内涵和形象定位密切联系,无论规模大小,老字号都要确立其品类地位和品牌形象,这样才能具备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

## (三) 重视消费者特征,激发个性化参与

社会化媒体的分享力和扩散力是消费者借助新媒介参与品牌传播的基础。徐伟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获得了颇具价值的新发现,他们认为“消费者认同老字号,可能并未完全基于其产品或服务属性,而是想通过老字号实现或表达真实性的自我。”<sup>[9]</sup>这就需要精准捕捉消费者特征,鼓励和激发消费者的个性化参与,进而激活老字号的口碑效应,从而将新生代消费者纳入到品牌发展和共建的战略地位中去。故宫博物院文创团队的经验,在传统品牌文化与新

媒介应用的结合方面为河南老字号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部数字传媒组将六百年的“严肃故宫”形象通过卖萌、搞笑、酷玩等“接地气”方式传到了新产品中,例如故宫筷子、朝珠耳机、如意凉拖、“朕亦甚想你”扇子等,并形成了故宫文创微博、故宫出品系列APP、“故宫淘宝”公众号等新媒介传播阵营,通过场景式话题和趣味化文案触发读者的参与情怀,激活了故宫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年轻消费者个性化参与之间的对接,使其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分享价值。这也说明了消费者个性化参与意识的觉醒,应该被老字号品牌传播纳入到战略层面给予重视。

## (四) 挖掘品牌的文化内涵,寻找创新与传承之间的平衡点

老字号文化是品牌传播的精神源泉,因此立足文化内涵是老字号品牌传播创新的根基所在。以源于1627年的中华老字号河南汝州四知堂为例,昔日流传“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中原有四知堂”,但今日消费者对四知堂的认同却很难与同仁堂和胡庆余堂匹敌。同仁堂和胡庆余堂的创新发展属于老字号中的佼佼者,在经营管理、产品体系以及品牌传播、文化建设等方面表现非凡。作为地域品牌的四知堂,其所具备的历史根基已经形成了文化资本,但是缺乏有效的挖掘,需要借助新媒介力量获得新生。河南老字号低度酒首创者张弓酒业的新媒介实践颇具参考价值。张弓酒业于2016年通过投资拍摄10集网络微电影《酒段高手》进行品牌文化植入,以微信公众号“酒段高手”作为微网剧官方平台,这也是其长期院线计划的前期步骤之一;2017年张弓酒业又投资建设张弓酒文化体验馆,进行品牌形象和文化传播。这些举措是河南本土老字号品牌进行深度新媒介应用与文化传播的典型,虽然对于较小规模的品牌而言难以模仿,但是老字号文化可以被阐释和演绎,这对所有老字号都具有借鉴价值,老字号文化最终唤醒的是消费者的社会身份、秩序和归属感。

## (五) 建立品牌传播案例库,形成成长共同体

建立老字号品牌传播案例库可以从经验和教训层面获得新媒介传播策略的积累,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如何解决老字号对新媒介应用的迟钝、观望或者折戟而归?单一或者单纯的理论分析对于老字号长期的品牌传播实践来说是单薄和无力的,激发老字号品牌传播的内生力量才能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这就至少需要在两个方面进行策略转变:一方面,河南老字号品牌从自身做起,主动建立品牌传播



案例库,积累间接经验;另一方面,老字号之间需要协作,形成合力,以团体经验应对新媒介挑战。例如,建立国内第一家老字号领域非政府案例库的是杭州老字号研究院,它不仅从品牌管理和传播层面研究老字号创新与发展,而且为老字号掌门人提供培训和经验交流。“互联网+老字号”是一项复杂的探索工作,单个老字号很难突破其发展的路径依赖,通过有组织的形式为老字号提供交流和学习机会,激发老字号的新思维和新观念,就有可能推动老字号跳出以往的品牌传播惯性,也能可持续地激活老字号的行动力。

### 三、融媒时代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的未来展望

未来河南老字号品牌传播需要避开误区,不能再将传播重点放在与新媒介的表面接触上,而是要放在借助新媒介接触消费者,以及借助新媒介重构品牌关系上。技术层面的形式主义掩盖了真正的内容创造,这是老字号进行品牌传播容易陷入的深坑。老字号品牌传播与新媒介只是表面接触这种偏见会导致一系列恶性循环,造成老字号长期无法深度认知和驾驭新媒介,却又象征性地被动“拥抱”新媒体,最终无益于品牌传播。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融媒时代的品牌传播策略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老字号,需要老字号结合自身条件进行抉择。地域性老字号需要开放品牌传播观念、重视消费者能动性、驾驭新媒介以及直面网络社会,这些需求具有普适性,也是刻不容缓的现实需求。因此,未来老字号品牌既要以开放姿态和团队协作的方式利用外部机遇,又要重视挖掘和阐释老字号自身的文化内涵,在老字号的品牌智慧、文化与消费者的深度需求之间建立畅通的关系,并且通过案例库建设形成自主学

习和成长习惯,进而建立从驾驭外部力量到创造内生性力量的长效机制,从而建立可持续的发展生态。

### 参考文献:

- [1]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1128 家中华老字号迎政策礼包 [EB/OL]. (2017-02-07) [2017-12-15].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hengcejid/bp/201702/20170202510956.shtml>.
- [2]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商务部等 16 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EB/OL]. (2017-02-03) [2017-12-18].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d/201702/20170202509727.shtml>.
- [3] 尉建文,黄莉. 老字号企业品牌创新及其影响因素[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3-18.
- [4] 科特勒,卡塔加雅,塞蒂亚万. 营销革命 3.0: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M]. 毕崇毅,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 [5] 彭博,晁钢令. 中国传统老字号品牌激活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2012(3):90-92.
- [6] 戴维斯,邓恩. 品牌驱动力[M]. 李哲,刘莹,译.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 [7] 张景云,王勇,周野. 基于满意度调查的北京餐饮老字号经营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4):97-99.
- [8] 穆健康. 河南省老字号品牌活化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10(5):232-233.
- [9] 徐伟,王平,王新新,等. 老字号真实性的测量与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15(9):1286-1293.

(责任编辑 姚虹)

##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Henan Time-honored Br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Media Era

BAI Zhiru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mes of media integration, brand communication is undergoing new changes. This paper reconsiders th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Henan Time-honored Brand from the fusion of media boundary,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sumers' subjectivit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brand co-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Time-honored Brand in the long term practice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five suggestions: innovating brand concept to set up contact point, establishing unique product and brand position, encouraging personalized participation of consumers, excavating of brand culture, and building a case base of br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hina time-honored brand; brand communication; consumer involvement; case base

# 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的正义叙事

吴乔艳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基础部, 郑州 451191)

**摘要:**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好莱坞类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大量使用娴熟、精美和规范的语言而深受大众欢迎。法庭题材影片形成于20世纪后期,以法庭诉讼过程为背景、以法律程序为时间线索,讲述法庭辩论双方道德与情感交织的故事,体现好莱坞电影擅长利用创作者与观众互动展开叙事行为的特点。本文从叙事行为的角度探索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正义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7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82-03

美国好莱坞电影具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创作体系,形成了许多类型电影,类型电影的产生是好莱坞电影规范化发展的结果。好莱坞电影类型包括西部片、灾难片、喜剧片等,其中也包括20世纪后半段成形的法庭题材影片。顾名思义,法庭题材影片就是以法庭诉讼过程为背景、以法律程序为时间线索,讲述法庭辩论双方之间的道德与情感交织的故事。故事中自始至终的矛盾冲突以及情节剧的风格特征都让其受到了大众欢迎。法庭题材电影设计逻辑要求严格的法庭辩论情节,因此它更加需要完善的叙事策略。好莱坞电影很早就意识到将故事的叙事策略定位成创作者与观众互动的机制。本文将从叙事行为角度探索好莱坞题材影片的叙事策略。

## 一、叙事要素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基于美国的司法制度而来,因此整个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比较固定的。影片故事的开头是一片平静,然后主人公开始陷入民事和刑事案件之中,成为了原告或者被告,从而开始了诉讼过程。有些好莱坞法庭影片则以司法工作者的角度来描述案件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总之,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叙事结构的准备工作有以下作用:第一,为后续的诉讼过程做好情节上面的铺垫;第二,让法庭上参与辩论的人物形象更加地丰满;第三,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在完成

电影情节的铺陈工作后,好莱坞电影开始正式进入案件部分<sup>[1]</sup>。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是从案件的发生过程开始的,与好莱坞电影中经典的叙事电影不同,播放案件的发生过程并不是为了展现案件的前因后果,而是为法庭上面的辩论提供基本的事实依据。在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对于案件发生过程的处理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电影《杀戮时刻》和电影《青年林肯》为我们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案件发生过程。前者是一场直接暴力冲突,所有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很清晰,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法庭上的一幕惨剧;而后者显得含蓄而充满悬念,在单一视角的陈述下,让我们对剧情的发展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在案件发生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律师和公诉人员的介入。在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律师和公诉人被定位成正义的代言人。因此,律师介入案件成为了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必有的桥段。而法院的审理结果也往往取决于律师的辩论。在被告律师与公诉人的辩论过程中,法律程序便与故事的线索一同前进。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除了辩护律师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与律师的关系总是由不配合的相互猜忌变为齐心协力,并且依靠两人的合力最终让冤案昭雪,让暴徒

收稿日期:2017-12-13

作者简介:吴乔艳(198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法研究。

得到应有的惩罚<sup>[5]</sup>。电影《费城故事》中安德鲁和乔之间由最开始的厌恶鄙视最终发展为互相尊敬,不仅齐心协力地打赢了官司,还让两人的事业得到了发展。

律师介入之后,在庭审正式开始之前还要经过精心的庭审准备。庭审准备阶段要完成陪审团的挑选和审前会议环节。随后法官出场,庭审正式开始。庭审是好莱坞题材电影的高潮部分,随着法官的一声锤击,双方辩护律师的辩论正式开始。作为法庭题材类型影片的高潮,这部分集中了戏剧冲突的大部分矛盾,各种语言交锋格外犀利。双方律师进行案件陈述,随后进行交叉质询,他们所有的言行都会呈现在陪审团的视野中。此时法官成为了观众的代言人,代替观众向双方当事人和律师提出问题。这是好莱坞叙事中互动机制的体现。纵观好莱坞法庭题材的影片,都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即在辩论的初期中,正面的一方总是处在弱势,并且即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样的情节铺垫,反而让观众对于正面一方的逆袭充满期待。往往此时正面方处境越危险,当正面方逆转成功时给观众的冲击越大。

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中,时常会出现休庭的情节。休庭常常发生在情节突变之间,这部分往往酝酿的是庭审结果的逆袭。通常在这个时候,庭审的核心人物——正面律师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扭转颓势,而关系到庭审胜负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证据都会在这个时候成为逆转的杀手锏。为了充分吊足观众的胃口,关键的新证据往往出现在决定诉讼成败的最后几分钟。同时,为了不让最后的证据出现得过于突兀,即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影片通常会为新证据的出现做好铺垫。此外,诉讼双方当事人情感的突变或者是忏悔也往往导致故事情节的逆转。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所选的素材大都具有代表意义,并且是社会大众所关心的,因此社会舆论的态度对于这些案件的审理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杀戮时刻》中便存在由于案件的争论导致的3K党与黑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这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导致的暗杀事件竟然发生在庭审的法庭门口,这足以说明庭审所带来的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的出现也使得以语言辩论为主的法庭题材电影有了动作性和戏剧性,这对于好莱坞法庭电影正义叙事主题的强化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休庭,二次开庭也具有实现庭审情节逆转的功能。在美国,由于注重证据和司法程序,许多案件的审判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这些拖拉的审判过程显然不能够电影化,所以用二次开庭来象

征审判的长周期也是恰当的。二次开庭的流程与第一次基本相同,而其主要作用还在于实现峰回路转的效果。二次庭审中,正面一方会提交新证据让陪审团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增加影片的真实感。或者,正面一方的律师会在最后进行慷慨陈词,最终打动了陪审团。两种情节逆转的背后都是对司法公正的坚守,所表达的核心意义在于肯定正义。这样的结局能够迎合大部分观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求,从而提高影片的影响力。

在一系列的庭审、休庭和二次庭审之后,法官将听从陪审团的意见进行无罪和有罪的审判。在好莱坞法庭电影中,陪审团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具有裁决案件的权力,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并不团结的集体。和现实中的陪审团相比,电影中陪审团的意志很容易被观众把握,即使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讨论出的结果也往往被观众所预料到,这也是好莱坞法庭电影坚持正义的叙事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sup>[4]</sup>。

## 二、叙事行为分析

在现代电影理论中,我们经常用叙事学理论来分析影片中的叙事行为。而对于一般电影来说,叙事行为的研究分为语境研究和句法研究,也被称为表达叙事学和主题叙事学。其中人们通常用发讯者、客体、主体、接受者、助手和敌手六个要素来形容主题叙事学。这六个要素通过情节与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向前推进。对于类型电影而言,所有逻辑关系的基础都基于类型电影的基本叙事惯例。在这样的叙事惯例之中,常常将拯救危机和灾难的希望寄托于某些品德高尚和胆识过人的英雄身上,他们能够抚平灾难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伤疤,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救赎<sup>[3]</sup>。

在好莱坞法庭题材的电影中,显然是由律师来充当英雄形象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律师无疑是整个拯救过程中最有力的执行者,是整个叙事行为的核心。影片中,律师对于案件的胜诉有着强烈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一开始并不是那样强烈,它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这点在《被告》中有体现。在影片中,墨菲是一名女公诉人,当她经手莎拉被强奸的案子时,因为证据不足,她认为能够让强奸犯进入监狱就是最好的结果了,结果导致案件在审前动议阶段就失败了。而当墨菲开始真正体会到强奸犯对于莎拉的伤害时,她重新唤醒了内心对于胜诉的渴望,而这份渴望在与莎拉的接触过程中与日俱增,最终墨菲为莎拉讨回了公道。

即便是在庭审现场叱咤风云的英雄律师有时候也具有克服内心的心理创伤和收获宝贵感情的行

为,这便是英雄律师们的自我救赎。而自我救赎的情节也是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正义叙事的一部分。律师作为美国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份职业,也是一份阅历。律师在捍卫正义的过程中,往往能够让自己的感情和人格得到升华,让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变得坚定。在常人的眼里,律师往往是那些衣着得体、口若悬河的精英形象,而真实的情况是有许多律师一直忍受着事业的低迷带来的巨大心理和生理折磨,他们四处碰壁,并没有流露出一点英雄的形象和气质;或者有的是刚刚进入律师行业,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由于经验浅薄而被许多人拒之门外。他们命运的改变却都是因为一场在别人看来打不赢的官司。英雄自我救赎的最初土壤是那些站在英雄对面的敌手们。在叙事行为的六个要素中,敌手是一个很奇特的要素,因为没有对手的戏剧是乏味的,有了敌人和对手,才有了戏剧性和冲突性<sup>[2]</sup>。在好莱坞法庭电影的叙事体系中,敌手并不单单指那些你死我活的对手,而是代指了社会中一类社会成员的意见,虽然这些成员的思想与正义的一方相比会有些灰暗,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想法和观念。他们和英雄律师来自于一个大的团体,但是只有英雄律师愿意冒着被团队中大多数人仇视的风险而选择捍卫正义,这才是英雄律师自我拯救的价值体现。而敌手的众多和声势的浩大本就是为英雄的最终胜利制造反差,因此从叙事方法上看,敌手与帮手的势均力敌并不能凸显出英雄的伟大,所以在好莱坞法庭电影中,可以发现敌对势力总是数倍于英雄律师的势力。研究好莱坞法庭电影不难发现,最后战胜庞大邪恶势力的源泉来自于亲情、友情以及陌生人之间的关爱。《杀戮时刻》中杰克的妻子是影片中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她却在敌手和帮手之间巧妙地转换着,当面对3K

党的威胁时,妻子带上孩子离开了处在困境中的杰克;而在杰克为了案件最后的陈述而焦急准备的时候,妻子却出现了他的面前,并且用女人的温柔和善良抚慰了杰克焦虑的心灵,让他最终成功。杰克也最终因为诉讼的胜利,弥补了自己之前没有能够阻止凶案发生的遗憾和忏悔。

### 三、结语

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成熟和独立的表现类型,这种表现类型能够满足不同观众心理上对于司法公正的渴求,同时对于弘扬司法正义也具有良好的宣传作用。好莱坞法庭题材影片的正义叙事行为,对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好莱坞法庭题材电影的叙事行为,不仅是为了宣示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更是从电影叙事的角度学习好莱坞电影创作者的叙事技巧以及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机制。只有始终将满足观众的需求作为使命,才能创造出更加合适的叙事方式,从而推动类型电影的快速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李莉,黄飞. 英雄律师的正义神话:美国法庭电影叙事机制研究[J]. 当代电影,2015(7):40-45
- [2] 刘维娜. 论美国法庭电影中的话语叙事机制[J]. 名作欣赏,2012(30):103-106.
- [3] 姚睿. 正义与情感的银幕书写:美国法庭片的叙事与文化价值观[J]. 当代电影,2015(7):27-32.
- [4] 程功. 当代中美法律题材电影的类型辨析与风格比较[J]. 当代电影,2015(7):99-103.
- [5] 童晓岚,郭德双. 试论美国法律文化在经典法律电影中的表达[J]. 科技创业月刊,2011(5):156-16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The Justice Narrative of Hollywood Court Film

WU Qiaoyan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Business & Management, Zhengzhou 451191, China)

**Abstract:** Hollywood court film,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ollywood genre films, enjoys great popularity due to its abundant application of skilled, refined and standardized language. With the court proceedings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legal proceedings as the time clue, the court film, initiating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llustrates a story interwoven with morality and emo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court debate, and reflects that the Hollywood film makes good 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ors and audiences to indicate the narrative behavi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Hollywood court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ive behavior.

**Key words:** Hollywood; court film; justice narrative

#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余清

(南阳师范学院 团委,河南 南阳 47306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汉语国际传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汉语国际传播面临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不够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来自英语的冲击和汉语自身学习困难等困境。“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经济产业合作的同时,也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平台。面对机遇和挑战,在“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大格局下,要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力度。个体的学习交流与交际交往都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在汉语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深度融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国际传播;文化传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8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85-04

汉语国际传播历史悠久,西汉时期张骞出塞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贸易和文化之名为汉语国际传播开创了历史,如今孔子学院和华文教育学校等机构为汉语国际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汉语国际传播也面临新的困境。

## 一、汉语国际传播的时代意义与现实困境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媒介,是民族的重要特征。语言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它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六大语言之一。

(一)汉语国际传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的实质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五位一体”突出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然而在国际社会“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能闭门造车,绝不是仅仅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和平发展方针、多边合作战略、互赢互利导向是当代国家发展的正确选择,实现的途径离不开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语言的国际地位与其所属国家的综合国力成正比,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全世界又掀起一股“汉语热”,汉语国际传播理应上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汉语国际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资源,相比较国内已经项目化系统化的英语教研、培训、考试消费,我国在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也应该从顶层设计开始,系统化项目化运作。例如,英语有雅思托福考试,汉语也可以有权威的等级考试;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外语学院和开设英语课程,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成立汉语学院开展汉语教研工作,从过去的以服务为导向转为以经济为导向,充分利用和开发其经济价值。进一步

收稿日期:2018-01-05

作者简介:余清(1983—),男,湖北咸宁人,教育学硕士,南阳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大学生德育。

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促进以汉语为主体的信息产业发展,未来会吸引更多的懂汉语并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商外企来华投资,国家和人民会得到更大的实惠。

从政治维度思考,汉语国际传播对维护国家在国际政治权利分配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民族统一等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的语言如果具有国际主导权,就意味着该国家拥有国际社会信息和文化主导权以及政治话语权。然而,据统计在联合国用汉语作为主要语言的会议不到1%。因此,为了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维护中国和谐友好的国际形象,争取中华民族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以及海外华人的政治权益,必须积极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工作。<sup>[1]</sup>此外,汉语国际传播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有意识地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及思想引出国门、推向世界,可以让全世界感受东方文化的睿智与魅力。

## (二)当前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境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对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1987年国家成立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2006年改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孔子学院(课堂)、华文教育和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在汉语国际传播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进一步提升汉语国际传播力度还面临着现实困境。

第一,国家在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上需要进一步细化。无论是正在运行的孔子学院模式、华文教育模式,还是中国文化中心模式,其主要职责和功能在于汉语教学培训、考试以及以国家文化交流为载体的汉语国际传播,缺少对双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渗透,这样就容易造成汉语学习者的两极分化和兴趣导向格局。比如某些国家中上层精英出于外交和个人兴趣等目的,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有较高热情,而普通民众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兴趣去学习汉语。

第二,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辉煌的历史遗产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具体体现在我国与一些国家的历史渊源与现实交往脱节,我国的传统文化文明成果与汉语国际传播现实脱节。比如我国在古代丝绸之路时期就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有繁荣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但由于相关国家的宗教等原因,这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其实是十分有限的;<sup>[2]</sup>再比如在国内语文课中,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引入汉语教学是很常见的方法,但是在汉语国际传播过

程中其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第三,英语仍然对汉语国际传播造成强烈冲击。英语作为世界唯一的“全球通用语”被大多数国家认同,英语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母语是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会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会把学习英语作为第一要务,汉语或者其他国家语言得不到有效的传播和使用。

第四,来自汉语本身的学习难度大,教学资源缺乏。很多外国人都觉得汉语难学,汉字难写,是因为语音上的差异(汉语有声调)以及汉字的书写和翻译较难(世界文字系统大部分是表音文字,而非汉字这一类表意/意音文字)等等。<sup>[3]</sup>在教学资源方面,教材与当地文化结合不紧密、教师的双语教学水平不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不足、师资力量有限等原因都会阻碍汉语国际传播。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语国际传播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综合优势

1.“一带一路”为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目标之一就是要与合作交往国家实现“五通”,然而实现“五通”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相通。北京语言大学王建勤教授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产业合作全球化赋予汉语国际传播以新动力和新内涵。汉语国际传播与“一带一路”是有机融合相辅相成的,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

2.“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我国辉煌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

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塞,开辟了中国与欧亚大陆连接的丝绸之路,丝绸、陶瓷和茶叶等商品伴随着古老的东方文明,与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共同促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逐渐融合并落地生根。<sup>[4]</sup>时至今日,中国建设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宏伟计划,探寻古丝绸之路汉语传播的历史轨迹,重拾历史文化遗产,为当前

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提供了历史借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3.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限制了英语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冲击

“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从宏观合作政策到具体合作项目都以中国为主导。“一带一路”提倡多边合作互惠双赢,吸引了沿线及周边国家的广泛参与。在这种情境下,掌握汉语的国家就会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占得先机,就有可能率先实现“五通”的目标。当然,在这里也不是说完全放弃使用英语,但是可以预见英语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4.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多的汉语国际人才

“一带一路”是深度合作,既有宏观上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也有中观上的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还有微观层面的个人之间的交往,这样就构建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立体大框架。合作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环境等方面,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合作交流,无论涉及什么样的内容,汉语国际人才都会受到关注和重用(这里说的汉语国际人才是指掌握包括汉语在内的两门以上的语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更好地开展合作必须重视汉语学习,本国国民为了更好地获得相关的就业机会必须努力学习汉语,而国内的汉语教学人才也会努力学习第二语言,促进汉语国际传播与交流。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对策思考

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合作优势和平台,把汉语国际传播推向新的高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思考该问题。

1. 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做好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提出“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倡议。汉语国际传播在“语言铺路”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平台和优势,依托孔子学院模式、华文教育模式等开展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截至2017年1月1日,我国在140个国家(地区)共成立了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各有100余个。<sup>[5]</sup>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根据“一带一路”经贸和产业合作格局进行调整,形成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战略格局,以满足周边相关国家对汉语资源的需求。另外,要改进以往地缘政

治的短板,构建和拓展“陆地+海洋”传播模式。历史上我国一直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对海权的开发和经营不够成熟。当古代丝绸之路繁华不再,宋、元两朝曾努力尝试鼓励海外贸易,明朝时期除了郑和实现了远下西洋之壮举,执政当朝严格限制海外贸易,汉语传播就此中止。<sup>[4]</sup>“一带一路”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破传统的以陆地为主的地缘格局,为汉语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渠道,打通了汉语国际传播的海上传播之路,助力国家海权发展与海上经贸繁荣。

2.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推进汉语国际传播

“一带一路”宏观上包括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汉语国际传播除了包括孔子学院及华文教育模式,还包括国家和地区之间签订的经济、政治合作协议,以及文化层面的交流。在合作协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使用汉语和协议国母语进行交流,这样能够直接促进汉语国际传播。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寻求经济利益合作,包括一定的文化交流。企业之间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必须实现语言相通,这样也直接促进了汉语国际传播。这种情况下企业对汉语国际人才求贤若渴,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会招聘和培训汉语国际人才;个体为了更好地获得就业机会,也会努力成为汉语国际人才,在“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大格局下,个体的学习交流与交际交往都会促进汉语国际传播。

近些年来华留学生逐渐增多,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16年全球共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人员来华留学,相比较于2015年总数增加了45138人,增长率为11.35%,其中,在生源排名前15的来源国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了10个席位。<sup>[5]</sup>在“一带一路”政策带动下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主力军,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有效促进了汉语国际传播。

3. 理论联系实际,以各级各类学校为阵地,推进汉语国际传播的教学和研究

国内汉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推广的难度是不一样的,侧重点也不同。汉语国际传播需要考虑对象国的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宗教、文化甚至社会治安,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对待哈撒克斯坦、印度等亚洲国家必须考虑其宗教文化问题;对于沿线欧洲国家近年经济不景气的局势,则要考虑其经济问题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汉语国际推广的理论研究,并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可以依托各级各类学校对汉语国际传播展开理

论研究,并付诸实践。例如,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研究对象国的经济状况、宗教信仰、教育水平等综合因素并形成论文或者调查报告等作为理论参考,在汉语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因地制宜,深度融合;开展汉语国际传播教学技术研究,加强“互联网+”多媒体教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探索引入微课、慕课及翻转课堂的最新教学手段方法,根据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开展双语教学研究,力求在教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实现突破,实现汉语国际传播效率最大化。要加强对汉语本身性质特点的研究,学习汉语首先要了解汉语,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汉语学习难度较大,但是汉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只有充分掌握汉语的性质特点,才能根据其规律进行合理的教学安排,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而顺利开展汉语教学和对外传播工作。

### 三、结语

汉语国际传播是一场持久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国际传播迎来了历史最佳时机。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具备世界眼光,立足国家层面的高度,结合社会组织和

民间力量,加强理论和实践研究,全面推动汉语国际传播。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力度,把汉语国际传播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民生等要素,努力实现对象国经济发展需要汉语,政治活动包含汉语,文化交流使用汉语,实现汉语国际传播由被动变主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推进汉语国际传播。

### 参考文献:

- [1]王振顶.汉语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意义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19):74-75.
- [2]靳风.汉语传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状、问题与对策[D].北京:外交学院,2016.
- [3]王春辉.汉语国际传播为“一带一路”发挥正能量[N].社会科学报,2017-03-16(5).
- [4]王建勤.“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J].语言战略研究,2016(2):33-38.
- [5]李欣.“一带一路”战略下汉语国际传播探索与思考[J].传播力研究,2017(3):24.

(责任编辑 姚虹)

##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SHE Qing

(League Committe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ly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e demand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world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imperfection of top-level design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he advantage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the impact of English and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Chines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chieving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wide, it also provides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 broad platform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internet plus”,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in a comprehensive, multi-layered and three-dimensional way and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will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tegrate deeply.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es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 西班牙语背景学生习得汉语单项状语的偏误特点

高永安<sup>1</sup>, 张 怡<sup>2</sup>

(1.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2. 苏州华东康桥国际学校 国际部中文处, 江苏 苏州 215300)

**摘要:**以哥斯达黎加孔子学院为主的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偏误材料为分析例证,发现错序是主要偏误类型,语义上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占绝对比例,这些偏误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其倾向性甚至集中在几个具体的词上。关注偏误的倾向性和这些词,对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西班牙语;汉语状语;偏误;偏误倾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19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89-06

## 一、引言

母语背景会影响到学生的汉语习得,对不同母语背景学生的汉语偏误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两方面寻找习得的突破口,促进汉语习得进程。近年来,这方面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到处开花,为了找到各地孔子学院学生习得汉语的特点,对偏误进行微观研究,寻找其偏误集中点,以对孔子学院的教师、教材、教学法有切实的帮助,应该是目前比较务实的工作。本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偏误的。

笔者通过考察发现,现已有一些针对某种语言的汉语学习者的状语偏误研究,比如王坤《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语序偏误分析》<sup>[1]</sup>一文中,作者根据状语的不同构成成分把韩国学生的状语偏误分为六种,揭示了韩国学生状语偏误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尹正莉在《汉、泰语状语语序的比较研究及泰国学生习得状语的偏误分析》<sup>[2]</sup>一文中,以汉、泰状语为研究对象,运用中介语和偏误分析方法,从状语的构成成分、状语类型、标志词、单项和多项状语的位置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陈氏璧在《越南学生汉语状语的习得情况考察》<sup>[3]</sup>一文中,运用统计的方法,对越南学生的汉语状语输出进

行考察,分析和讨论了越南学生的状语习得情况,并提出了教学策略。尚慧慧在《韩国来华留学生多项状语语序的偏误研究》<sup>[4]</sup>一文中指出,时频状语、意愿状语、语气状语和对象状语属于高频偏误类别。

笔者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单项状语”界定为用来回答“怎么”“多么”“哪儿”“什么时候”“是否”等这类问题,位于形容词或者副词之前的,一般由介词短语、副词短语、名词短语等构成的单项成分。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任职一年,本文语料一部分来自孔子学院学生的日常作业、考卷及口语展示中的造句及作文素材等,还搜集了哥斯达黎加国立大学、哥斯达黎加中哥文化教育中心等汉语教学机构的资料,语料总计361份,43687字;另外一部分来自本文针对状语偏误研究有针对性设计的调查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sup>①</sup>96份,得到有效偏误<sup>②</sup>743条。

## 二、偏误分布

### (一)偏误类型

我们在所收集到的43687字的361份自然语料中,找到了105条有效偏误,按照偏误的性质分为遗漏、误加、误代、错序四类。其中,遗漏类型的偏误

收稿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高永安(1966—),男,河南驻马店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学和汉语言国际教育。

25 例, 误加类型的偏误 8 例, 误代类型的偏误 11 例, 错序类型的偏误 65 例。<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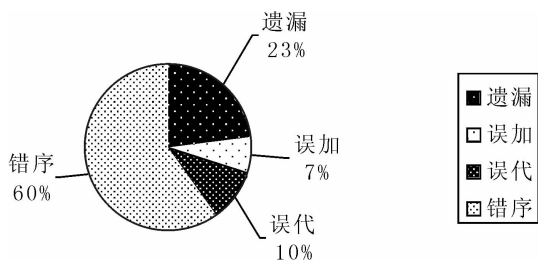


图1 四类偏误在自然语料中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由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所收集的自然语料中,错序类型的偏误最多,占所收集有效偏误的一半以上;其次是遗漏类型的偏误,接近有效偏误总数的四分之一;再次是误代方面和误加方面的偏误,分别占有有效偏误总数的10%和7%。例如:

(1) 错:我都全身不舒服<sup>④</sup>。(正:我全身都不舒服。)

例(1)中副词“都”作状语,位置错误。这是典型的状态错位,但是这个类型的错误数量并不占多数,多数的状语错位是表时间的状语。例如:

(2) 错:我睡觉八点钟晚上。(正:我晚上八点钟睡觉。)

错序是四种类型中数量最大的类型,其实在遗漏型的偏误中,也有一部分可以归到错序里面。例如:

(3) 错:人们习惯照相他们的孩子。(正:人们习惯为他们的孩子照相。)

例(3)虽然可以看作是缺少了“为”,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对“照相”这个词跟它所关涉的对象的位置掌握不好。这么看的话,错序的偏误还会更多。这就告诉我们,错序是西班牙语背景学生偏误的主要类型。在数量上,比遗漏、误加、误代三种类型之和还要多很多。

此外,本文也考察了调查问卷中各类偏误的分布情况,得出以下结果:

表1 问卷调查中遗漏、错序、误加、误代偏误的分布情况

	遗漏	错序	误加	误代
偏误数量	123	262	0	33
占调查问卷总偏误数 <sup>⑤</sup> 的比例 <sup>⑥</sup> (%)	16.55	35.26	0	4.44

从表1中不难看出,在本文的调查语料中,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偏误,错序偏误在总偏误中也占据着很高的比例。

## (二) 组成成分

本文105条自然语料的偏误均属于限制性状语的偏误。我们按照偏误状语的内部结构,把他们分为副词及副词短语、名词及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充

当状语的偏误。

如图2所示,在所采集的有效偏误中,介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所占比例最大,占总偏误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39例;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也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共37例;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有26例,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副词及副词短语作状语的偏误类型则没有特别的趋势。遗漏偏误最多,也只有12例,其余错序11例、误代8例、误加6例。包括1例误代并且错序。例如:

(4) 她非常帮我。(误代:他常常帮我/他帮我很多。)

(5) 她去中国以后,还也没有回哥斯达黎加。(误加:多了“也”。)

(6) 他个子很高,他瘦。(遗漏:应为“他很瘦”。)

(7) 我都全身不舒服。(错序:我全身都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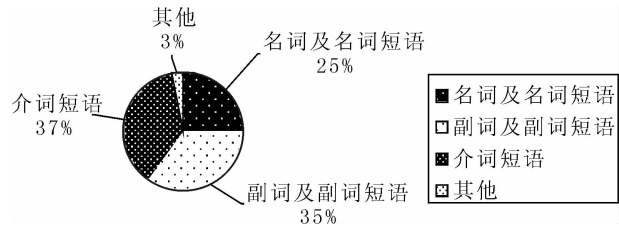


图2 三种结构状语偏误的分布情况示意图

乍一看,似乎各类型的特征不明显,但是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介词和介词短语偏误中,多数是语序偏误(错序),共27例,其余,遗漏12例、误加2例、误代1例。(包括2例错序并且遗漏、1例错序并且误代。)而名词及名词短语作状语的偏误,总共26例,无一例外,全部是错序。这样看来,从状语内部结构显示出来的规律并不明显,相对来说,名词、介词类状语偏误,在偏误类型上倾向性更强一些,副词类状语的各偏误类型倾向性不明显。例如:

(8) 我们去现在还是我们去下午?(时间名词错序)

(9) 聊天儿跟孩子非常有意思。(介词短语错序)

## (三) 语义类型

状语是谓词和谓词性短语前的修饰性成分,其语义类型可以分为限制性和描写性。限制性状语用来表示时间、方式、处所、范围、程度、否定、手段、目的、对象、数量、语气等。而描写性状语主要是用来描写和形容中心语的性质和状态。本文收集的自然语料的状语偏误均为限制性的。按照状语的语义类

型分类,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对象、同一、范围、否定、数量的状语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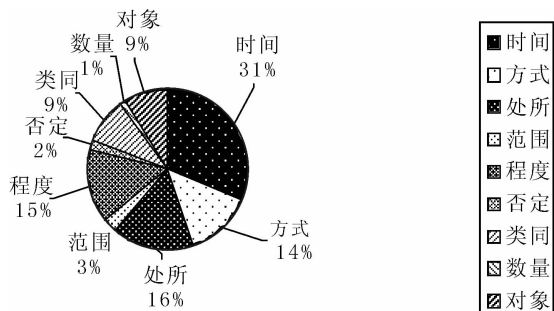


图3 自然语料中各种语义类型偏误的分布情况

如图3所示,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占总偏误数的比例较大。其中,表示时间的状语偏误为32例,约占有效偏误总数的三分之一;表示处所的状语偏误为17例,约占总数的16%<sup>⑦</sup>;表示程度的状语偏误有16例,约占总数的15%;其次是表示方式的状语偏误,为15例,占总数的14%;表示对象的状语偏误为9例,表示类同<sup>⑧</sup>的偏误为8例,表示范围的状语偏误为3例,表示否定的状语偏误为2例,表示数量的偏误为1例。例如:

(10) 昨天是星期日,我起床九点。(时间错序:九点)

(11) 我妹妹学习在小学。(处所错序:在小学)

(12) 我觉得台湾的景观很美丽得不得了。(程度错序:很/得不得了)

(13) 五点一刻我喝咖啡跟朋友们。(方式错序:跟朋友)

综上所述,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偏误中,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其偏误类型以错序为主,偏误的语义类型以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为主;而偏误类型里的遗漏、误代、误加,语义类型里的对象、范围、否定、数量等,则相应数量较少。相对来看,状语的组成成分,即名词、副词、介词短语,三者之间的差距不大。

### 三、偏误原因与偏误倾向

#### (一) 偏误原因分析

中介语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鲁健骥(1984:44-56)认为这些因素包括:(1)母语负迁移(2)所学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的干扰(3)本族或外族文化因素的干扰(4)学习或交际方式、态度等的影响(5)教师或教材对目的语语言现象不恰当或不充分的讲解和训练。现在我们把发现的西班牙语背景汉语学习者的偏误,按照如上的分类作一介绍。

#### 3.1.1 母语负迁移

例如:

(14) 我学习医学专业,还学习汉语在孔子学院。

(15) 李红星期日中午要踢足球和她的朋友。

(16) 我睡觉八点钟晚上。

例(14)的偏误是“在”的使用。汉语中的“在”作为介词指处所时,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一般位于谓语前。而西班牙语中的 en + un lugar (“en” + 地点)一般位于句尾,有时为了强调也可以位于句首。例如:

(14) \* 我学习医学专业,还学习汉语在孔子学院。

译句: Yo estudio médico, y estudio chino en el Instituto Confucio.

对应: 我 学习 医学, 还 学习 汉语 在 学院 孔子。

例(15)的偏误在于,学习者将介词“和”“跟”构成的方式状语放在了谓语之后。介词“和”“跟”表示共同、协同,在西班牙语中用 con 表示。在西班牙语里, con + personas (“con” + 人) 修饰一个动作时,倾向于放在谓语之后。例如:

(15) 李红星期日中午要踢足球和她的朋友。

译句: Li Hong va a jugar fútbol con sus amigos el domingo al mediodía.

对应: 李红 要 踢 足球 和 她的 朋友 (们) 星期日 中午。

例(16)是由西班牙语的时间名词的语序与汉语不同造成的。例如:

(16) \* 我睡觉八点钟晚上。

译句: Duermo a las ocho por la noche.

对应: (我) 睡觉 八点 晚上。

#### 3.1.2 其他原因造成的偏误

目的语知识泛化造成的偏误。例如:

(17) 我寄了他一件礼物。

(18) 请坐,医生看病你一下。

例(17)中,学生在之前学过双宾语动词“给”“送”等,在这里也把非双宾语动词“寄”同等对待。这是由于学生忽略了“寄”本身是不能带双宾语,后面需要用介词“给”引出间接宾语,构成意义上等价的非双宾语句式。可见,这个偏误产生的原因是,学生把双宾语动词的范围扩大了。

例(18)中,“看病”是一个述宾结构的组合,它涉及的对象要用介词引介到动词之前,应该说:“医生给你看一下病。”学生把“看病”理解为一个跟“看”一样的动词,所以把“看”的语法功能转移到了“看病”这个述宾结构的词组上。这也是规则泛化

的表现之一。

回避和简化的策略造成的偏误。例如,有些学生在学习“他在商场买光盘”这样的句子时,因为担心出错而采取了回避和简化的策略,把原本应练习的“在哪儿做什么”的句子拆成两部分,变成了“他在商场,他在买光盘”。

### 3.1.3 偏误原因分析的启示

对偏误进行原因分析得到的一般结论,基本上都可以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上找到答案。因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教学人员要在进行汉语教学之前对学生的语言背景有一定认识,最好作一下语言对比研究,找到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和相通的地方,求同存异,因势利导。

对于西班牙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来说,由于汉语和西班牙语的语言类型不同,首先在表达语序上就有明显的差异。我们的调查已经表明,偏误中的错序是最主要的,其数量比其他几种偏误之和还要多。这提醒教师在教学中进行适当的语言结构对比是很有必要的。而这种比较并不困难,但是得到的效果却可能很明显。这是我们的建议。

另一方面看,目的语规则的泛化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因为汉语的语法规则一般比较细碎,例如,双宾语的规则、离合词的规则、把字句等句型规则、一些虚词的使用规则等,都只涉及部分词语,不能推广,这就要处处提防规则泛化。

既然建立在偏误原因分析基础之上的语言对比、防止规则泛化等努力,需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应对,相对来说,对偏误进行个别处理,找出突出的个别问题,对个别问题进行各个击破,可能是更有效的办法。

#### (二) 偏误倾向

如上所述,西班牙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偏误,在语法上和词汇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可以使我们在对不同语言背景学生进行教学时,更加注意在点的教学上,而不是普遍撒网。从而使教学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找到突破口深入挖掘,逐步扩展。

根据第一节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了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的汉语偏误中,错序的偏误多于其他类型的偏误;在语义上,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在总偏误数中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在对偏误状语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名词类、介词类、副词类分类考察后,发现三类结构的状语偏误数量虽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时间名词、语序差异,还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这个倾向性是和偏误类型结合着

的,可以减少汉语和西班牙语对比工作的范围。例如,我们在教材中设计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多练习语序语法点;在语义类型上,可以多涉及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状语练习,对于范围、否定、手段、目的、对象、数量、语气等的知识就不必大量练习了。

除此之外,一些偏误甚至可以集中在几个特定的词语上,这就给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我们将在下节中作具体分析。

## 四、偏误倾向较高的词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主要的偏误不仅在偏误类型、语法语义类型和组成成分上有倾向性,这些倾向性甚至可以落实到具体的词身上。这一节就来介绍具有倾向性的词语。

### (一) 偏误频率较高的介词

在介词短语做状语的自然语料偏误中,出现偏误的介词主要集中在“在”“和”“跟”“给”等词上,具体分布情况如表格2所示。

表2 介词短语做状语偏误中主要介词的分布

主要介词	偏误数 目(例)	主要语义类别 及数目(例)	主要介词偏误 所占比例 <sup>①</sup> (%)	根据偏误类型的 分布(数目)(例)
“在”	17	处所(15)	43.59%	遗漏4/误加2/错序11
“给”	6	对象(6)	15.38%	遗漏5/误代1/错序1
“从”	6	方式(6)	15.38%	错序6
“跟”	4	方式(4)	10.26%	错序4
“和”	3	方式(3)	7.69%	遗漏1/错序2
“对”	1	对象(1)	2.56%	遗漏1
“为”	2	对象1/目的1	2.56%/2.56%	错序1/错序1

由表格2可知,在介词短语做状语这一类的偏误中,介词“在”构成的介词短语产生的偏误最多,为17例,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50%,主要表示处所,其中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错序和遗漏。其次是“给”构成的介词短语,均为表示对象的介词短语,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15%,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遗漏。再次是表示方式的“从”“跟”与“和”构成的介词短语,主要的偏误类型为错序。例如:

(19)我过圣诞节在我哥哥家。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在我哥哥家过圣诞节。)

(20)留学生喜欢出去玩儿,他们跟朋友也喜欢去吃北京地道的菜。

(状语错序。应改为:留学生喜欢出去玩儿,他们也喜欢跟朋友去吃北京地道的菜。)

(21)她会弹钢琴的人很羡慕。

(介词遗漏。应改为:她对会弹钢琴的人很羡

主要名词短语	偏误数目(例)	主要语义类别及数目(例)	表示不同含义的名词短语偏误所占比例 <sup>①</sup> (%)	根据偏误类型的分布(数目)(例)
表示钟点	14	时间	53.85%	错序(14)
表示星期	1	时间	3.85%	错序(1)
表示日期	1	时间	3.85%	错序(1)
表示时间段	7	时间	26.92%	错序(7)
表示数量	2	数量	7.69%	错序(2)

由表4可知,在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中,偏误主要集中在钟点、星期、日期等表示时间的短语,另外有两例表示数量的偏误。其中,表示钟点的名词短语偏误最多,占这一类型偏误总数的50%以上;其次是表示时间段的偏误,占25%以上。例如:

(26)我来上课六点。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六点上上课。)

(27)你要吃一丸每六钟。

(状语错序、量词误代。应改为:你要每六分钟吃一粒。)

(28)六点晚上,人们一边唱国歌,一边照明灯笼。

(状语错序,动词遗漏。应改为:晚上六点,人们一边唱国歌,一边举着灯笼照明。)

这些偏误中,错序和遗漏的偏误较多,介词短语做状语、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较多,表示时间、处所、程度和方式的状语偏误较多。偏误率较高的介词集中在“在”“和”“跟”“给”等词上,偏误率较高的副词集中在“很”“都”“也”等词上,钟点、星期、日期等用名词或名词短语组成的时间状语偏误较多。

##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哥斯达黎加汉语学生状语习得的考察,对西班牙语背景学生状语习得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从偏误类型来看,以错序偏误为主;从语义类型来看,以表示时间、处所、程度、方式的偏误为主;从结构类型来看,以名词、副词、介词短语做状语的偏误差异不明显。同时,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偏误集中在具体的词上分别为介词“在”“和”“跟”“给”,副词“很”“都”“也”“常常”,及表示钟点、日期、星期等名词短语上。这些偏误的倾向性为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 注释:

①本文认为凡进行有效作答的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 (二)偏误频率较高的副词

在本文收集的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的37例自然语料偏误中,出现偏误的副词主要集中在“很”“都”“也”“常常”等词上,具体分布如表格3所示。

表3 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偏误中主要副词的分布

主要副词	偏误数目(例)	主要语义类别及数目(例)	主要副词偏误所占比例 <sup>①</sup> (%)	根据偏误类型的分布(数目)(例)
“很”	16	程度(16)	43.24%	遗漏(8) 误加(3) 误代(3) 错序(2)
“也”	7	类同(7)	18.92%	遗漏(3) 误加(2) 错序(2)
“都”	4	范围(4)	10.81%	遗漏(1) 误加(1) 错序(2)
“常常”	2	频率(2)	5.41%	错序(2)
“才”	2	时间(2)	5.41%	误代(2)
“一直”	1	时间(1)	2.70%	错序(1)
“一共”	1	数量(1)	2.70%	错序(1)
“非常”	1	程度(1)	2.70%	误代(1)
“不”	1	否定(1)	2.70%	误代(1)
“没”	1	否定(1)	2.70%	误代(1)

由表3可以看出,副词及副词做状语中主要偏误的副词有表示程度的“很”、表示类同的“也”、表示范围的“都”等。其中,关于副词“很”的偏误最多,占这一类型偏误总数的40%以上,主要集中在遗漏上,误加和误代也有少量。其次是关于副词“也”和“都”的偏误,约占本类型偏误总数的18%和10%。遗漏、误加、错序都有一些。例如:

(22)我喜欢多朋友来我的聚会。

(副词的遗漏。应改为:我喜欢很多朋友来我的聚会。)

(23)因为我的语法不好,所以常常我写汉字。

(状语错序。应改为:因为我的语法不好,所以我常常写汉字。)

(24)我们家有四口人一共。

(状语错序。应改为:我们家一共有四口人。)

(25)李建是经理,王红也是老师。

(副词的误加。应改为:李建是经理,王红是老师。)

## (三)偏误频率较高的名词及名词短语

在本文收集的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的26例自然语料偏误中,偏误主要集中在钟点、星期、日期上。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

- ②本文认为凡与本文研究对象“单项状语”相关的偏误均为有效偏误。
- ③其中,包括2例既有遗漏又有错序的偏误和2例既有误代又有错序的偏误。
- ④本文所有例句均来自哥斯达黎加汉语学生的作业、考卷等教学资料及本文采集的问卷资料。
- ⑤问卷调查中有效偏误总数为743。
- ⑥问卷所采集的偏误中有一些残缺较多、难以列入这四类中,故此表的百分数之和无法达到100%。
- ⑦保留整数部分。下同。
- ⑧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2013年2月第2次印刷,20页,“也”的基本意义是表示类同,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情况在某个方面相同。
- ⑨此处是每个主要介词的偏误占介词短语做状语有效偏误总数的比例。因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所以所有百分数相加只有99.98%,不足100%。
- ⑩此处是每个主要副词的偏误占副词及副词短语做状语有

效偏误总数的比例。剩余一例属于书写错误,顾未列入此表。

- ⑪此处是表示每个含义的的名词短语占名词及名词短语做状语有效偏误总数的比例。另外一例偏误属于书写错误,故未列入此表中。

#### 参考文献:

- [1]王坤. 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状语语序偏误分析[D]. 吉林: 吉林大学, 2013.
- [2]尹正莉. 汉、泰语状语语序的比较研究及泰国学生习得状语的偏误分析[D].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1.
- [3]陈氏璧苍. 越南学生汉语状语的习得情况考察[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1.
- [4]尚慧慧. 韩国来华留学生多项状语语序的偏误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ingular Adverbial Errors Caused by Hispanic Learners

GAO Yong'an<sup>1</sup>, ZHANG Qia<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East China Kangqiao International School, Suzhou, Jiangsu 2153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Costa Rican Confucius Institute students as an exampl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ose materials of errors made by Hispanic students. As a conclusion, the author find that the wrong order is the main type of errors,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types semantically representing time, location, degree and manner. These errors have strong inclination and concentrate in some particular word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is making sense to the teaching and textbook – compiling to the Hispanic students.

**Key words:** Spanish; Chinese adverbial; error; inclination of error

# 基于西方修辞学的《曾国藩家书》文本分析

杨跃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在西方修辞学的基础上,从 Lloyd Bitzer 的修辞情境、Aristotle 的修辞三诉诸和 Burke 的认同理论等角度对《曾国藩家书》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得知《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在特定的情形中,针对不同的读者,采取了不同的说服方式,从而更好地起到了劝说的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家书》;修辞情境;劝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0

**中图分类号:**I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95-04

## 一、引言

Aristotle 作为西方修辞学的鼻祖,他将修辞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运用已有的劝说手段的能力”(Rhetoric is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1] 研读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亚氏修辞学的核心是“劝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修辞学越来越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为它不能对很多语言的使用问题做出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修辞学在继承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诞生了。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Burke 大大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将修辞的研究对象扩展为人类的各种交际行为。他的“认同”理论被认为是亚氏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现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辞理论。正如伯克所说,“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2]。修辞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曾国藩家书》作为一种修辞活动,有它本身的修辞特点。《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所写信件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由于曾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学者都对他的家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探究其成功的秘密。纵观国内外对此家书的研究无非是从其教育和

现实意义、军事思想来分析曾氏的思想来源,而且研究人员基本上主要来自中文系和历史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从修辞的视角来分析其家书的。因此,本文在综合中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运用西方修辞学理论来分析曾氏家书,希望能够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为了展示修辞情境、Aristotle 的修辞三诉诸和 Burke 的认同理论等在家书中的具体操作,本文从众多家书中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和《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为分析对象,希望能够揭示曾氏家书的修辞特性并探索其规律,从而对类似家书的写作和批评性解读有所启发。

## 二、《曾国藩家书》的修辞要素

作为一种典型的修辞话语,《曾国藩家书》有其产生的特定条件和背景,即修辞情境。作为一种特殊的修辞话语有其参与者(写信者)和读者。特定环境下的参与者经过互动肯定会产生结果:家书。为此,我们从家书的修辞情境、写信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来阐释家书的修辞特性。

### (一)《曾国藩家书》的修辞情境

修辞情境是西方修辞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我们评析各种各样的修辞事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并且可行的工具。Bitzer 强调修辞话语是情境性的,情境是修辞的中心。他说“修辞作品注重

收稿日期:2017-12-18

作者简介:杨跃珍(1980—),女,河南洛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修辞学及英语写作。

实际效果；它的最终目的是引起某种改变的同时履行某种任务。”与此同时，他认为修辞情景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组合所组成的一种实际或潜在的急缺；如果能够通过引入话语或者象征行为使急缺产生改变，那么这种状况就会部分或完全地消除。归纳起来，紧急状态、受众和限制项是修辞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话语是由情境产生的。而他这一观点受到了 Vatz 的猛烈抨击。Vatz 在《修辞情境的神话》中认为情境是修辞的，语言产生意义而不是意义的效果，修辞决定情境。<sup>[4]</sup> Bitzer 对修辞情景的概念做了详细的界定，Vatz 对其做了修订。对曾氏家书的分析，我们采用他们二人的观点。

众所周知，曾国藩生活在我国的一个内忧外患时期，当时清政府正在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太平军起义盛行，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为了镇压农民军起义，清政府当时派遣曾国藩去和太平军作战。历经 14 年，曾国藩率部成功地镇压农民军。他因此也成为清政府的有功之臣，其权力后来也为清政府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当时的皇帝咸丰曾经说到“镇压了洪秀全，又起来一个比其更可怕的人物，这个人就是曾国藩。”为了向当时的统治者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曾国藩写了上千封家书。曾国藩的家书正是对当时修辞情境的适切反应，也即为了回答弟弟或子孙所提出的问题或遇到的困难并向当时的统治者表明忠心而写。

## （二）《曾国藩家书》的受众和修辞者

在同一修辞情景中有不同种类的受众。可以说，修辞活动是以受众为中心，是受众导向型的。Bitzer 认为，受众是改变紧急状态、解决问题的行为主体。曾国藩写家书的目的就是唤起受众，即读者，认同自己的观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旦离开他们，修辞活动就无法实现其目的。读者在家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受众在修辞学史上不断的演变，但其本质没变，即对造成紧急状态的争议点有兴趣、愿意参与到修辞活动中来，能够受修辞者修辞话语影响并参与到改变现状中来的所有人。就《曾国藩家书》而言，其主要受众是其弟弟、儿子和父母。他们彼此都比较熟悉。以《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为例，信中的主要受众是他的两个弟弟。而事实上，曾国藩的家书不只是写给家人的，其更是通过家书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表明自己忠心的一种方式，我们上面提到过当时的皇帝曾一度担心曾国藩的权势过大危机自己的统治。因此，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曾氏不能明说的隐含受众。而曾氏本

人作为高级官员深知在他成功镇压太平军之后，他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心思缜密的他，在给子孙写家书之时不忘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之心。

“长子如父”是中国的俗语。曾国藩是家中的长子。通读史书，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成功的履行了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和义务。其作为家书的书写者，其修辞人格整体来说是肯定的、积极的，这为其在家书中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昆提利安和西塞罗均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修辞者的为人对于其修辞人格的形成与塑造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昆提利安曾经在讨论修辞教育时下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也就是所谓的“修辞者”指的应当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好人”（A good man speaking well）。根据上面的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修辞应该是道德修养与语言使用技巧的统一体。一个人只有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人品端正、无可挑剔，才可能通过一定的训练成为一名优秀的修辞者。<sup>[5]</sup>人们往往比较容易相信拥有高尚品德之人说的言语。曾国藩自身的言行举止为弟弟树立了榜样，因此他能够比较容易地劝导自己的家人。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修辞者和受众是双向互动的，他们彼此会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 三、《曾国藩家书》的修辞策略

对修辞情景要做出适切的反应。没有适切的反应，修辞情景也不会存在。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运用了不同的修辞策略，我们可以看作是对不同修辞场景所做出的适切反应。Aristotle 提出了三种诉诸方式，分别是理性诉诸（logos）、情感诉诸（pathos）和人品诉诸（ethos）。理性诉诸是以“修辞推论”和“例证法”为形式进行证明的一种劝说方式，是由演说自身所证明或者有所证明而造成的；情感诉诸是通过打动受众的情感来实现的，是由受众所处的某种心境造成的；人品诉诸是通过修辞者好的品德使受众产生信赖从而达到劝说效果，是由修辞者的性格造成的。<sup>[6]</sup>于此同时，Burke 的认同理论也被运用到曾国藩的家书之中，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与“误同”。同情认同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情感因素；对立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人、物或者人的生存环境都可能成为对立面；误同通常的表现形式出于人对自身处境的错误认同上。<sup>[7]</sup>

在《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中，曾国藩用修辞推论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大前提：只有居安思危，身居高位之人才能够长



久。

小前提:我们现在身居高位。

结论:我们需要考虑当前面临的危机。

在《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中,曾国藩也用到了修辞推论来说服自己的弟弟。

大前提:有志气、有决心的人即使身处闹市也能刻苦学习。

小前提:四弟决心努力学习。

结论:不需外出,四弟在家也能好好学习。

在同一封信中,他也运用了同样的策略去说服六弟。

大前提:品德高尚之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为贫苦大众忧心。

小前提:六弟为一次考试失利耿耿于怀。

结论:六弟的焦虑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在《曾国藩家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家中的大哥,他在信中试图用逻辑推理来劝说年轻的弟弟。

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曾国藩家族和睦,子孙繁衍昌盛。这些事实不禁让我们想知道曾国藩是怎样在情感上和家人交流沟通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家书中窥见一斑。这就是他在信中用到了情感诉诸。在《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中,曾国藩用了一些反面例子来劝说弟弟。例如,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最终搞得身败名裂。在这里曾国藩想通过“恐惧、害怕”这种情感来劝说弟弟。Aristotle 曾经说过是恐惧指人或动物面对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自己厌恶的事物等产生的处于惊慌与紧急的状态。通过读史书我们得知,后来曾国藩和他的弟弟虽然控制了军权也没有造反。在《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中,六弟由于考功名失利在信中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曾国藩用尧舜这两位圣人做榜样以让其弟弟产生一种羞愧感。“羞愧是对于自己做的事或别的由内而外感到羞耻和惭愧”<sup>[1]</sup>在信中曾国藩成功地消除了六弟的焦虑,因为品德高尚之人忧虑民族的兴衰而不是计较个人得失。因此,他的六弟一旦和品德高尚之人作对比,就会感到惭愧。与此同时,在信中曾国藩始终将弟弟的兴趣牢记在心。他的这番举动定会被弟弟感知,他在弟弟心中会是一个善良、体贴的哥哥。正因为他在弟弟心中的形象,他的弟弟才容易被他说服。

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失时机的塑造身份权威以影响家庭成员。曾国藩是家中长子,肩负着家庭重任,行驶着父亲的职权。从家书中得知,他在给家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不忘给弟弟和子孙提供精神食

粮,以教育他们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困难。曾国藩用自己的言行来给家人树立榜样确立身份权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弟弟都信任他的原因。比如,在《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一信中,曾国藩通过以自己向身边的朋友和贤人学习并且每天坚持写日记为例,告诫弟弟要向身边的人学习。哥哥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还不忘向他人学习,因此弟弟很容易受感染而听从他的劝告。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家书中所洋溢出来的对家人的善意也是很容易被家人感知的。他写家书旨在帮助家人解决面临的各种各样困难。曾国藩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总是有无限的耐心。总之,曾氏用言行给自己树立了身份权威。

Burke 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将修辞定义为“用话语形成态度诱导他人行动”<sup>[8]</sup>。根据 Burke 的观点,如果你想说服他人,你就要和他取得同一。也即,找到一些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包括意识形态、情感、话语等。因为认识有理性的,和读者在价值、态度、信仰、情感等方面取得同一对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sup>[9]</sup>Burke 的修辞三角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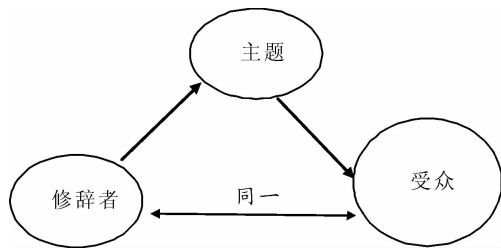


图1 Burke 的修辞三角

在家书中,曾国藩为了说服弟弟,他尽量和弟弟取得同一。作为同一家族中的成员,由于骨子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他和弟弟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彼此同体。相对别人来说,曾国藩更容易和家人达成同一。那《与沅季二弟书(余处高位深悚惧)》为例,这封信是曾国藩身处忧虑状态时所写。担心自己和家人重蹈覆辙,曾国藩在共同的敌人这一方面和弟弟达成同一。而且,曾国藩作为封建体制下的一名官员,他和弟弟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统治者要忠心是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曾国藩运用共同的信仰劝说家人,事实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 四、批评性解读《曾国藩家书》的基本框架

本文在基于西方修辞学的基础上对《曾国藩家书》进行解读,探讨了它的特点和修辞要素,分析表明《曾国藩家书》实质上是曾国藩对具体修辞情境所做出的适切反应,是曾国藩和家人对话互动的结果。由此我们能够归纳出批评解读《曾国藩家书》的基本框架:运用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探索曾氏和家

人互动关系的本质与运作过程。其本质主要探索曾国藩怎样利用不同种类的修辞策略,即劝说和认同,和家人共同建构对话的修辞情境,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实现自己写信的根本目的。它的运作过程需要研究修辞情境的不同种类的制约因素是如何被动态建构起来;受众都有哪些类型以及不同类型的受众都是怎样影响修辞者的;曾氏写信的内容反映了修辞者(即写信者)和受众(即读信人)怎样的互动关系。这种分析方法初步证实了修辞理论在分析具体作品上的可行性,也揭示了《曾国藩家书》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这一框架能在指导类似家书的批评解读上有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ARISTOTLE. Rhetoric [M]. Trans by Roberts W 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 [2] FOSS 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on Rhetoric [M]. Illi-

nois: Waveland Press, 1985.

- [3] BITZER L.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J].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68 (1): 1 - 14.
- [4] VATZ E R. The Myth of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J].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973 (3): 154 - 161.
- [5]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6]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 [M]. 罗念生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7] 肯尼斯·博克.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 [M]. 常昌富, 顾宝桐,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8] FOSS S. Rhetoric Criticis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M]. US: Waveland Press, 2004.
- [9] 邓志勇. 修辞批评的戏剧主义范式略论 [J]. 修辞学习, 2007 (2): 36 - 4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A Text Analysis of Zeng Guofan's Family Letters Based on Western Rhetoric

YANG Yuezh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stern rhetoric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Zeng Guofan's Family Let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loyd Bitzer's rhetoric situation, Aristotle's rhetoric three appeals and Burke's identity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know that Zeng Guofan's family Letters appeals the fact that Zeng Guofan has been adopted to play a better role in persuasion in the case of different readers, and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 words:** *Zeng Guofan's Family Letters*; rhetoric situation; persuasion

# 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广告翻译实践探析

王晓玲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银川 750021;上海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083)

**摘要:**广告翻译越来越多地与跨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深刻地揭示出广告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忽视英汉文化价值观差异、忽视英汉思维模式差异,以及翻译的忠实性问题。为增强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效果,本文提出广告翻译应注重英文广告的功能。在分析最佳关联理论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文本广告译介效果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广告翻译;跨文化传播;最佳关联理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1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099-05

##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语境下,多元文化交流、个体差异需求、高科技传播手段等因素对中国产品在国外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当中国文化伴随中国产品漂洋过海时,附着于产品的翻译工作也需要考量译介过程中的问题。要做好中国著名品牌的对外传播,译者就需要了解、分析并满足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景的消费者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谢天振<sup>[1]</sup>提出的译介学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他指出,译介活动超越了传统的翻译研究,不再是局限于两种语言的转换规律和操作规范,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参照体系下进行的跨文化阐释活动,与国际学术界的两大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相吻合,符合全球化时代潮流。

在译介学理论框架下,产品的广告翻译可以被理解为品牌译介,既包括了品牌产品的广告直译,又包括了品牌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化策略。单纯的广告直译很难在母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产生对等的传播效果,由于文化价值观、英汉思维模式不同,其语言与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异或缺失,译介实

践需要跨文化传播的阐释,增强产品在目的语国家受众当中的印象。因此,将品牌译介单纯地理解为广告翻译、品牌翻译等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实际上,品牌译介是融合了产品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国内对品牌译介研究逐步增多,与其类似的名称有广告翻译、商务翻译、品牌翻译等。其中,蒋磊<sup>[2]</sup>和洪明<sup>[3]</sup>研究了品牌译介中文化因素,洪明<sup>[4]</sup>讨论了目的论维度下的企业外宣广告翻译,吴钟明和邱进<sup>[5]</sup>探索了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国外的广告翻译研究中,Cristina Valdés 将广告翻译置于传播过程、产品的国际化过程视野下,议题涉及广告翻译与本土化行动的关系,文体学与广告翻译,广告翻译与文化思维定势,广告翻译中的创造性,语言、图片、声音等元素对广告文本产生的综合作用等。可以看出,国外品牌译介研究逐渐采用综合性路径,倾向于使用来自文体学、语用学、大众传媒等不同领域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进一步拓展了品牌译介的研究视野。

鉴于目前国内从跨文化视角进行的品牌译介研

收稿日期:2017-12-23

基金项目:2016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一项“跨文化视野下提升宁夏对外传播能力研究”(16NXBXW02)

作者简介:王晓玲(1975—),女,宁夏银川人,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交际、翻译。

究较少,本文从跨文化研究成果入手,深入分析影响广告翻译效果的基本问题和解决策略。跨文化传播学建立于文化研究、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基础之上,对于品牌的翻译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 二、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广告翻译的障碍

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不同国家的产品在跨越国际的传播过程中增进了文化沟通。诸多广告利用文字、图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手段,对受众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广告翻译仍然是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译者探索运用目的语国家的语言来打动受众的技巧,同时,避免广告文本跨文化传播面对的障碍。跨文化传播学的丰硕研究成果为广告译者分析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特色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一)中国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不同,导致译介的受众和目的不一致

跨文化研究学者 Hofstede<sup>[6]</sup>提出的文化价值取向分析了导致各国文化行为差异的四对维度,其中最显著的一对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collectivism/individualism)。大部分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欧美国家属于个人主义文化,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权利与自由受到重视,个体的形象、故事和权益都受到关注。而中国、韩国等国家属于集体主义,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体的利益。与汉语广告文本相比,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欧美广告,译介对象更多的是个体,目的是体现出对个体的关怀,广告文本较多使用面对个体的召唤功能。

跨文化传播学者 Edward T. Hall 提出高语境/低语境学说揭示了不同文化在语言沟通方面特点。高语境文化(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的特点是信息简洁,人们重视的是说话人的经济社会地位或家庭背景等环境及背景信息,而不是“内容”;沟通活动在高语境文化中是含蓄的,人们想要表达的思想 and 内容都蕴涵在背景信息中了。与之相反,低语境文化(德国、北欧、北美等)在沟通中重视清晰、有条理的信息。西方的辩论、演讲和修辞技巧的研究历史长久,与汉语广告文本相比,英文广告文本中更强调直白的“说服”艺术和“召唤”技巧,多使用呼唤性语句。中文广告中多介绍企业获得了“XX省著名商标”“XX省十大品牌”称号等,这些背景信息在高语境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为受众提供更多值得信赖、具有权威性的凭据,但是在低语境的英文广告中,这些称号不是能对受众产生影

响的重要因素,太多这种背景信息只能带给西方受众虚夸的印象<sup>[7]</sup>。

(二)英汉思维模式不同,使得广告文本写作特点不同,为译介效果造成障碍

美国语言学家 Robert B. Kaplan<sup>[8]1-20</sup>在调研了各国学生的写作特点之后,提出母语思维模式会影响语言学习者二语写作的文章结构。其中,英语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式的,英文篇章中句与句之间逻辑性强,倾向于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汉语思维模式是螺旋式的,对一个问题探讨总是使用名人名言、类比修辞、历史典故等方式盘旋在边缘话题,在段落的最后一句才提出真正的观点(见图1)<sup>[8]15</sup>。众多中文广告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忽视了这种思维模式的不同,采用直译的方法,西方受众很难想象到其中的逻辑关系,不知所云,达不到广告应有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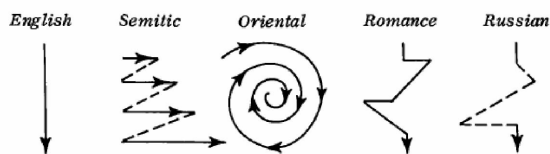


图1

(三)“忠实性”的问题

中英文化价值观、中英思维模式都影响了广告文本对于不同受众群体的传播效果,从而为译者提出新的问题:是应该“忠实”于原文本的内容,还是应该“忠实”于原文本的功能?对此,王宁<sup>[9]</sup>教授提出,译者要适当地把握跨文化阐释的度,因为过度地阐释就会远离原作,而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又很难发掘出翻译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

在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过度忠实于原文本的内容,将原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强行加入目的语广告文本中,会使得文本不符合目的语国家受众的审美,例如中文广告中经常大量使用四字成语和华丽的辞藻,过多的修饰语直译之后并不能在目的语及目的语文化中产生对等的美感,有时甚至忽略了对产品特点的介绍,导致不能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

进行广告翻译的译者可更多地考虑忠实于原文本的功能,应将原广告文本中关于产品的相关信息传递给受众,包括功能、使用方法、文化背景、工艺等,并说服受众购买产品。

为更好地把握广告翻译这一跨文化阐释实践过程中的“度”,广告的功能为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执行标准。Crystal & Davy<sup>[10]</sup>指出,广告的两大大功能

是:传递信息(informing)与说服(persuading),后者还被理解为影响(influencing)。在广告文本中,传递信息功能是指告知产品的功能、用途、工艺等信息,说服功能是指吸引、呼唤、劝说受众购买产品。如果要忠实原文本的功能,则需要调适原文本的内容或翻译技巧,使得目的语国家了解产品,并产生购买欲望。

### 三、最佳关联理论与广告翻译

认知关联理论对广告翻译实践有重要指导作用。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Sperber 与 Wilson 提出了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交际过程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sup>[11]</sup>。而翻译中信息与语境的“最佳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维和推理中付出的努力越小,便能取得最佳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根据认知关联理论,实现品牌译介的最佳关联有两大途径:一、强化语境效果,将广告原文本文本信息最大限度地传递给受众。传递信息是广告翻译实践的重要功能,应尽量将产品的基本信息和主要特征清晰地传递给目的语国家受众。二、减少受众的推理努力。广告翻译与传播应首先遵循行业规则,降低不确定信息,采用行业内、领域内辨识度高的信息,使读者不用花费很多精力去推理就能够理解译文的语境,实现广告译文与语境的最佳关联。

### 四、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广告翻译策略

#### (一)在宏观方面,强化语境效果

1. 在特色广告翻译过程中,要凸显本土化特色。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本土,放眼国际。广告翻译过程中,应掌握国际品牌传播的特点,使用当前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宣传本土品牌,保证品牌的独特性,保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凸显民族和地区特色。例如,宁夏特色产品枸杞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使用 Wolfberry, Goji berry, Lycium barbarum 等几种译法,在经过几十年的大力推广和介绍之后,枸杞的保健功效、在传统中药材中的地位被人们广泛了解,宁夏枸杞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已经闻名遐迩。通过对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和英语国家语料库(BNC)的调查,自 2010 年至今,音译的版本 Goji berry 在口译和文本翻译中已经更多地被人们接受,在数量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其它两种译法。对此,宁夏枸杞的相关产品应该具有足够的自信,抓住时机,在产品广告翻译实践中尽量采用 Goji berry 的译法,凸显本土化特色。

2. 在对外宣传的权威网站上,发布关于该地方

特色文化、特色产品、旅游景点的英文介绍,利用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宣传,扩大认知语境效果,使国外读者了解地方独特的文化、产品和景点。

#### (二)在微观的翻译实践方面,减少受众的推理努力

考察目的语国家广告文本特色,将语言与文化的阻力降低到最低点,翻译技巧包括第一、第二人称的使用、词汇的选择、广告文本的语气等。

1. 英文广告更倾向于使用第一人称“I”“we”,相比之下,第三人称“he”“she”“they”带给英文读者疏远、评判的感觉,而不如第一人称的口吻亲切<sup>[12]</sup>。根据英语国家个人主义文化、低语境文化的特点,在目的语文本中多使用召唤性语句,多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通过这种称呼体现出对个体的诚挚关心和强烈的互动感。当个体感觉到该品牌对自己的尊重和重视时,自然产生共鸣。这样,广告文本就能够将受众纳入到广告文本所勾画的世界中来。

2. 在广告翻译中,译者应牢牢把握广告的功能,在翻译语言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还应提高语言的召唤功能,具体来讲,应多使用感官形容词,多采用能够激发受众情感的内容,以弥补直译在表达感情色彩方面的缺憾。

以某特色旅游景点 XXX 湖为例,本文从中截取一段译文分析。

【原文】新世纪,XXX 湖将遵守“大旅游、大工业、大发展”的原则,贯彻党和国家开发西部战略,在“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基础上,探索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开展“一河两岸十景”活动,让游客欣赏到荷花、沙漠植被、穆斯林风格花园和大草原。为办好 2003 年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将建设大型马术、龙舟、射弩赛场。沙湖景区已被评为区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申请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此,XXX 湖将融合旅游业与生态平衡。热忱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来中国西部 XXX 湖!

【原译文】①In the new century,XXX Lak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ig tourism, big industry and big development” going along with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ouncil’s strategies of “grand development in China’s western part”. ②Unique tourist resources and projects will be explored based on “we will develop what you do not have; we will do better on what you have; we will do in a special way if you do better”. The projects of “one river with two banks and ten grand sight gardens” will be conducted ③so as tourists

can see lotus, sand plants, gardening of Muslim style and large grassland. In order to hold the seventh sports meet for China'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by the year 2003, large scale horse race courses, dragon-boating race course, bow and arrow shooting range will be built. ④The tourist scene of XXX Lake has been approved as the natural protection area at provincial level. It is now applying to be national level. ⑤In that case, it will integrate tourism with ecological balance and at home and Ningxia China overseas and ⑥sincerely hope friends in different fields to come to China's west part as well as to XXX Lake! [13]

【分析】由于XXX湖英文版网页上只有一篇介绍,因此本文将这一英文介绍的功能定为传递信息(informing)和影响(influencing)受众。

①②文中出现的“大旅游、大工业、大发展”“一河两岸十景”等策略常见于政府报告,在汉语中能起到简化、印象深刻的作用,但是目的语国家受众的兴趣不在于了解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具有时效性,目前已找不到其具体内容,建议省略。“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是简单易懂的策略,可以选择更适合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句式,使语句充满自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③荷花、沙漠植被等属于景区的特色景观,要吸引受众,就需要使用华丽、有感染力的词汇,而不是平铺直叙。其次,从跨文化交际心理角度看,2003年的运动会在这段译文中会产生消极的效果,例如:质疑这个网页中信息的可靠性、该景点的工作效率等。因此,建议删去不译。④同样,该景区已在2007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而原文在撰写和翻译时仍然属于申请阶段。建议改译。⑤⑥文末邀请海内外朋友前来游玩,是明显的召唤功能,因此建议在译文中突出这一效果,以热情、诚挚、有感染力的口吻发出邀请。

【建议译文】①In our modern times, XXX Lak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big tourism, big industry, and big development,” going along with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②Unique tourist resources and projects will be explor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What you do not have, we will develop; what you do have we will make better; and what you do well, we will do better.” Our new projects will be conducted to give tourists the best access to ③the stunning scenery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Sand Lake area. ④This area was approved to be national AAAAA tourist attraction in 2007 (The

highest level). ⑤After decades of effort, we hav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with our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 ⑥As a friend from China or from overseas, you'll be delighted by your visit to China's western regions, and in particular to XXX Lake!

3. 根据目的语的思维模式和行文习惯,调适原文本的内容。

例如:享誉海内外的某绒业旗下一个德国品牌XXX网页上有一段该品牌的介绍。

【原文】①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沉稳与热情的民族,②这个民族的人民不会像法兰西人民那样外露、奔放地表现自己的一切成就,③相反地他们只是喜欢“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而已。④XXX诞生于这样的民族,自然也拥有这个民族的某种特性;宁静、热爱生活、喜欢音乐与文学艺术。

【原译文】①German nation is the one with calm and welcoming personalities. ②The German is not as exposed and untrammelled as the French. ③In contrast, they enjoy the feeling of “decent and modest luxury”. ④XXX was born in this nation, and of course it must be possessing the same feature of the nation as be peaceful and love life, music and literary arts. [14]

中文广告原文是典型的汉语思维模式影响下的螺旋式思维模式。先评论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与法兰西民族比较,再提出XXX也具有这样的民族特性。中文广告文本在段落最后一句才体现出来这些民族特性与羊绒品牌之间的联系。但是,英文写作与之是相反的思维。按照英文写作的直线式思维,该文本可以从一开始强调民族特性与羊绒产业的联系,包括与法兰西民族特性之间的联系。为此,建议译文改换外延过大的思维模式,找到每句话主体之间的逻辑联系,缩小范围,不致于让英语国家受众付出很多推理努力,建议译文中将范围缩小至“fashion”。

【建议译文】①Germany is a nation of calm and welcoming people. ②Germany is not as well-known and publicized as the French when it comes to Fashion. ③They enjoy the feeling of proper and unpretentious luxury. ④XXX was born in this nation, and reflects this country and its peaceful love of life, music and literary arts.

## 五、结束语

当广告翻译跨越了语言转换的翻译阶段,进入到跨文化阐释的领域,其翻译实践就需要更广阔的指导,跨文化传播研究为品牌译介的文本翻译提出

了新的视角。这一视角将中文和英文广告的文本特点和中西文化价值观紧密结合,指出了当前中国产品对外译介中的问题及其根源。本文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提出了改善文本广告译介的策略,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 参考文献:

- [1] 谢天振.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J]. 渤海大学学报, 2008(2):33-38.
- [2] 蒋磊. 英汉文化差异与广告的语用翻译[J]. 中国翻译, 2002(3):71-73.
- [3] 洪明. 论接受美学与旅游外宣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关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8):56-59.
- [4] 洪明. 企业外宣广告翻译的目的论维度[J]. 外语学刊, 2006(5):103-106.
- [5] 吴钟明, 邱进. 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2):41-44.
- [6]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257.

- [7] 孙学瑛, 冯庆华. 目的论视域中的企业外宣翻译[J]. 外语学刊, 2014(4):98-102.
- [8] KAPLAN R B.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1966(16).
- [9] 王宁.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 中国翻译, 2014(2):13.
- [10] CRYSTAL D, DAVY D. 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 [M]. Harlow: Longman, 1983:222.
- [11] 熊学亮. 认知相关 交际相关 逻辑相关[C]//何自然, 冉永平. 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1:218.
- [12] GODDARD A. The language of Advertising (2nd Ed.)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13] Ningxia Zhongyin Cashmere Co., Ltd. Philosophie. <http://www.zhongyincashmere.com/en/index.php/52a03a950a>.
- [14] Ningxia Shahu Lake Ecological Tourist Zone. <http://www.nxshahu.com/En/about.asp>.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On the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NG Xiao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Inter-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Now,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is increasingly associated wit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include: ignoranc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values across different languages, ignorance of cultural thinking modes across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 question of loyalty in translation. To achieve better effect in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to emphasize on the function of advertisement in English. Further, in the light of the analysis on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in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

**Key words:** advertising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 中介语心理空间整合模式及教学策略研究

杜学鑫

(南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

**摘要:**中介语现象在二语习得的各个层面都普遍存在,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心理空间理论,分析中介语心理空间整合的四种模式,即M型,T型,M $\leftrightarrow$ T型和M+T型,并以认知语言学和心理空间理论为指导,提出以体验观为中心的教学、重视母语在整合中的作用以及注意文化差异的教学等策略,希望给中介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并为中介语的转化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中介语;心理空间;认知语言学;教学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2

**中图分类号:**G6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04-04

## 一、中介语概述

“中介语”(interlanguage)是Selinker在1969年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1972年Selinker发表了名为Interlanguage(《中介语》)的论文,标志着中介语理论的形成。他指出:“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在结构上处于母语与目标语的中间状态。”<sup>[1]</sup>Selinker认为,学习者形成的中介语知识系统实际上是一系列心理语法,学习者利用这些语法来解释和产出言语。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中介语知识系统包含了越来越复杂的心理语法。这些概念固着下来,就产生了语言僵化、即“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它是指某些非目的语的语法、语音等长期存在于中介语中,并且不易改变的现象。由于存在着语言僵化现象,使得多数学习者不能完全习得目的语的语言。Selinker中介语理论是较早用认知观点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理论模型,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把第二语言学习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中介语的研究才被引入中国。在我国外语界,戴炜栋(1994),束定芳(1994,2004),杨连瑞(1996),戴曼纯(1998,1999)等学者们探讨了中介语的来源、产生模式、中

介语的性质和特点、中介语的石化现象和可变性等做出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学者们没有明确地阐释中介语产生的心理机制的过程,对如何基于认知心理尽快转化中介语也缺乏相关的策略指导。本篇论文旨在以心理空间理论为基础,分析中介语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如何使用认知策略转化中介语,期望给中介语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 二、心理空间理论综述

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是Fauconnier和Turner在1994年提出的理论,指的是我们在思考和说话时建立起来的小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连结,并可以随着思维和话语的展开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改。在生成概念和意义时,概念整合则是对心理空间的基本的认知操作,运用在线的、动态的认知模式构建意义。<sup>[2]</sup>1998年Fauconnier和Turner又提出了心理空间的概念整合理论,他们指出“概念整合”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部分元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概念结构,在此过程中,空间是概念整合的基本理念<sup>[3]</sup>。

概念整合由四个心理空间组成。基本的整合是

收稿日期:2017-12-30

作者简介:杜学鑫(1974—),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与文化。



建立在类比、递归、心理模式化、概念包、知识框架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操作过程,建立四个抽象空间,即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s):输入空间 I(input space I)或称源心理空间(source mental space)、输入空间 II(input space II)或称目标心理空间(target mental space)、整合空间(blending space)等四个空间(见图1)。两个输入空间的对应部分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射连接起来,并投射到因此而形成的两者所共享的空间,即类属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之间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即复合空间,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彼此关联的心理认知过程相互作用,而生成任何独立输入空间都不可能有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这一点,正符合中介语的主要特点——独立性,因此,空间的整合理论对于解释中介语形成的心理机制有着较强的阐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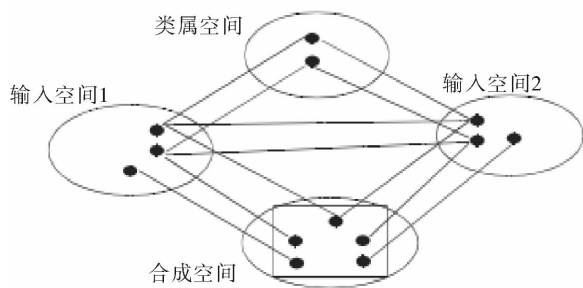


图1

### 三、中介语的心理空间整合模式

Fauconnier 和 Turner 在心理空间理论上发展成为概念整合理论,他们认为,心理空间基本整合模式主要有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四种类型。笔者认为其中的单向型和双向型能够充分阐释中介语系统产生的心理过程。所谓单向型指的是母语或目标语空间中的一个的组织框架被投射到整合空间中,构成合成空间的组织框架。双向型是指母语和目标语两个空间都各自部分投射组织框架到整合空间中,形成合成空间中的组织框架。就中介语的形成来讲,整合空间即是语言的产出,也即中介语。

为了使心理空间的整合机制分析更具操作性,我们把母语系统标记为 M(mother language),目的语系统标记为 T(target language),单向空间整合为 M 型空间整合(母语为组织框架)和 T 型空间整合(目的语为组织框架);把双向空间整合细化为 M $\leftrightarrow$ T 型(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映射为组织框架)和 M + T 型(部分母语和部分目的语为组织框架)。即中介语形成及发展主要以 M 型、T 型、M $\leftrightarrow$ T 型和 M + T

型四种空间整合方式而产生的。

(一)M 型整合:以母语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因母语的知识系统固着在学习者头脑中,M 型整合在中介语中很常见,他们是 Selinker 理论中提到的母语负迁移,这种整合思维模式几乎存在于中介语的各个层面。

例如中文中的“科学研究”包含了两个名词,初学者常常误译为“science study”,英文中正确的说法应为“scientific study”。

在单向网络中,母语句法的特色被投射到整合空间,指导着英语句子的使用。例如:

- a. The teacher starts a new lesson. (正)
- b. The teacher start a new lesson. (误)

由于英语的谓语动词存在人称、数和时态的变化,这种语言特点和母语的句法特点发生了冲突,初学者不习惯于这种特点,仍然用以母语空间中的语法结构来产出二语,因此造成使用错误。

(二)T 型整合:以目的语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这种情况出现在表达英语的特有结构时,因为学习者无法从母语空间获取相关的组织框架,只能从目的语心理空间中寻找资源,但因为使用不熟练,就容易泛化一些规则。例如:

\* Please tell me how can I get the apple? (语序错误)

这个例子即是目的语心理空间中的规则投射到了整合空间中。因英语中一般疑问句是情态动词置于主语的前面,学习者把这个规则扩大化了,即便疑问句充当了宾语从句,仍然使用单独疑问句型的句式来构建句子。随着二语学习时间的增加,慢慢地学习者掌握了更多的规则后,这种中介语现象会逐渐消失,石化的可能性比较小。

(三)M $\leftrightarrow$ T 型整合:以母语和目的语相互映射为基础的空间整合

母语和目的语作为进行概念整合的两个输入空间,同时存在于人的心理中,在语言产出时,大脑启动了对比认知的功能,发现两种结构的相似性,两种语言的元素相互映射,以此相似的结构为基础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中介语。这是 Selinker 理论中所说的正迁移现象,这种整合模式有利于有效地学得目的语的结构。

例如单词 bay [bei], tea [ti:] 等的发音,在英语语音系统中存在元音加辅音的拼读系统,而汉语语音系统大多是声母和韵母相拼读组成一个汉字的读音,学习者在这两种系统间建立了身份连通关系,以这种抽象的组合结构指导英语发音的拼读,比较

容易习得。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虽有相似,但单个英语的元音和汉语的韵母、声母和辅音在发音特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教师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不能让学生想当然地认为两者是相同的。

(四)M + T 型整合:部分母语和部分目的语的组合为组织框架的空间整合

这种心理整合模式是一种截搭式的整合,即把母语空间的一部分结构和目的语空间的一部分接在一起,是一种没有规则的混合形式,初学者出现这种现象的随机性比较强,是一种语言救助策略,但一旦出现次数过多,并且得不到及时转化,就会发生石化。

语篇层面上的 M + T 型整合模式比较明显,它表征出的语言现象体现了肉是英语,骨是母语的特点。例如,一些学生意识到英语议论文段落中常有主题句,于是每段中第一个句子用主题句表达,但是由于受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在段落的扩展句或结束句写作时,仍然按汉语的逻辑和陈述方式。例如:

I like sports at college. When I entered college, I found there were many kinds of activities. But if you ask which kind of activities I like, I will directly tell you that it is sports.

在这个段落中,第一句是主题句,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但后面的叙述是典型的汉语逻辑,而不是按照英语扩展句的写法来展开的。

#### 四、中介语转化的教学策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语学习和产出中形成四个心理空间,人的认知系统启动对比、类推、模仿等认知机制,把母语或/和目标语空间中的规则作为组织框架来组织语言元素,因此中介语心理空间组织框架的生成、以及中介语语言体系的构建与母语和目标语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基于此,作者提出以下的教学策略以尽快转化中介语。

##### (一)以体验观为理论指导

早在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有这样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主要阐述了相对主义的观点,即任何事物的真假是非都是相对于人来讲的。这种论述,相当于认知语言学家们强调的“体验性”——呈现在人类眼中的世界是人体验中的世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更强调语言的体验性、认知性和象似性,认为语言是主客观互动的结果,人基本的认知能力造就了语言。认知语言学的观念更科学地反映了语言的本质,解释了语言的生成过程<sup>[4]</sup>。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点认为:通过身体的体验,人类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这种

语言的体验观使教师能够了解到语言的本质,对于语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的教学不再是填鸭式的教学,课堂会充满了生机和人文气息,也容易提高学习的效率。

(二)注重学习过程中的母语和目的语的比较分析

从体验观可以看出,人的知识来自体验,即使是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们,也存在着相似的对外部世界以及内心世界的经验,因此,他们的语言结构或规则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上文指出的中介语的心理整合模式“ $M \leftrightarrow T$  型整合”,正是这种语言的相似性在心理空间中的反映。

从历史上看,对于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问题的处理常走极端——排斥或依赖。当前所采用的教学法,如听说法、功能意念及交际教学法等,皆是主张母语应该不用或尽可能少用,但是英语教学效果却不如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

在目的语产出过程中,大脑启动认知机制,从母语和目的语两个输入空间选择结构投射到中介语空间的投射,而二个空间的相似性,使得其中的元素发生身份连通。以合成词为例,母语和目的语的构成都是两个词素相加而成,因此,学生能够比较快的理解和掌握诸如 bookstore, blackboard, snowstorm 等的词义。在此过程中,学生有可能会把英语和汉语的相似看作相同,这才引起了中介语的产生。比如,greenhouse 一词,一些学生还以两个词义相加来理解合成词的词义,但其实它的意义是“温室”,而非“绿色的房子”。这就需要教师及时地向学生阐释两种语言构词法及意义理解上的不同之处,及时纠正错误,避免中介语僵化。

##### (三)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

文化因素在二语学习中起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心理空间整合的过程。王初明教授提出“补缺假设”,指出在外语习得和使用的过程中,母语语境知识介入补充所缺乏的二语文化知识,从而激活与母语语境知识配套的母语表达形式<sup>[5]</sup>。因此,由于受到母语文化参与空间的整合,中介语也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例如英美文化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low - context cultures),而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high - context cultures)。低语境文化的表达方式较直接、明示,而高语境文化的表达方式较委婉、含蓄。因此,在语言交际中,中国的二语学习者由于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而倾向于使用模糊的语言,或者使用较多的比喻、暗示。而英语国家的人更多的

是直抒胸臆,例如:

Mr. Jones: It looks like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the production line running on Saturday. (约翰逊先生:似乎周日我们还得加班。)

Mr. Wu: I see. (王先生:我知道了。)

Mr. Jones: Can you come in on Saturday? (约翰逊先生:你周日能来吗?)

Mr. Wu: Yes. I think so. (with a hesitant tone) (王先生:嗯,我想可以的吧(略带犹豫))

Mr. Jones: That'll be a great help. (约翰逊先生:那真帮了大忙了。)

Mr. Wu: Yes. Saturday's a special day, did you know? (王先生:周日是个特殊的日子,你知道吗?)

Mr. Jones: What do you mean? (约翰逊先生:你说什么?)

Mr. Wu: It's my son's birthday. (王先生:周日是我儿子的生日)

Mr. Jones: How nice! I hope you all enjoy it very much. (约翰逊先生:太好了!我希望你们能玩得开心。)

Mr. Wu: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王先生:谢谢,多谢理解。)

上面的对话中,吴先生把中国典型的隐晦表达请示的方式带入了心理空间的整合之中,因此,虽然他英语表达对了,但话语却没能表达出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低语境的约翰逊先生并不知道他是在以这种方式请假,因此,也没有批假,只是口头上祝福了他们。但吴先生以高语境文化的方式理解了约翰逊

先生的话,以为约翰逊先生答应了他的请求。因此,说话双方都错会了对方的意思,造成了交流的误差。因此,在使用二语交往中,要时时警醒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文化差异,避免母语文化进入心理空间,形成组织框架,指导话语的产出。

## 五、结语

本文基于心理空间理论对中介语形成的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提高中介语转化和提高二语产出的正确性和得体性也提出了一些策略。中介语的转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习者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投射不断地调整,合成空间合成的中介语也不断地接近目的语,这既需要重视基于体验观的教学,也需要对母语的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教师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本文从心理空间整合的新视角分析中介语以及其转化的策略,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给中介语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也希望能给二语学习者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1]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10).
- [2] FAUCONNIER G.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8).
- [3]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J]. Cognitive Science, 1998(2).
- [4] 霍姆.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教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4).
- [5] 王初明. 补缺假设与外语学习[J]. 外语学刊, 2003(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Research on Inter - language Mental Space Integration Mode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DU Xue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Henan 473004, China)

**Abstract:** Inter - language prevails in all level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our integration patterns of mental spaces based on the Mental Spaces theory: M pattern, T pattern, MT pattern and M + T pattern. Instructed b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Mental Spaces theor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teaching centered with the experiential view,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 language and keeping awareness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 - language research, and also gives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r -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nter - language; mental spac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teaching strategies

# 国防教育的综合素质培养功效研究

陈云雁

(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 郑州 450000)

**摘要:**国防教育是一项承载着特定价值目标和任务的全民性社会教育活动。作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国防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形式。对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了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学校国防教育为切入点,从实施国防教育的背景和必要性、国防教育的开展形式、国防教育的育人功效、国防教育对于学校培养模式的影响四个部分,深入探讨国防教育在学校开展的意义和作用,并给予国防教育一个新的认知和定位。

**关键词:**国防教育;育人;培养模式;综合素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3

**中图分类号:**E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08-04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国防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基本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当代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国防教育在学校人才培养中的地位 and 作用十分重要,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高质量的国防后备人才及加强全民的国防知识、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的国防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开端,搞好学生国防教育关系国家国防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 一、学校开展国防教育的背景和必要性

国防教育是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国防教育。195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对大、中学生在学期间的军事训练项目有明确要求;1985、1987年国家又颁布了针对大、中学生的训练大纲,使学生军训更加规范;1999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规范

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继续搞好军训工作并使之制度化”;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并明确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旨在培养和增强学生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意识,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和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2014年7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防动员委员会修订印发的《全国防教育大纲》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在完成规定的学时外,应当积极开设国防教育选修课”;2016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防教育特色办学先进单位认定工作,拉开新一轮全国学校国防教育与实践的新高潮。由此可见,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的安全观也应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土安全、政权安全、国防安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还包括金融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代表了国民的民族精神状态以及国家责任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

收稿日期:2017-12-10

作者简介:陈云雁(1965—),男,河南许昌人,硕士,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从事学校国防教育工作。

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教育是基石,高素质的国民是前提。青年学生是未来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核心力量,因此必须培养青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其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带给人类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互联网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工作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互联网开放性的特点,通过网络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和思想植入,从而使其价值判断产生重大影响。在国际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和所谓的民主自由大行其道,通过有计划有预谋地散布有关我国的虚假信息 and 流言,抹黑我国形象,诋毁我国国家制度和文化,动摇青年学生的信仰,从而使其对我国的文化、制度和道路产生怀疑,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命运以及社会发展漠不关心,甚至走向对立。从国家的安全稳定发展出发,在网络时代必须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 二、学校国防教育的开展形式和途径

(一) 开展国防形势教育,加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

### 1. 利用课堂教学进行引领,占领学生思想阵地

国防教育课程化。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阵地,国防教育理论与实践课是向学生进行国防知识传播的一种必要形式。课程设置中要充分考虑到国防教育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例,在授课形式上,采取分班授课和大型讲座的方法。开设思政类、国防知识类、军事类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通过组织国内外形势专题讲座、邀请英雄人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强化青年学生的忧患意识、国防安全意识,坚定其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从而激发其为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责任与担当。

### 2. 营造浓厚的校园国防文化氛围

开展以爱国主义、社会责任与担当、制度认同、道路认同、民族文化认同、军事知识竞答等为主题的演讲、辩论、知识竞赛等活动,在活动中就青年学生的认知误区进行阐释、辩论,通过活动的开展达到统一认识、凝神聚力的效果。以社团活动为载体,成立国防教育、军迷天地等兴趣小组,宣传国防教育和国

家安全知识;组织军事题材观影活动、时事论坛、国防、军事图片展等,营造浓厚的校园国防文化氛围,使得国防教育意识深入人心。

## (二) 开展军事训练,炼其体质磨其意志

学校军事训练主要是指军事队列训练。包含队列动作、队列指挥、队列纪律三项内容。着装统一要求、动作统一标准、执行统一口令、动作整齐划一、令行禁止是队列训练核心要素。通过严格的程序化的队列训练能够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组织纪律观念,培养善于团队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实践证明,军训是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极好形式。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对于青年学生的意志品质来说是巨大的的考验,通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通过流汗流血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瞄准第一等价值观的建立,青年学生在意志品质上得到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这种意志品质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难题,激励青年学生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努力攀登,为他们踏上工作岗位、走上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军训还有利于塑造集体主义精神。军训是统一着装、统一标准、统一口令、统一动作的集体活动。在这项集体活动中,学生身份统一,通过接受指令官的口令统一动作,接受军队条令、纪律的约束,按照规章制度行动。个人生活在集体中,相信组织,依靠集体,关心集体,维护集体,不断矫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习惯,不断克服个人主义,通过把个人摆进集体中,逐渐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了良好校风、班风建设,促进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 (三) 国防教育生活化,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防教育生活化是指学校有选择的借鉴军队对军人的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主要包含:起床、早操、整理内务和洗漱、开饭、午休、就寝、室内外卫生制度、请假、班务会、晚点名等内容,学生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对学生一天中生活的每个节点都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在校生以独生子女居多,家庭人口结构大多属于“4-2-1”模式。家长对于孩子的照顾、管理过于精细,基本处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状态。这样的成长环境导致孩子们独立生活能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长期“小皇帝”“小公主”的生活养成了孩子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定势,难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难以和他人进行合作,缺乏团队和集体意识。准军事化管理从一日生活的诸多细节入手,从看似简单的吃饭、睡觉、卫生入手,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养成,独立生

活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约束有了很大的提高。

### 三、国防教育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 (一) 国防教育在学生德育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国防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体现了国民对自己祖国的浓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当代,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国防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忠诚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军尚武的民族气质,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从而坚定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理想信念。

国防教育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内容,对坚定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通过学习我军的发展历史、建军原则、优良传统以及我国国防建设现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处理好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个人理想与民族前途之间的关系,树立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国防意识,建立自强不息、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

国防教育以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主要形式。在整个训练中,严格的集体生活、标准的内务管理和频繁的评比竞赛,使学生自觉把个人融入到集体之中,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在团体实践中对集体主义的感悟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使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 (二) 国防教育在学生智育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军训有利于知识学习。军训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学生的知识学习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主要作用有:军训培养了青年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自觉意识,经过刻苦训练,身体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身体强壮了,精力充沛了,学习效率得到了提高;紧张有序的军训生活节奏使学生学会了科学利用时间。军人的铁的纪律和挤时间的“钉钉子精神”,使学生们受到启发,找到了成功的秘诀。军训使他们获得了攀登书山、搏击学海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在军训中得到了启迪:明知学海无涯,偏要竞舟苦渡;明知书山险峻,总要奋力攀登。与惊涛搏击,与激流抗争,历尽艰险,矢志不移。

国防教育是涉猎知识范围广博、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学习这方面内容有利于扩大学生知识面,很好地弥补学生单纯学习书本造成的知识建构

单一的问题,对提升学生的智育,特别是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具有独到的作用。对于打破专业知识学习的思维定势,拓展思维空间,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三) 国防教育在学生身心健康素质培养中的功效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身体、心理及对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学校国防教育在培养学生身心健康方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军训要求学生做到一日生活条令化,从作息时间、内务卫生、军容风纪、操练上课都有特定的标准,站、坐、立、走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些标准和制度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行为习惯,这些习惯为学生的身体发育、健康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军训内容单调枯燥,运动量很大,长期的艰苦训练,锤炼了意志,强壮了体魄。

### 四、国防教育对学校培养模式的影响

#### (一) 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军事课课堂拓展性育人培养模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打破了教室单一空间带来的教学局限性,使学生的活动场所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所学知识也不仅限于升学知识和技能,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国防教育不仅拓宽了课堂的范围和空间,更丰富了教育的形式和内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热情,有效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对培养有理想、有信仰、有知识、有能力、高素质的国民奠定了基础。

#### (二) 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身份形象性育人培养模式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学校育人的重要部分。学校国防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的切入点。学生通过国防理论课程选修课学习,了解我国、我军历史,感受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从战火中奋起,从废墟中挺立,从屈辱中新生的中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深刻体会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激发自己爱国、爱党、爱军的革命豪情,坚定自己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的坚定理想信念。在军训过程中,学生统一着装,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令行禁止,按照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些措施和行为有利于学生深入角色、身临其境,潜移默化中从形象上到思想上用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向军人靠近、看齐。

#### (三) 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内容直观性育人培养模式

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广阔的天地、绿色的军装、神秘的武器、激昂的军歌、紧张的生活、变幻的

战术、艰苦的拉练等,激情澎湃又惊险刺激的教学形式打破了课堂单一灌输知识的教育模式,使学生有了不一样的教育体验,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宽了认知渠道。

身体力行,以身示范是军训最为鲜明的特征。一个个与青年学生年龄相仿的解放军战士作为教官,与他们一起训练: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直观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正因如此,国防教育在育人中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

(四)国防教育充分发挥了课程实践性育人培养模式

用理论知识占领思想阵地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实践,一切理论都是空中楼阁。学生教育尤其应该知行合一,理论实际紧密结合。国防教育在课堂外注重组织学生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如参观当地的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学生到部队参观学习,感受军队国防教育文化的熏陶。这些活动的开展,既可以达到通过环境教育人、感染人的目的,也能满足青年学生对国家军事力量的好奇,潜移默化中增强青年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认清国际形势,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促进对课堂理论学习内容的理解与吸收。

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同样也体现出较强的实践的特征。在齐步、正步、跑步、转体等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中,通过千百次动作的重复,将身体的实践认知上升至思想认知的高度,将标准、纪律的观念融进血液,使之不知不觉的成为一种意识。起床、吃饭、内务整理等日常生活都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通过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使得习惯成自然,从而

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五)国防教育充分发挥效果的多样性育人培养模式

经过30多年的以学生军训为主体的国防教育实践证明,学校国防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学校国防教育是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措施之一,学校国防教育已成为学校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6年全国首届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的遴选与认定,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防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所占地位也会愈加重要。

参考文献:

- [1]陈云雁.基于CiteSpace的我国国防教育学术演化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6,33(6):87-90.
- [2]邵灵红,欧阳美平.高校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关系新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58-60.
- [3]魏海琴.论国防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02(4):43-44.
- [4]于晓东.高等院校国防教育的育人功能[J].教书育人,2013(9):22-23.
- [5]周艳玲.论高校国防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原则[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2):126-128.
- [6]陶娟,曹乾坤.论高校国防教育实践育人工作的模式构建[J].科技创新导报,2014(15):116-116.
- [7]王明明,蒋平成.新形势下高校国防教育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模式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276-28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Eff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CHEN Yuny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Zhe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is a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y carrying special value goals and tasks. The school defens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and it is an effective form of strengthening th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t has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With the school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we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necessity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e developing form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on school training mode. Finally, we summary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give a new cognition and orientation for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educating people; training mode; comprehensive quality

#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引领高等教育实现新发展

陈连喜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郑州 450056)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 强调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十九大精神; 高等教育; 新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4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12-03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创新和教育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和关键的组成部分。再次明确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 强调教育事业放在优先的地位,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这必将推动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 成为我们推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和教育强国的强大动力。

## 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发展教育的新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sup>[1]</sup>第一个问题是论述教育的, 共304字。报告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的历史任务是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 必须把握教育历史定位, 明确教育根本任务, 理解教育本质要求, 突出教育中国特色, 推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站在“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sup>[1]</sup>的高度上, 鲜明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sup>[1]</sup>, 并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习型社会等方面, 明确提出了下一阶段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和任务,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优先发展教育

的坚定决心, 为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更高要求。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重点工作就是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提高教师素质, 在全社会倡导尊师重教, 完善资助体系, 决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办好继续教育, 建设学习大国、学习型社会, 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以指导学校教育实践, 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 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立德树人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sup>[1]</sup>。因此, 新时代下, 学校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引导学生

收稿日期: 2017-11-12

作者简介: 陈连喜(1964—), 男, 河南鄢陵人,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教学管理和政治理论教学。



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以及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帮助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要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不忘“育人”这一初心,从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中进一步把握育人的要求,在学生人生成长的“灌浆期”给予正确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确保学生时刻响应党的号召,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有家国情怀、有时代担当、有过硬本领的年轻一代。

新时代,要坚持立德树人,必须抓好三个关键:

第一,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要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的全过程,要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和组织育人的联动与融合,让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更加深入人心、真正取得实效。

第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对学生发挥着言传身教、行为引导作用,教师的示范引领效应,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按照十九大报告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sup>[1]</sup>的要求,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事业发展的“牛鼻子”,以更大的力度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把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积极传播者,努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

第三,要在创新上下功夫。要适应时代化、网络化、个性化的要求,在继承中创新思政工作的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充分运用学报、校园广播、门户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技术、党团活动基地等平台,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和平台,创新宣传手段,既要旗帜鲜明地突出主题、体现高大上,也要形式多样地追求实效、做到接地气,真正使学校人才培养始终紧扣国家的目标和社会的需求。

### 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高等教育的新部署

报告强调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sup>[1]</sup>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践行“四个服务”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加快“双一流”建设,建设公平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强国目标发挥应有作用。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一种以质量保障和提升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根本要求就是: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理念,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注重创新,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内涵式发展道路。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是更高质量的教育。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实现“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主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新育人理念,创新育人方式,改善育人生态,提高教师素质,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升育人水平。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围绕学生发展核心要素,着力培养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品格和关键能力。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出现重规模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教学、重智育轻德育等现象。因此,必须坚持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质量的根本标准,切实转变人才培养观、教学方法观、学生就业观等观念,有效强化市场意识、实践意识、国际意识等认识水平,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着力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二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创新专业培养模式上下功夫。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sup>[1]</sup>。贯彻十九大精神,必须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科学确定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创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行校企一体化育人,推进“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培养,积极推动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在大中型企业开展产教融合试点,推动行业企业与学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技术创新基地、科技服务基地。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改进专业培养方案,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和学习支持体系。以增强学生核心素养、技术技能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为重点,统筹规划课程与教材建设,对接最新行业、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优化专业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要探索科学基础、实践能力和思想品德、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培养模式,推动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育人。各地各高校要根据本校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改进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就各类专门人才。

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大批卓越教师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sup>[1]</sup>的战略目标,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根本,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基础和关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要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要落实好“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的要求,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要从教师实际需求出发,认真分析各级各类教师教育的短板,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以提高素质能力为核心,全面加强教师教育,加强培养培训,创新方式方法,分类提升教师的素质能力。要着力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二是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青年教师关心的成长环境问题、专业发展问题、生活条件问题等。三是要增强教师队伍活力。深化教师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创新教师薪酬激励机制,建立体现增加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加大对教学型名师的岗位激励力度。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把创新摆在学校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sup>[1]</sup>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规律,都迫切要求加快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突破口在于优化结构,要把结构的调整优化、提升作为主攻方向,自觉克服片面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惯性,着力克服分散和低水平重复问题,突破体制制约,在学校内部实现协同发展。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在制度设计、办学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方面推进改革,摒弃“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建立以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育模式,坚持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把握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并将其同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有机结合,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以实际行动落实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在新的阶段,我们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提高办学质量作为高校发展的核心目标,把改革创新作为高校发展的强大动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断努力。

####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许峻)

## To Realize a New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19<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s Spirit

CHEN Lianxi

(Henan Judicial Policeman Vocational College, Zhengzhou 450056, China)

**Abstract:** The 19<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a basic projec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build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The report emphasizes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offering a good higher education which can satisfy the people's need. Guided by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s spirit, we must carry out the great policy of the Par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trengthening morality, and realiz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19<sup>th</sup> CPC National Congress's spirit; higher education; new development

# 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其途径探索

王丽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郑州 450044;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功利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注重实效、积极竞争的特点,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当前功利主义所带来的“极端利己主义”“金钱至上”等负面效应已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青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探究功利主义成为当代青年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障碍的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意识到,青年价值观的构建不是简单的说教过程,必须与实际紧密结合。要敢于创新和突破,尽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引导青年正确把握人生的航向,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功利主义;当代青年;价值观;影响;途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15-06

作为近代政治思想核心之一的功利主义对西方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功利主义思潮也给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青年对功利主义的社会思潮表现出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对其认可度和接受度也逐渐增加。但是,功利主义在为青年人带来注重实绩功效、敢于竞争、乐观积极进取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的负面影响。

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功利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辩证看待功利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全面分析其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多角度探索方法措施,引导青年树立科学合理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 一、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双重效应 任何一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总能催生新的

价值观念产生。西方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导向,从传入伊始就对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功利主义对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形成了乐观、积极竞争、注重效果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也产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消极的价值观念<sup>[1]</sup>。

### (一)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积极影响

功利主义的一些正确思想,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生活实践中的价值,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肯定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逐步渗透到青年的思想观念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带动和影响到了其诸多方面的行为与选择。具体表现为:

#### 1. 价值取向的个体地位的显著增强

计划经济时期,主流舆论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至上,不重视个人利益。青年人将个人的利益看得很轻,并且对自我存在、个人利益持否定态度。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广大青年深受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2016-JSYYB-201);2016河南省教育信息技术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1352016127);2017年中州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丽丽(1981—),女,河南平顶山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个性被较大程度地释放,强烈的自我存在意识被唤醒,积极的竞争意识被激发<sup>[2]</sup>。他们转向社会利益和个人价值相统一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摒弃保守、等待、退缩和依赖等消极思想,转而树立积极拼搏、永争上游、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竞争理念。青年价值取向逐渐向个体化发展,其主体地位明显增强,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开始向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转变。

## 2. 价值取向的务实性现实化目标愈发明显

当今青年的价值取向目标逐渐向现实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务实性。改革开放以来,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广大青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注重实效”“注重利益”“贴近现实”,反对“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以及“劳而无功”等思想,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这些对青年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能有效地刺激青年的进取心<sup>[3]</sup>。同时,以实际效果作为考核标准,这也对我们青年的一些落后的传统劣根性、内心的惰性、消极颓废和懦弱、依赖家人的惯性等形成了挑战,直击其要害和病处,从社会层面上迫使其“穷则思变”,形成具有十分强烈的关注实际生活和实际效果的现实品格,而这也是促进青年全面成长、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利因素。

## (二) 功利主义对当代青年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

功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逐渐浸染,深刻影响着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由于青年自身成长阶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很多时候还不具备足够的辨别能力和强大的抵抗力来应对功利主义各种形式的负面影响,因而会受到功利主义的一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政治价值观逐渐淡漠

新时期青年受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大多数都拥有坚定和正确的政治立场。但是受功利主义影响,部分青年的政治价值观更多地建立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其政治价值观被赋予了浓厚的实用色彩。

部分青年入党动机实用化、功利化,他们将入党看作自己今后求职发展的政治资本,把入党当成跳板,而并非是真正确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党的纲领和章程。这种观念导致部分青年政治参与积极性较低,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的制定缺乏参与热情,而更多关注自身利益。再比如部分青年看待政治问题过激化和片面化。他们常从功利视角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一切政治现象和社会问题。这就导致部分青年不能采取辩证

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对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和因素往往采取偏激和片面的态度来对待,甚至冷漠旁观,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存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态势等问题没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sup>[4]</sup>。

### 2. 道德价值观存在困惑

伴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被部分青年人所接纳并且世俗化,在自身价值的选择、评判外在事物价值的标准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等方面都采用功利化的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青年的价值目标选择出现了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绝大部分青年在确定价值目标时,出现了由侧重理想向侧重现实转变,由追求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向追求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转变,并在具体践行过程中由侧重奉献向侧重享受转变。他们更侧重“物质快乐”的选择,崇尚“金钱至上”<sup>[5]</sup>。在社会理想方面,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出现动摇,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他们往往将社会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当作人生价值的标准。在人际交往方面,部分青年崇尚所谓“快餐式恋爱”“8分钟交友”,目的性极强,追求速成的“关系”和“友谊”,崇尚“短、平、快”的恋爱享受,这种交往观念往往不可靠,甚至有庸俗、低俗化趋势<sup>[6]</sup>。

### 3. 职业价值观不断扭曲

职业选择观是指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一个人对职业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他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观念的深刻影响,当代青年出现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在择业过程中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sup>[7]</sup>。

笔者针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态度进行过调查,在工作态度上,鉴于当今激烈竞争的求职环境,大部分青年能够做到吃苦耐劳,但这一表现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成绩,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行业选择上,近八成毕业生在择业时都秉持“工资报酬最大化”“个人发展最大化”,大部分人只考虑工资的高低和工作的体面,“看中高工资、好待遇”,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和“未来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和岗位,只有极少数人是多为社会做贡献而读书和就业。有的青年以“个人发展”为由,不愿意去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不愿意从基层干起,不愿意做普通的工作,这也是青年逃

避社会责任、贪图享乐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

#### 4. 学习价值观出现错位

学习价值观指对学习的看法,是从事学习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等问题。《论语》中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能够准确地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在学习目的和动机上,为了一己的出人头地、赚取大量的物质财富、获得更多的荣耀、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等成为大部分青年学习的主要动因。在学习内容上,大部分青年都比较热衷于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和较高存在感的实用性较强的知识,而那些偏重于人们情操陶冶的,能够修身养性,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部分人文学科在当代青年那里则遭到冷落和无视。另外,在学习态度上,青年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是严重,最明显的是大学生对待公共课、通识课的态度,都只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无视青年自身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学过的知识在其发挥过价值以后,便不再问津。

### 二、功利主义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分析

#### (一) 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不强

在功利主义进入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课作为学校德育的主要载体,被置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境地。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大部分学校都只是注重专业知识的训练,忽视学生的道德信仰、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劳务输出工厂”。一些教师的功利主义习气也经由课堂转嫁到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加之当代教育“只重学位文凭,忽视道德水平”的教育功利主义特点,使得青年往往片面追求学习成绩,忽视道德素质的提升,而这严重违背了教育“培养完整意义上人格的人”的根本宗旨<sup>[8]</sup>。当学生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时,原来的追求高分在社会上就表现为争强好胜,积极方面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消极方面就是某种程度的功利主义行为,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陷入职场竞争的陷阱,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年的心理问题。

#### (二) 市场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所提倡的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为功利主义走向偏激与庸俗提供了土壤。尤其是市场经济所推行的利益最大化和等价交换原则,使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被充分肯定后,人的自然本性便毫无遗漏的被表现出来。在青年这一群体中,他们会将上述市场经济的思想扩大到生活的领域,继而滋生了大量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特别是个

人主义思想。此外,大众传媒的过度渲染也是青年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QQ、微博、论坛、微信等传媒工具,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和随意性,加之参与群体在其中所具备的广泛性、发言权利的平等性等特点,使得对功利主义的传播出现乱下定义、乱扣帽子的现象,不能够全面和系统地评价,最终影响功利主义积极影响的体现和发挥。再者,多元文化的错误示范也使青年人出现了严重的理想信念缺失、思想信仰迷茫等问题。伴随市场经济而滋生的对物欲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使得社会大众文化过早的出现了商业化、市场化等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校园文化也因过度模仿社会大众文化市场的经营管理模式而具有些许功利化的色彩。与此同时,在功利主义社会思潮广泛传播的大势下,青年学生的心理逐渐浮躁,“读得好不如嫁得好”“读得好不如有个好爸爸”等论调也逐渐得到青年们内心深处的接受和认同。总之,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和因此形成的社会氛围都使得当代青年在价值和行为选择上走向功利化。

#### (三) 家庭教育的引导偏颇

当代青年所生活的家庭结构以“4-2-1”型为主,多数是独生子女,作为一个承载高家庭期望值的群体。对于这样高期望的群体,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压力源主要来自家长或者家族。很多家长喜欢将自己的“处事哲学”强行灌输给子女,用自己片面的功利主义来引导和影响他们,这也是当今青年日趋功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父母运用物质激励手段,通过奖励孩子所喜欢的物品来刺激孩子努力学习,更有甚者,家长鼓励子女给老师送礼,让子女与家里有钱的同学走的亲近些。这就是家长片面功利主义的体现,这些都造成了青年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价值观偏颇,严重影响他们日后的成长,从长远来看,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 (四) 青年的身心发展不成熟

当代青年基本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自学生时代就一直处于封闭的校园环境中,与社会的接触少之又少,这就导致了当代青年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无力招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化推进以及多元文化浪潮的席卷,当代青年受其自身身心发展特点的影响,其个性往往比较张扬,人格也相对独立,他们提倡自我价值、自我发展、自我能力的提高等,主体意识明显增强<sup>[9]</sup>。受青年自身身心发展的现状及社会阅历的

影响,使得青年在是非的辨别、美丑的认同,价值观的树立上难免是非混淆,以及多数青年在自律自制方面的能力比较差,缺乏对自我的有效控制。同时,由于社会经验的缺少,社会阅历的缺乏,这都容易导致部分青年的主体意识过度膨胀,国家、集体观念、社会责任感相对淡薄或缺失。

### 三、正向引导功利主义对青年影响的路径探索

当代青年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外在表现和精神实质是理想信念的淡漠、道德信仰的迷失与言行选择的迷茫。如何正向引导当代青年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要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个层面着手去解决。

#### (一) 国家和社会层面:淡化社会功利主义氛围

##### 1.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谐社会倡导包容性,尊重差异和多元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容纳和借鉴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其他社会思潮。对于功利主义思潮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方面应吸收,对于其中产生偏离异化的消极因素予以剔除和批判,使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导下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其正面功能。

树立马克思主义功利价值观,用马克思主义功利观去改造和影响西方功利主义,肯定注重实效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对其他非主流社会思潮进行方向引导和内容规范时,充分考虑广大青年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诉求,进行多样社会思潮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并内化为其内在的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功利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所引领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必然选择,也能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 2.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制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使我们的青年学生出现相关问题时,能及时举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加强社会诚信基础建设、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使个人信用状况真正成为人们的“第二身份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sup>[10]</sup>。

##### 3. 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导向作用

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宣传社会上那些积极向上、引领文明风尚的新闻和典型人物,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

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给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正向的、积极的榜样示范,增强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净化网络、舆论空间,避免大众传媒的错误导向,对直播平台、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加强管理、审查,防止其传播负能量和虚假信息。大众传媒在报道相关事件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实事求是,恪守媒体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同时,还要发挥其对社会,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的积极导向作用,为成长中的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 4. 加快推进就业体制改革

政府要完善就业服务和保障体系,举行青年大学生招聘会、开设就业招聘网站等,为青年学生入职提供多种门路。还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为青年学生提供更多合适的就业岗位。在就业保障方面,要及时整顿就业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创设良好的劳动保障环境,积极落实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使当代青年的职业理想落地生根。企业和用人单位要健全青年学生评价体系,对青年学生应做到入职后公平对待,工作中科学评价。逐步提高就业青年工作待遇,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为青年增添更多踏实感,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成长途径。激发其提高自身职业技能和道德素质的内在动力,进而逐步淡化影响其的过分功利化气息。

#### (二) 学校层面:减弱校园功利主义氛围

在逐步的市场化过程中,我国的优秀传统美德在青年心中逐渐销匿,一如各种“救人反被诬”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使得人们印象中的乐于助人、舍己为人等传统美德逐渐被排斥和淡忘。在一定程度上,学校在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方面的缺失正是其价值取向功利化的深层原因。学校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切实的改变和调整。

##### 1.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一是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教育者不仅要继承传统还要敢于推陈出新。一方面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道德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功利观进行理性借鉴和大胆创新,帮助青年树立以“效益为活动基点,以法律为行为准绳,以集体幸福感为最终价值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功利观。二是创新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采用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采用自主讨论学习、探讨经典案例、榜样教学等方式,增强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同,以便其更好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三是完善思

想政治课程考核。建立合理的学生综合评价机制,完全彻底地推行素质教育体制,改变应试教育下“唯分数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德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给德育归“位”,避免出现青年重智轻德的“跛足发展”,实现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sup>[11]</sup>。

## 2. 提高教育工作者思想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提出了“三个牢固树立”的要求,要求人民教师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终身学习理念和改革创新意识。按照这个要求,学校要树立以师为本的人本管理理念,尊重教师、信任教师、关心教师、激励教师,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提高教师工作的快乐感和幸福感,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和神圣性的宣传,促进教师端正职业价值观。重视职业道德考评,建立合理高效的奖惩和监督机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偏见。教师自身要乐于思考、不断学习,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调整心态、增强自信心,切实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

## 3. 组织有效的社会实践

组织青年参与社会实践,使其通过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不断融入社会、认知社会,在社会中感知功利主义社会思潮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要教育青年正确分辨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引导其正视其积极影响,提高积极主动性,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和时间观念、效益观念;摒弃其消极影响,正确处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关系,避免陷入“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的误区。在社会实践中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年正确、客观、全面地认识功利主义,克服功利化的思维模式,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sup>[12]</sup>。

## 4. 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情趣和情感沟通、榜样的力量等思想行为,对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起着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校园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制,打造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完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建设等。开展健康高雅的文化体育活动,提升校园活动的文化认知和品味,形成富有凝聚力的校园精神和健康的价值导向。创造富有文化底蕴的优美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多功能的文化设施,深入调查青少年的喜好需求,要尤其凸显对青年的人文关怀。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等,从多方面引领青年的价值体系建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

## (三) 家庭层面:营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

家庭是青年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是青年的启蒙老师,是言传身教的第一人。家庭教育中功利主义的成分对于青年树立正确的功利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家长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注重自己的言行示范作用,在为人处世和社会交往中,要淡化物质利益色彩,自觉抵制功利主义消极的影响,面临某些价值选择的时候,要兼顾个人利益与他人、国家利益的统一,多带孩子参与公益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借助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事例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加强与青年沟通。青年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上极易出现“选择两难”的选择冲突,小到生活中的朋友交往、考试的成绩如何,大到自己的职业选择、工作烦恼以及择偶选择等,这都需要家长通过平时聊天,或者现在多种网络等社交媒介的方式给予关注,并进行积极倾听和耐心引导,给出中肯的建议。树立正确成才观。给予青少年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更多地关注青少年健康品格的养成和完整人格的引领,注重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避免孩子因为肩负家长的高期望而在沉重学习压力下产生功利主义的倾向。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营造轻松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向他们灌输上学的目的先是“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会知识”。

## (四) 个人层面:充分发挥青年的主体作用

青年群体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在主观世界同客观环境不断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促进青年形成正确的功利思想首先要从主体自我改造的实践上着手。

提升科学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掌握科学和文史知识,提高知识和理论水平,尤其是加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学习,全面武装自己的思想阵地。通过阅读名著、与周围的同辈群体进行互评以及自身的阶段反省等高效、可行的方式,不断对自己的思想道德认识进行修正和提升。汲取功利主义原理的养分。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青年要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敢于正视功利化的目标,在学习上积极进取,在工作中主动争取,切实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但同时要摒弃传统思想中对“金钱财富”的错误定位。树立适度的金钱观,坚持将幸福最大化原理作为人生的追求。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例如做社会调查研究、去街道或社区做

义工、参加志愿服务等方式,充分发挥自己所长,主动融入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奉献精神、培养道德情操。合理合法追求物质利益。要合理、合法,坚持适度原则、坚持以正当手段去追求,做到“不以其道得之,吾不处也”。不可一味地坚持“金钱至上”,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要学会共享和共赢。在面对一切挑战和机遇时,要理性地面对,在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积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流。

#### 参考文献:

- [1] 舒远招,朱俊林. 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 [2] 约翰·穆勒. 功利主义[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 [3] 茅于軾.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 [4] 鲁洁. 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10.

- [5] 毕红梅. 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6] 强以华. 西方伦理十二讲[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7] 魏悦. 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之比较研究[M].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 [8] 冯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9] 陆玲玲. 西方功利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J]. 人民论坛,2010(4).
- [10] 梁姝华,代丽健.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功利主义倾向及其引导[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 [11] 章洁,王开永. 警惕高校素质教育陷入功利主义[J]. 人民论坛,2013(2).
- [12] 张清华,张希梅.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的表现及原因分析[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Study on the Effects and Solutions of Utilitarianism on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WANG Lili

(College of Internarional Edu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Utilitarianism ha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actual results and active competition. I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but th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extremely egoist” and “money first” brought about by current utilitarianism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society. In all areas of lif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youth values cannot be ignored. After exploring why utilitarian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the shaping of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we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values is not simply a process of preaching, but should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reality. We should mak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buil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adjus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guide the youth correctly grasp the course of life, as well as setting up the positive life values.

**Key words:** utilitarianism; contemporary youth; values; influence; way



# 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现状及对策研究

——基于河南省高校的研究

董华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学工部, 郑州 450044)

**摘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作为高校学籍管理的重要内容,对杜绝高考舞弊,维护学生公平享有受教育权利,保证高等教育教学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当前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加强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主要措施对策,本研究对一定时期内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高校学籍工作的规范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河南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全过程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6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21-04

## 一、研究背景

高校学籍管理工作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对高校学籍管理,对高校学生管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几年,从“罗彩霞事件”到“王娜娜事件”,一系列高招舞弊事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高招舞弊事件暴露了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管理层面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反映出早些年学籍管理中的漏洞,如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工作人员责任意识不强,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高校如何深入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利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保障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净化高校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教育部一直重视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从1990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委7号令)到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24号令)(以下简称教育部24号令)再到今年新颁布执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41号令)(以下简称教育部41号

令),都强调高校要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复查,特别是教育部41号令进一步对复查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和要求。从2007年至今,教育部每年下发关于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文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对高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高校开展好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不仅对高考生源质量进行检查,更有效杜绝招生环节存在的各种舞弊行为。复查工作在切实维护学生公平享有教育权利,公平享受高等教育资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复查工作能及时查验招生环节出现的各类不端行为,有利于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秩序的顺利开展。复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能有效抵制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能有效打破不法分子的计划,破坏其利益链,真正发挥复查工作对高考舞弊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

本文基于对河南省二十几所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调研的基础上,从工作开展细节中深入发掘目前资格复查存在的诸多问题,认真思考复查工作存在问题的影响因素,提出具体的执行对策,对更好地开展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对规范高校学籍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17-12-10

作者简介:董华丽(1982—),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学工部讲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 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内容及要求

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巩固招生成果、维护高等教育严肃性、确保新生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对高考从报名、考试、录取等环节的复查监督,是学生进入高等院校身份再确认的重要环节。教育部 21 号令第八条指出,“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教育部 41 号令第九条提出“学校应当在报到时对新生入学资格进行初步审查”,第十一条指出“学生入学后,学校应当在 3 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进行复查。复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录取手续及程序等是否合乎国家招生规定;(二)所获得的录取资格是否真实、合乎相关规定;(三)本人及身份证明与录取通知、考生档案等是否一致;(四)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体检要求,能否保证在校正常学习、生活;(五)艺术、体育等特殊类型录取学生的专业水平是否符合录取要求”。通过教育部 41 号令对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内容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化,不难看出,复查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

近几年,河南省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以教育部每年的文件为总要求,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整合多方高招信息资源为复查工作提供依据,努力创新工作方法,复查内容在 41 号令要求的五项内容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课、专业课复试,加分资格审核及高招电子照片张贴等复查内容,进一步细化复查方法,保证了河南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深入开展。

## 三、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存在的问题

目前,河南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深入有序,成效显著。河南省教育厅连续多年单独发文安排部署复查工作,并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年底成立督导组检查组,对全省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开展督导检查。但仍然存在部分高校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落实不彻底,校内相关部门缺乏协调等现象,直接影响复查工作的实际效果。

### (一)基本信息核对不严谨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主要包含对学生各项基本信息进行核对,其中不仅包括高考期间的信息,还涵盖高中阶段的信息。调研中,部分高校没有按照上级要求深入开展该项工作,特别在基本信息核对环节,存在信息核对不全面,核对过程监督机制不健全的现象。个别学校存在一名老师审核,甚至有高年级学生参与审核的现象。由此看出,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具体落实过程中,具体责任人重视程度不够,复查环节不够严谨。

### (二)复试结果利用率不高

复查要求开展的文化课、专业课复试,不仅是对高考成绩的一次复核,更是对学生笔迹的再次确认。据了解,高校基本都有组织有纪律地开展了复试,但个别学校出现只按要求组织考试,后期没有评阅试卷的现象;部分学校评阅了试卷,却没有将试卷分数和高考成绩进行比对,没有对成绩有较大出入的学生进一步核查;没有将笔试复试试卷笔迹与高考电子档案笔迹进行核对的现象,致使复试环节没有发挥真正作用。

### (三)其他复查落实不彻底的现象

2008 年至今,河南省教育厅要求高校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环节,将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提供的考生电子档案照片张贴在学校宿舍、班级固定教室等场所,此举不仅对“假学生”是一种震慑,更有效的实现师生共同监督。在张贴电子档案照片环节,部分高校存在电子照片打印不清晰,张贴公告中没有教育厅及学校纪委监督电话的现象。同事存在个别学校没有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严格审核高考加分资格相关资料是否属实的情况,影响了复查的实际效果。

## 四、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观念没有转变,导致对复查工作重视不够

随着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不仅对双方当事人本身有严重的影响,有的甚至触及到整个家庭。我们努力杜绝高考徇私舞弊现象发生,特别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肩负起维护教育公平公正的责任。调研中,部分老师直观地认为现在高考各个环节审核严格,怎么可能出现冒名顶替。特别是部分领导,认为现在几千名学生里都不会有一个假学生。殊不知,只要存在一例“假学生”,背后就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链和不公平行为。不论高考舞弊事件何时被暴露,都将对学校,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二)监督检查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人员铤而走险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虽然主体实施者是高校,但所有参与高招工作的单位及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如省级招生部门,学生毕业所在高中都应当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需要协助调查的情况下给予积极配合。高招报考整个过程是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完成的过程,不论是在报名环节、考试环节、录取环节、报到环节,还是在复查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工作人员疏忽失职,监督机制不到位,都有可能让不法分子钻漏洞。因此,加强对各个高招报考、入学环节

的监管,避免将上一环节的漏洞带到下一环节,是进一步杜绝高考舞弊行为的有效举措。

(三)部门相互协作性不强,导致复查落实不彻底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是一项全校性工作,牵涉到学校招生、教务、学生、纪检等多个职能部门,只有各职能部门共同协作,积极配合,相互帮助才能达到预期的复查效果。调研中,个别高校部门之间缺乏配合,存在试卷、纸质档案、高考电子档案等分别存放在不同部门的现象,直接影响到具体复查人员信息核对工作的开展。同时,信息核查期间职能部门沟通不强,配合不到位,直接影响复查工作的深入。

(四)高校自身管理因素,致使入学资格审查受到影响

根据现行的教育部41号令第二十一条“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本规定给予学校转专业管理方面的自主权。但由于学校办学层次、性质和管理等多方的实际差异,学校转专业规定在没有违反教育部要求的不得在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新生录取专业外,部分学校出现复查期间转专业情况,特别是本科和专科院校因学制不同,各高校教学培养计划的差异性,致使转专业时间段各不相同。虽然目前存在的复查期间转专业现象不多,但也对复查工作的开展产生一定影响。

## 五、高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对策建议

(一)在制度层面上健全具体实施细则

教育部一直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连续多年发文,并不断充实文件内容和诸项要求,成为高校开展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主要依据。从复查本身来看,它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复查结果直接影响到个人利益得失,因此复查期间的每一环节都应按要求有序开展,复查过程不允许任何人随意更改审查要求,随意删减审核程序,复查全过程都要受到纪检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共同监督。同时,复查工作不是主观盲目的,它可以运用现代化科学方法,特别是研发针对性强的审核系统,为复查结果的准确性提供帮助。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复查工作的督导检查,积极汇总高校复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补充和完善相关文件内容和具体要求,突出文件指导的实际效果。各高校要以新颁布执行的41号令要求为基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符合本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具体实施办法。如在基本信息审核环节,应当要求至少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监督审核,坚决杜绝学生参与;在公示学生个人信息环节,明确公示信息内容,特别在张

贴高招电子照片环节,避免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公布;在制定转专业规定中,考虑到复查的时间要求,应当尽量避免转专业工作对复查产生影响。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入学,高校要进一步细化工作要求,涉及到具体细节问题时要勤于思考,精准把握,使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成为保障学生权利,维护学校声誉,保证教育公平的有力举措。

(二)在人员选配上突出责任意识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的具体工作人员不能等同于其他一般人员,具体复查者不仅要充分理解复查的主要内容,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复查能力,其中包含一定的敏锐度。高校要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职责认知,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每一环节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意义所在。高校要选派责任心强,耐心细致的人员参与到复查工作中,强化组织纪律要求,提高责任意识,使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复查过程中能自觉抵制多方因素干扰,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调研中,济源职业技术学院设立院系学籍专员,日常开展学籍管理工作,是参与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的主要力量,学籍专员不仅明确岗位职责,而且具有丰富工作经验,为复查工作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高校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如可以采取院系间互查的方法,加大相互监督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组织专人进行抽查复检,真正使复查工作落到实处,纪检部分应当对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全过程进行监督。河南省教育厅要求高校在复查过程中,逐级签订责任承诺书的做法具有示范意义。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只有加强责任监督,才能促使审查工作人员落实工作要求;只有不断强化工作纪律,才能真正实现复查工作公平公正。

(三)在具体实践中注重创新工作方法

从全国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学籍电子注册工作以来,高校学籍管理工作不断规范,数据信息共享为学籍日常管理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高校新生入学资格复查伴随着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的规范推进,从内容和方法上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一系列复查期间严禁开展的行为,对复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证。河南省从2008年开始要求高校在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期间张贴新生高招电子照片进行公示监督,在近两年又将录取考生的高招电子照片、高考进场照片及高考试卷笔迹电子版发给高校,要求高校在复查过程中,严格核对相关图像及笔迹信息,为复查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成为资格复查又一项重要内容。据了解,安阳工学院充分利用高招电子照片,组织专

业人员,设计研发审查系统,在新生报到现场对学生  
进行图像信息采集,将现场照片与高招电子照片进  
行即时比对,比对无误后才可办理报到手续,信息核  
对前置的做法,值得高校借鉴。教育主管部门应积  
极采取措施,实现高招报名指纹信息的共享,将指纹  
信息作为新生复查的重要依据,前置资格审核工作,  
继续完善新生入学资格复审方式方法。

#### (四) 在管理层面上坚持动态化全过程管理

高校学籍学历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要以新生入  
学资格复审为前提和基础,但资格复审工作不能将  
短期时间限制作为结束点,而是要继续渗透到教育  
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教育部 41 号令在继续强调复  
查三个月的时间期限外,还增加了报到期间入学资  
格初步审查环节,将入学资格审核前置的做法,有效  
地将徇私舞弊考生拒绝在校门外。初步审查合格  
的学生可注册学籍,但注册学籍并不代表学生就没  
有问题,在随后连续的三个月复查期,随时发现问  
题,随时取消学籍。高校要把握教育部 41 号令的  
新变化,改变原有工作模式,将复查工作延伸到教  
育教学全过程,重视复查在日常学籍管理中的动  
态化发展。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长期重视学籍异动  
中资格审核工作,如对转专业的学生,特别是跨院  
系转专业,要求转入院系安排工作人员对转入学  
生进行信息再复核;对休学、保留学籍期满复学  
的学生要再次进行身份确认,防止 A 学生休学,  
B 学生顶替复学的现象;对转学学生,学校积极  
配合转入转出学校学生身份确认,避免 C 学生  
转出,D 学生转入,全面防范“假学生”钻漏洞。  
同时,该校在毕业图像信息采集及学历证书发放  
环节,也对学生基本信息包含图像信

息再次核实,切实将资格复审工作贯穿在教育  
教学管理全过程。

#### (五) 在法律层面上严惩不法行为

在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下,社会资源配置受  
到限制,必然导致多领域不公平现象出现。高  
考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因受到高  
考制度不健全,地域差别较大,地域间录  
取差异的多重发展困境,导致高考舞弊  
现象发生。虽然国家一再重视高考监  
管,严厉打击舞弊行为,特别在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第 284  
条新增规定,明确了国考中替考属于  
违法行为,并指出组织者、替考者和  
请考者都要受到制裁,特别对组织  
者,视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并表  
示对这种危害教育秩序,影响社会和  
谐的行为要给予严厉打击。面对多  
方国家制度及各级部门出台的举  
措,少数不法分子依旧铤而走险,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事件仍有发  
生。虽然国家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积极防范,但从目前看,舞弊现象  
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和  
处罚力度不成正比,致使此类现  
象屡禁不止。冒名顶替、徇私  
舞弊等违法行为不仅影响了替  
考者和请考者的命运,更破坏  
了两个家庭,有些父母为了孩子  
与不法分子勾结,最终走上犯  
罪道路。因此,相关部门采取  
严格的措施,加大惩罚力度,  
使不法分子不敢顶替,不能  
顶替。高校要加强对在校学  
生的教育和管理,加强诚信  
教育,加强国家政策宣传,  
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参与  
违反国家高考制度,参与  
违法行为带来的后果,努  
力维护良好的教育环境,  
保证高等教育公平秩序。

(责任编辑 许峻)

##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Qualification Re – examination of College Freshmen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Colleges of Henan

DONG Huali

(Party Student Offic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Frauds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ve been a topic of conspicuous public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ir adverse impacts on the order and imag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tudent profile management, qualification re – examination of college freshmen ensures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 through eliminating frauds, which can guarantee the order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lso promot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our society.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qualification re – examination of college freshme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then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examination. The article is of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qualification re – examination of college freshme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 profile management.

**Key words:** colleges of Henan; qualification re – examination of college freshmen; the whole proce’s management

#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与建议

孙浩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心态、就业途径、就业能力、就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在就业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提高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就业率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就业;调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8.01.027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8)01-0125-04

2015年11月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sup>[1-6]</sup>本文结合当前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对在校应届大学生就业心态、就业途径、就业能力、就业指导与服务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从中发现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为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参考。

## 一、调查

###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涵盖以下学科:理科、工科、文科和艺术类,共发放调查问卷402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回收率98.51%,在所有参与调查问卷的对象中男性占41.2%,女性占58.8%,来自城市家庭的占40.2%,来自农村家庭的占59.8%。

###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 1. 就业心态调查

就业心态是指劳动者在就业期间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状态,是影响其正确择业和顺利就业的主要因

素之一。形式上表现为求职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和求职取向等。

#### (1)求职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学科的受访者给出的排序不尽相同(见表1),文科和理科受访者一致认为:薪资待遇、工作稳定性和单位平台、能否发挥个人优势是他们就业时最看重的三个因素;工科受访者选择的前三个因素是薪资待遇、工作稳定性与单位平台、个人志向兴趣;而艺术类受访者的排序是:能否发挥个人优势、薪资待遇、工作稳定性与单位平台。分析后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时优先考虑的因素是一致的:薪资待遇、工作稳定性与单位平台、能否发挥个人优势,而社会贡献度位列最末。这体现了大学生择业时的真实心态、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盼。

表1 不同学科学生求职时主要的考虑因素

学科	工科	理科	文科	艺术
考虑因素				
社会贡献度	0.75	0.45	0.82	1.83
工作轻松	2.35	0.73	1.82	3.55
工作挑战性	3.14	5.12	1.82	7.1
专业对口	1.09	4.39	1.82	7.1
社会地位和个人自由	7.84	6.59	1.82	5.32
工作稳定性与单位平台	25.49	21.59	24.7	12.42
能否发挥个人优势	2.87	21.23	22.88	26.02
个人志向兴趣	21.51	13.18	17.44	10.64
薪资待遇	34.96	26.72	26.88	26.0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收稿日期:2017-12-25

作者简介:孙浩冉(197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业教育。

## (2) 求职取向

职业的选择反映了人生观、价值观的定位过程,求职取向则折射出就业时对未来职业所能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上满足程度的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倾向。在单位性质倾向方面,不同性质的单位有着不同的特点,从而可能带给求职者不同的机会、资源和压力。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单位的性质没有特别明确的限定,仅要求合适即可:其中事业单位、国企和三资企业位列前三,而民营企业排在最末。

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见图1)显示:工科大学生倾向于国企、事业单位或是出国留学,理科大学生倾向于出国留学、三资企业、事业单位,文科大学生倾向于进入三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企,艺术类大学生更倾向于去事业单位、国企或自己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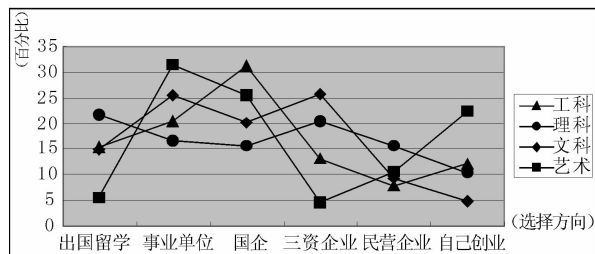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学科大学生就业选择方向

针对“毕业后愿意创业吗?”这个问题,40.7%的人表示很愿意试一试,42.1%的人表示比较愿意试试,只有17.2%的人表示不愿意,说明国家近年大力提倡的创新创业教育已深入人心。在问及“你是否做好了创业准备?”时,高达80.5%的大学生表示“没有做好准备”,11.3%的大学生表示“已做好了准备”,还有8.2%的人说不清楚,反映了大学生们虽有创业的激情和梦想,但普遍缺乏创业实践的能力,容易受到资金、经验、人脉等条件限制,风险把控能力较弱。

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45.3%的大学生选择了竞争较为激烈的二线城市就业,27.1%的大学生选择北上广等竞争非常激烈的一线城市,而愿意去西部或偏远地区就业的仅占15.2%。我们以“一定要在郑州就业”为例进行了比较,63.4%的艺术类大学生和45.1%的理科生给出了肯定回答,而工科和文科大学生持相同看法的也在34%以上。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愿意留在郑州工作,部分原因是成立不久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在区域发展中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而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安家落户,创造出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作为主力生源的河南籍大学生往往怀有浓厚的故乡情结,他们在同样的条件下不愿远离家乡,这也是近

年来省内就业市场上出现的一个新特点。

在对收入的期望值方面,56.0%的工科生期望一份薪水在5000元以上的工作,41.9%的理科生期望在3000—4000元,47.1%的文科生和高达72.1%的艺术生期望在4000—5000元。综合来看,超过半数的大学生们期望月薪介于3000至4000元之间,最低的心理预期也在2000元以上。

## 2. 就业途径调查

信息时代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采取的就业渠道逐渐多元化。众多的就业渠道中,选准有效的渠道对提高学生就业成功率非常关键,目前大学生提及最高的就业渠道是招聘会和人才市场,其次是学校信息和推荐,第三位是熟人介绍。虽然经熟人介绍的就业成功率可能会比较高,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认识这样熟人的几率很小,因此人才市场和招聘会这种传统的就业渠道仍然是毕业生心中最现实也最行之有效的就业渠道。

然而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与总体数据会有一些的区别,因此我们根据不同的学科门类进行交互分析。分析后的数据显示,超过40.7%的理工科大学生倾向通过人才市场找到合适的工作,42.1%的文科大学生希望通过院系或老师的推荐就业,48.4%的艺术类大学生更愿意通过亲戚或熟人介绍找到心仪的工作。

实际职业获得渠道的情况与上述调查结果是相呼应的。此次调查前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中,通过人才市场和直接与用人单位接触或登录用人单位网站这两种就业渠道获得工作的人几乎占到了50%,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业实际获得渠道正是人才市场和招聘会。

## 3. 就业能力调查

就业能力即劳动者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1)就业中自身的优势。关于这个问题,27.1%的大学生选择专业技能,38.5%的人选择实践经验,23.2%的人选择口才和社会交往能力,只有11.2%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优势。(2)自身最缺乏的素质。23.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最缺乏沟通协调能力,43.5%的人认为是相关工作经验,认为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和难以承受工作压力的人分别占29.1%和3.1%,还有1.0%的人说不清楚。(3)用人单位最关心的条件(多选)。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动手能力、综合素质、社会经验和发展潜力,均超过了60%,思想品德占54%,学校名气占21%,而专业知识只占13%,说明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学校名气并非灵丹妙药、包治百病,用人单位也不再仅仅看重求职者的学习

成绩,更多考虑的是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尤其是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4. 就业指导和服务调查

##### (1) 就业培训内容

61.5%的大学生认为在学校除专业课外的学习上,应再加设就业指导实践平台的锻炼,25.3%的人认为应加设人际交往能力方面的内容,13.2%的人认为应开设就业面试技巧方面的内容,说明大学生更注重就业指导课程的实用性。

##### (2) 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的满意度

仅有8.3%的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感到满意,超过半数(56.4%)的大学生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感觉一般,17.6%的人不满意,还有17.7%的人说不清,说明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

##### (3) 对政府就业市场管理的满意度

仅有1.6%的大学生感到满意,45.3%的人认为政府对就业市场的管理一般,42.2%的人不满意,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就业市场上充斥的信息真真假假,普通人无法辨别,遇到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往往互相推诿或不作为,还有10.9%的人说不清楚。

## 二、启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问卷,我们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心态、就业途径、就业能力和得到的就业指导与服务情况有了基本了解,这对我们调整就业工作的重心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就业指导和培训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有利于今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

### (一) 制定专项政策,调节就业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失去平衡时,仅凭劳动者自身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这时政策的及时制定将会产生积极的放大效果。

政府的专项政策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取消各省市针对大学生就业的户口限制,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干预,帮助大学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就业和自由流动。第二,短期内增加对大学生的需求,加大政府机关、军队及其他社会服务单位对大学生的招聘力度,并以此提高事业单位人员整体素质。第三,进一步增加偏远地区和基层单位对大学生的需求,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对大学生就业的吸引力。

### (二) 加强就业意识教育,调整好就业心态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大学生把薪资待遇和地域作为就业标准,迷恋大城市,回避基层和偏远地

区,说明我们的就业意识教育效果不明显,大学生的就业心态过于脆弱,就业行为显得较为盲从。因此在今后的就业教育中应注重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放下对偏远地区的地域歧视,大学生还要学会对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根据自己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形势和未来经济社会中地位等情况进行分析,不断调整好自己的就业心态,放低就业期望值,顺利就业。<sup>[7-8]</sup>

### (三)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

首先,大学生应该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在专业上胜任未来的岗位要求。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清楚自己的定位、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藉此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各种可能的机会锻炼并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处理突发事情的应变能力。当然,培养良好的职业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优秀的职业精神是人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必要条件。<sup>[9]</sup>

### (四) 加强就业指导和服务

目前尽管各个高校已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必修课管理,但是该课程内容的编排缺乏实践性、实用性和参与性,任课教师自身也往往缺少企业工作经历,没有说服力,且教学手段单一,对学生缺乏吸引力,这也是大学生对就业指导和服务满意度不高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们应从打造一支过硬的职业指导培训队伍入手,选派优秀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同时聘请行业或企业人士担任就业指导员,开发校企合作教材,不断丰富课程内容,更多采用形式新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例如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资料分析等,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一起参与到教学中来,真正的让学生坐下来、听进去。同时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就业市场的监管,取缔违法中介,及时处理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sup>[10]</sup>

### (五) 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

从根本上看,经济增长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持续增长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氛围,当前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和淘汰落后产能更有利于大学生就业,而产业结构转型与淘汰落后产能又受到积极创业活动的促进。因此,政府大力提倡的创新创业,尤其是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有助于形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sup>[11]</sup>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将更为有效地提升我国创业者的整体素质和层次,对于我国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长期的促进作用。

### 三、结语

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既有经济、社会、高校等外部方面的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内部的原因。推进大学生就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既有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引导、就业环境的改善、高校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又有大学生自身就业创业意识的改变、素质能力的提高等原因。要通过制定专项政策,调节劳动力就业市场,增加就业机会与岗位;加强在校毕业生就业相关课程建设,及早树立就业意识,调整好毕业生的就业心态,放低就业姿态,鼓励毕业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力;继续加强学校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制定专门政策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总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改善需要政府、社会、高校、学生等各方面互相配合和努力。

#### 参考文献:

[1]黎勇.转型发展背景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育教学体系改革的探索与初步实践[J].高教论坛,2017(1):23-27.

[2]陈方红,王锋.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理论诠释与改革取向[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6(2):93-98.  
[3]李亮.技术本科院校创客教育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6(2):42-44.  
[4]贺鸿莉.地方高校商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与途径[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5):103-105.  
[5]陈正权.地方院校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的SWOT分析及对策[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4):46-51.  
[6]黄东升.新建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和破解之道[J].教育评论,2017(1):21-25.  
[7]殷玉萍,陈忠平.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心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34-136.  
[8]王云秀.研究生就业调查与建议[J].教育与职业,2012(17):91-92.  
[9]王星.浅谈高等职业学校职业素质教育[J].科学大众,2008(8):148.  
[10]袁海涛.推进大学生就业的有效措施探究:许昌市大学生就业调查与思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9):42-43.  
[11]王仲德.大众化背景下农业院校就业导向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7(6):74-7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n Application Oriented Universities

SUN Haoran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mployment mentality, employment approaches, employ ability,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service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to 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undergraduates in employment, so as to propose applications for improvement, and to giv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aising the undergraduates' employment rate.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employment; investigation